敦化文史资料

第五辑

敦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万合电灯厂》与万茂森

温乃石　王仁学

万茂森其人

万茂森，字荫清，行三，绰号万三瞎子（实为近视），辽宁省海城县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磋磨多年，立志经商。民国元年（1912年）迁居敦化。1932年前，曾先后经营官店、历任敦化县议会会员、吉林省财政厅咨议、敦化县商务会会长、敦化敖东中学董事会董事等职。“9·18”事变后，因与王德林、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民众抗日武装“参茸会”有来往并提供给养，于1932年3月23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吉林市郊九龙口，时年46岁。

《万合电灯厂》的始末

民国17年（1928年），万茂森和敦化士绅钟岳、陆军团长王绍南倡办电灯公司，由万茂森领导出面筹办。经县长郭恩波同意，通过敦化县公署向吉林省农镀厅（农镀厅移交建设厅卷内）报送“拟设敦化电灯公司”一呈，并将筹款现大洋55元呈缴在案。民国18年（1929年），吉林省建设厅训令第132号由孙其昌厅长批文下达敦化县公署，饬令万茂森速行造具各项书款转呈送厅。万茂森除呈送方案给吉林省建设厅外，并向隶属满铁的“南满电业株式会社”提交了创办电灯公司的方案。同年3月，以《万合电灯厂》之称下批。筹建初期，资金不足，有向满铁

借款之意，只因顾虑官方反对外资，故托延时日。之后，经万氏奔走于吉林沈阳等地，筹措集股金现大洋9万元。着手进行电灯厂的土建工程建设。民国19年（1930年）3月，万茂森与安东（现名丹东）《丹华公司》孙总经理协商，作了三项规定：1、以现大洋3万元，购置发电设备及安装工资等费用；2、厂址：敦化县城内，（现龙井路西段，城皇庙路南）；3、包工者，安东《丹华公司》。达成协议后，随即着手运进设备，安装发电设备等工程。1931年"9·18"事变前后，因时局紧张，电灯厂工程不得不停工。1932年初，《万合电灯厂》匆匆复工，因时局关系，1932年2月20日，王德林、吴义成率领的"抗日救国军"攻打敦化城电灯厂被迫停工。同年三月，因与抗日救国军有关，万茂森被日本宪兵逮捕，《万合电灯厂》遂被其取缔。

大同元年（1932）8月，《万合电灯厂》改组为《敦化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属日满合资企业。改组后安装了第一台发电机，容量75千瓦，电压3、3千伏，50兆赫。第一台原动柴油机功率为113马力。1933年2月6日投入运行，向敦化城内供电。供电914户，计2,500盏灯。

万茂森素有经商之长，尤其是他经营的《吉庆商号》灯油灯具之业务，亦必权衡建《电灯厂》之利弊关系，"电灯厂设后。由利害得失方面观察之，灯油激减，为必然之事实，业煤油者，当然受极大之打击。由金额方面计算，用灯油每年消费约4000箱，每箱10元，利润实降。然由利益方面观察之，对于维持敦化刻下之治安，尤其利用此项之动力，可企划经济事业，改良家庭工业，亦能因而加以改革，生产能力飞跃，地方产业尽量开发，均利赖之"。

《万合电灯厂》的创办人—万茂森，虽然被日军杀害，

没有亲自看到电的光明，没有看到电能在发展民族工业的重大作用，但是他作为敦化第一家创办电力事业的始祖，将功过明鉴，有口皆碑。

敦化早期土地开发浅说

温大成

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敦化就居住着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肃慎族。从原始遗址出土的文物如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石斧、石磨盘和渔业生产所用的陶网坠等，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时这里的人们不但能从事渔猎，而且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耕作。

到了渤海和辽金时代，这里的人们已经使用铁锄、铁斧、铁制马具、铁镰、铁铧等工具。这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可用牲畜耕地的程度了。

从1681年(清康熙20年)起，大约200年左右的时间，敦化属于清政府的封禁区，不准任何人开垦种地。这里只作为向朝廷进贡的渔猎场所，仅有少量耕地为旗户所耕种。

乾隆年间，满族关氏家族先祖麻通带领本家族70余人和家丁、庄客(垦民)等计300余人，从北京迁至吉林龙潭山，后又从龙潭山移居敦化城内官地一带开垦土地。兴盛时期可达熟地上千垧。这是清政府实行"移垦京旗"以来较早定居敦化的一只旗人垦荒家族。据调查，当时额穆一带亦有不少旗地。

清光绪初年，在沙河沿和县城附近各有10户左右农户，每户有3－－5垧耕地，其余的地段大部分是荒地。而现在的县城那时还是一片繁茂的树林。

清光绪4年（1878年），吉林将军了解到阿克敦地方（敦化地方）有流民前往私垦。即派员前往复查，责令旗

民各户报告私垦地亩数，以利查明造册。

清光绪5年，吉林将军铭安，委任赵敦诚率领500名士兵驻江东第子沟的关帝家，在那里设置荒务局，开始办理拂下事务。当时，由于农民贫穷买不起土地，荒务局便放荒受租。光绪6年，赵敦诚回到吉林动员了吉林地方的大富豪朱泰、赵金斗、朱德泰等7户，于同年搬迁到敦化沙河沿，兴隆川一带。他对这7户以每垧3吊660文（压租钱3吊300文，经照费330文）拂下了1300垧。两年后，朱泰的亲戚宋茂春从吉林来到（第二区）八家子平安堡一带从事开垦，而当地有支付能力的农民只能买5—6垧地，能买起20垧地的只有2—3户。光绪7年，经吉林来敦化的张明东在敦化西部大石河子（今翰章民生一带）开垦荒地200余垧。

建县前，即光绪8年（1882年）2月14日，吉林将军铭安派四品衔委用通判陈治，同知衔委用知县毓斌前往阿克敦城勘查得知，该地居民有400多户。同年2月20日奏准，在阿克敦地方设县，定县名曰："敦化"，定为"疲难中缺"（"疲"指官员劳苦程度，"难"指民治的难易），隶于吉林府。

据《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记载，光绪6年至光绪11年间，官府放出熟地23000垧。虽然放了一些荒地，开垦了一些土地，但由于这里气候寒冷，尤其是受早霜的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不好。因而有不少农民离开此地，另谋生路，所放土地虽升科而不能如数纳赋。

为了鼓励农民来敦化垦荒种田，县府实行了收7成的升科赋（开荒10垧只收7垧的田赋）。这项政策颁布并实行后，各地农民为得7成升科的优惠，纷纷迁居敦化开荒种地。

从光绪5年放荒到光绪28年（1879—1902年）的23年间，

共开垦熟地32442垧。

中华民国建立后，吉林省分别于民国4年（1915年）和民国6年（1917年）公布了《吉林全省放荒规则》、《吉林勘放规则》，把放出的荒地按4等定出地价。上等荒地每垧收吉洋2元；中等荒地每垧收吉洋1元5角；下等荒地每垧收吉洋1元；最下等荒地每垧收吉洋5角。

为了鼓励农民开垦生荒，《放荒规则》在收租上还规定，从开垦后的第6年起升科征赋。升科征赋时扣除房园井道，按实地7成升科。已垦6年以上而未领熟地契准免其以往之租当年升科。《放荒规则》还规定了催垦年限：1年应垦所领地十分之二；2年应垦所领地十分之六；4年应垦所领地十分之八；5年应将所有地垦完。

民国元年（1912年），朝鲜人金某等人到凉水泉子定居，后于中华民国3年在沙河沿开始种水稻，这是朝鲜人移住此地从事水稻种植较早的人之一。到康德2年，敦化水田总面积发展到1639垧，占总耕地面积的4.1%。

据资料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敦化县孤山子开发耕地面积为120垧；甩湾子开发耕地面积为135垧；马圈开发耕地面积70垧。

民国9年（1920年），全县熟地面积已达到43.366垧；民国18年（1929年），已开垦熟地66.551垧，本年升科地数386垧，合计66.937垧。田赋每垧收大洋5角，应收大洋33.467元。催征上年农民欠地19.911垧，折合大洋9.955元。不难看出由于赋税沉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欠收，农民无法支付田赋和地租。

日伪统治初期，伪县公署设有二荒地"复兴会"，受省二

荒地复兴委员会管辖。伪县长同二荒地所有者签定复兴二荒地契约，然后由用方指派的二荒地管理人把荒地租给农民开垦。

二荒契约不但没有给耕种者——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相反，土地所有者——地主可随意剥削农民，使农民不得安居生产。所以，当时产生了大量的废耕地。据康德2年（1935年）伪县公署调查表明，全县废耕地面积就有22,520垧。

从光绪5年放荒到建国前，敦化土地开发经历60余载。虽然开垦出大量土地，但是由于旧政府政策的反动腐朽，少数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死活不顾。尤其是“9、18”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战乱四起，民不聊生，加之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广大农民根本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所以，大片农田荒芜，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十年九次欠收。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发展农业生产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利措施，逐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耕作，实行科学种田，使沉睡多年的敦化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真正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敦化土地的早期垦荒者关氏家族

关维世　李果钧

乾隆年间，清政府为开发东地北区，动员在京闲散旗户移居东北，开垦农田。关氏家族便从北京迁居吉林龙潭山。家族史上记载，关氏家族原属隶京正白旗瓜尔佳氏，由安达力，音德布传至麻起。乾隆后期，麻起又从龙潭山迁居敦化境内官地西部。那时候这里渺无人烟。麻起带领本家族70余人和家丁、庄客（垦民）等，共300余人来到此地，见这里山川秀美，土质肥沃，便先选了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定为墓地，接着又筑起了一座十分气派的庄园。青砖瓦舍的住室，高大的围墙，四角还筑有炮楼。这就是关家大院，后称“老院”。（现成记号村）

麻起有 6 个儿子，后来分居在前石湖、后 石 湖、北 招 岭、腰岭子，加上“四大门”和留在成记号的一支，形成了关氏家族的六大支。

留在老院（成记号）这一支，除耕种庄园的大 片 土 地外，还经营杂货庄和当铺，取名“成记号”（此为成记号村名之来由）。《成记号村史》开头提到一笔“成记号村已有200多 年 的历史，解放前这里住的多是关姓人家。关姓地主的最昌盛时期，土地千垧……”。足见关家经营土地规模之大。

以阿新爱斯为创业人的一支，在今西甸子屯西北修起了宅院。阿新爱斯有 4 个儿子，依次分住在大西院、大东院、

东腰院和店房，被称做“四大门儿”老关家。“跑马占荒”上千垧，世代垦荒耕耘。

前石湖一支的始祖是玛尔洪那，后石湖一支的始祖是乌松阿的文新。这两支的关家人耕种良田180多垧。北招岭和腰岭子这两支也经营了各自所占的大片土地。

就这样，关氏家族的六大支，就把官地一带的农田开垦起来了。在乾隆年间，敦化境内只有额穆设立了佐领衙门，这里是人们集居之处。额穆因处吉林通往宁古塔的交通要道，镇内与商旅有关的行业，方得以发展。绝大多数人，还是依山傍水过着渔猎生活，从事农业者极少。关氏家族在官地一带开拓了大面积的良田，他们不仅为清政府的“移垦京旗”做了榜样，也为敦化人民开发土地做出了贡献。称关氏家族为敦化土地的早期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

昔日“四大门”老关家

关维世

我们老关家属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原住在北京前门里，先祖曾在朝廷做官。乾隆年间，朝廷动员京旗人屯垦东北时，先祖带领家人及家役、院公、农丁等共300余人移居吉林龙潭山，后又迁到敦化成记号定居，“跑马占山”开荒种田，成为敦化地区早期的开垦户，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老关家定居成记号以后，又分成“六大支”。“四大门”就是其中主要的一支，不但人口多、占地面积大，而且位于交通要道。家业迅速兴旺起来，又兼营客栈，生意兴隆，闻名遐迩。吉林、沈阳、牡丹江、宁安、珲春、北京等地的一些客商，也知道“四大门”老关家。

“四大门”的由来

“四大门”系先辈阿新爱斯所创建，位于当时的官地至额穆公路之间，今西甸子屯西北，距官地约九华里，距今大荒地也是九华里。“四大门”前面是广阔的平地，后面是林木茂密的山丘，有一条小河从屯前流过，可谓山青水秀，地肥景美。

先辈阿新爱斯为了修建住宅、庭院，特到京城请来了建筑高师“张妈妈”，设计并指导建宅工程。

"张妈妈"曾在此住了很长时间才返回北京。建房材料有一部分从吉林、沈阳、宁安运来，建成的房屋共400余间，都是等级式的四合院。房子多数是清房，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庭院规整，院内还栽了许多花草树木。庭院分四个大院，每个大院都修建了非常壮观的院门，高大鲜明，过往行人无不仰首观看，得名"四大门"。《额穆县志》载："旗姓自民国后，多译汉音，为一字姓，然其渊源尚可考也。额穆旗族皆满人，有后列数姓：关姓，即瓜尔佳氏，归县城东南，四大门屯，即关姓四大支所居，因此得名。……"（人称志篇）

"四大门"屯主要由四个大院组成，兄弟四人依次排列分别居在"大西院"、"大东院"、"东腰院"和"店房"。"店房"是最小的弟弟关喜（即我的曾祖父）的住所。

"店房"之名由何而来？说来话长。高祖去世后，四位曾祖分家，前三个年龄较大，老大已经40多岁了，可老四才只有3岁。分地时，老大分得今西甸子一带的地，老二分的地在现杨家屯，老三分的土地在现八棵树屯一带，只因哥仨均为嫡业，均分得良田一、二百垧。老四为后母所生，未分得良田。土地分完后，老大对后母说："额娘，地分完了，我们哥仨个，每人分了100多垧地，四弟尚小，未成人，将来还得成家，给他分的地最多，有1000多垧。位置从咱家往北一直到大江边，全是他的地。"不知原委的老四母亲听后很高兴，说："好哇，他年幼，你们几个大阿哥向着他点。"就这样，"四大门"以北，包括现仁和一带的大片荒山野岭均成了老四的地产，却无一块可以耕种的良田。于是，我的曾祖从咸丰年间就开起客店来。所以，我们这支的旧居被称为"店房"。

"四大门"关家人丁兴旺，光绪初年是最兴盛的时期。四个大院合计有近300口人，连同家役、管子、外柜、院公、佣人等，有500多口人。平日里，过往行人、客商和访亲问友、拜老看少者，络绎不绝，好不热闹。逢年过节，来拜访致贺者，更是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大年三十晚上，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初一早上，院门口鞭炮纸屑铺地厚达一层，显出大户富家气派。

当差保国

敦化地区的关姓人家，均系正白旗瓜尔佳氏，属额穆赫索罗满洲正白旗左领衙门管辖。"四大门"关家有许多人曾先后在额穆赫索罗左领衙门内任过官职。"大西院"的关苏材，人称"苏大老爷"，就在该衙门里任过官职。以后，他荣转高升，官至四品，朝廷曾授予顶戴花翎。此外还有关富全、关富春、关德玉（字化东）等，也都在满清政府任过文武官职。比较晚一点的还有关丰材，人称"丰八老爷"，是"大西院"的后孙，悦清阿（字清泉），人称"悦老爷"，也在额穆任过职。

清朝政府开始就有明确规定：凡满洲旗人男孩生下来就有银饷，据说是24两。以后，由官厅年年发给奉禄，一直供养到18岁。成年以后则须服兵役，当差保国。所以，我们的先辈人大多都在清军中当过差，有的人还立过汗马功劳。如"东腰院"的祖父辈关××，曾到新疆参加平定叛乱，戍边保国，战死在边疆，死后受到诰封。本家祖父辈及父辈中，也有不少人曾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为保卫国土，与沙俄军队浴血奋战。我的六位祖父中就有三位在中俄边界地区参加过抗俄战争。当然，我们老关家也有人随清军一起打过"长毛"，

即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

家族“察玛”

满族人具有延袭上千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四大门”老关家也不例外，他们保持着满族人的生活特点。别的不说，就说祭祖、跳家神吧！一般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都要杀猪屠羊，大操大办。祭天、祭神、祭祖，这项活动要由本家族的“察玛”主持。所以，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察玛”。“察玛”一般由本族中精明强干，通晓满文满语的男人担任。“四大门”及“六大支”关家的最后二位“察玛”是“东腰院”的关庸和“大西院”的关云志。关庸是我的父辈，伪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去世，时年84岁。关云志是我的下一辈。“察玛”必须会摆弄满族特有的乐器：弹弦、拍板、摇鼓、击锣等。举行祭神、祭祖仪式时，他手里舞着司刀，嘴里念着满语祝词，试图免灾、赐福、祛病、祭祖，有点象汉族中巫师的样子。

“察玛”必须懂得满族人的一切规矩，知道本家族的主要事情，大小事情起参谋作用。所以，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练才能胜任。多由老“察玛”带新“察玛”，象学徒似的。据说，我们家族最后一位“察玛”关云志就很出色。关云志是我的堂侄，他是悦清阿的长子，1966年病逝，享年74岁。他对关家上辈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若活到今天，我们调查关家家史可就方便了。他的儿子关振兴已经68岁了，也是“三世同堂”了。这样推算一下，我们“四大门”老关家已经传到第九代人了。

“四大门”的毁灭

为什么曾经显赫一时的“四大门”如今荡然无存了呢？这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有直接关系。1931年“9·18”事变，日军侵略我国东北，第二年强占“四大门”屯。侵略者在这里无恶不做，关家人自发地奋起反抗，打死几个日本人。于是他们疯狂地进行报复，抢走大量财物后，又放火烧了房屋，大火一直烧了三天，一个好端端的“四大门”古屯，被日本侵略者化为灰烬。多年建造的深宅大院变成残墙断壁，一片废墟，仅剩下8个光秃秃的大门柱子。关家老少被迫分散流落各处。

五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四大门”屯仅有的痕迹8个大门柱子也早就不存在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四大门”老关家的情况，仅以此文留与后人。

伪满"敦化县公署"的设置与变动情况

马义教

我于1933年（伪大同二年）1月间到伪"敦化县公署"，先后任科员、股长等职，计13年之久，直至光复。迄今虽时隔30余载，但对其设置及变动情况，尚可忆其梗概，兹特写出，供参考。

（一）

1932年（伪大同元年），伪"敦化县公署"设三科、两局、两处。即：总务科、行政科、司法科，警务局、教育局、田赋契税处、地方财务处。这些机构均未明确分股，其人员及掌管事项如下：

科别	职别	人员数	掌管事项	附记
总务科	科长	1	综合全科事务及全署公文稿件之审核	
	科员	2	办理上下行公文稿件、卷综保管	
	会计员	1	管理全署金钱出纳	
	统计员	1	办理县予决算	
	庶务员	1	物资供应、备品、清耗及修缮	
	收发员	1	收发文件、核对及盖印章	
	雇员	6	缮写文件	
	计	13		

行政科	科　长	1	掌管县内工农商业、林业交通、宗教	
	科　员	1	办理上下行公文稿件	
	雇　员	2	缮写文件	
	计	4		
司法科	承审员	1	审理民刑案件	
	书记员	2	审讯记录、民刑诉状受理、命案检验	
	雇　员	2	缮写文件	
	管狱员	1	罪犯之管理、教育	
	看　守	4	罪犯之看管	
	计	10		
教育局	局　长	1	掌管全县教育	
	视　学	1	视察全县教育与管理、教员之进退任免	
	学务委员	2	协助视学	
	会　计	1	局内之金钱出纳、予决算办理	
	收　发	1	局内印信保管、文件收发	
	雇　员	3	缮写文件	
	计	8		
警	局　长	1	综理全局事务	
	课　长	2	掌管警务、司法、保安等事	

务	巡官警长	6	缮写及收发文件	
	看守所长	1	现行犯临时拘留之管理	
局	计	10		
田赋契税处	主　任	1	征收田地租税，田地产买卖，契税，换照	
	办事员	3	分掌上项事务	
	计	4		
地方财务处	主　任	1	征收地方税、营业税，牲畜税	
	征收员	2	办理上项事务	
	会　计	1	金钱出纳、办理予决算	
	收　发	1	收发文件及印信保管	
	稽　查	2	调查税收、偷税，催征	
	雇　员	2	缮写文件	
	计	9		

（二）

1934年（伪康德元年），伪“敦化县公署”机构第一次变动：

1、总务科分文书、会计两股。

2、设内务局，将教育局并入。分设行政、教育、实业三个股。

3、司法科无变动。

4、设财务局，将田赋契税处，地方财务处并入。分设征收、理财两股。

5、警务局设警务、司法、特务三个股和一个电话处。

上述各科局人员及掌管事项如下：

科局别	股别	职别	人数	掌管事项	附记
总务科		科长	1	署内人事之进退任免、奖惩、文稿审核	1934年开始来日系参事官两名掌管县政实权又来日系经理官一名掌管会计股财务局财经收支。
	文书股	股长 科员 雇员	7	文件收发文稿缮写 印信保管、盖用 文卷保管	
	会计股	股长 科员 办事员 雇员	6	署内金钱出纳 予决算办理 修缮、供应	
		日系特别会计	1	管理鸦片零卖所、金钱收支及烟土加工	
		办事员	1		
	计		16		
内务局		局长	1	综理全局事务	
	行政股	股长科员雇员	4	全县土地、交通、宗教、建筑	
	教育股	股长视学科员雇员	4	全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人事	
	实业股	股长科员雇员	3	全县农工商业、林业、矿业	
	计		12		

司法科		承审员	1	审刑、民案件	
		书记员	2	审讯记录民刑诉讼状受理、命案检验	
		雇员	2	缮写文件	
		管狱员	1	罪犯之管理、教育	
		看守	4	罪犯之看管	
		计	10		
财务局		局长	1	综理全局事务	
	征收股	股长科员雇员	6	征收田地租税、地方损契税、营业税	
	理财股	股长科员雇员	3	管理县有财产（如房产及学田）	
	计		10		
警务局		局长	1	综理全局事务	局长首席指导官均警正级
		日系首席指导官	1		
	警务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7	警察人事任免 俸给奖惩 武器装备	股长系警佐级
	司法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5	现行犯及违警处罚	

警务局	特务股	日系股长 警尉 警尉补 警长	6	广泛侦察思想动态着重宗教团体及知识分子有无反满抗日思想。外侨事务	特务工作极为秘密、其行动可不通过警务局长及县长
	电话处	技士 技术员 电话生	5	警备电话的架设、修理	
	计		25		

（三）

1937年（伪康德四年），伪“敦化县公署”机构第二次变动：

1、原总务科改称为庶务科。分设庶务、经理、文书三个股。

2、原内务局改称为行政科。分设实业、教育、土地、拓政四个股。

3、敦化县法院成立，原司法科并入。院长为满系，书记官置日系一名。

4、原财务局改称为财务科。分设征收、理财两股。

5、原警务局改称为警务科。除原有警务、司法、特务股外，增设一个保安股。

以上四个科人员及掌管事项如下：

科　别	股　别	职　别	人数	掌　管　事　项	附记
庶		日系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务科	庶务股	股长、科员翻译、雇员	5	署内人事进退、任免、俸给、奖惩、福利（警务科除外	
	经理股	股长科员办事员雇员	7	署内金钱出纳、予决算、供应、修缮	
		日系特别会计	1	管理鸦片零卖所、金钱	
		办事员	1	收支及烟土加工	
	文书股	股长 科员 雇员	6	文件收发、文稿缮写与打字 印信保管、盖用 文卷保管	
	计		21		
行政科		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实业股	股长科员雇员	4	全县农工商业、林业、矿产	
	教育股	股长视学科员雇员	6	全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人事	视学两名其中日系一名
	土地股	股长科员雇员	6	土地执照存根保管、换照补照、绘制鱼鳞图。	
	拓政股	日系股长科员雇员	4	满拓用地、鲜拓用地、收买发价	
	计		21		
财务科		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征收股	股长科长雇员	6	征收用地租税、地方捐契税、营业税	
	理财股	股长科员雇员	3	管理县有财产（如房产及学田）	
	计		10		

警务科		科　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日系首席指导官	1	
	警务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　警长	7	警察人事任免、俸给奖惩、武器装备
	司法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5	现行犯及违警处罚
	特务股	日系股长警尉警尉补警长	6	广泛侦察思想动态若重宗教团体及知识分子有无反满抗日思想、外侨事务
	保安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7	维持县内秩序（如防火、防盗、防谍等）
	电话处	技士技术员电话生	5	警备电话之架设、修理
	计		32	

（四）

1941年（伪康德八年），伪"敦化县公署"机构第三次变动：

1、庶务科无变动。

2、行政科除保留土地、教育两个股外，增设地方、民籍、劳务、烟务、土木、水道六个股。

3、设立开拓科，原行政科的实业、拓政两个股并入。分设拓政、农产、殖产、林产四个股。

4、财务科无变动。

5、警务科除原有警务、司法、特务、保安四个股外，又增设督察股。

6、增设经济科，分设统制、工商两个股。

以上六个科人员及掌管事项如下：

科别	股别	职别	人员数	掌管事项	附记
庶务科		日系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庶务股	股长 属官 委试 事务员 雇员	6	署内人士进退、任免 俸给、奖惩 福利(警务科除外)	股长均系官属级。 试委即委任官试补
	经理股	股长 司计 属官 事务员 事务员补 雇员	8	署内金钱出纳 予决算 供应 修缮	特别会计并入行政科
	文书股	股长委试 事务员补 雇员 打字员	6	文件收发、文稿缮写、 印信保管、盖用 文卷保管	
	计		21		
行政科		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土地股	股长、 事务员补 雇员	4	土地执照存根保管 换照补照、绘制鱼鳞图	
	教育股	股长视学 属官、 事务员补 雇员	6	全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人事、教课书分配	

行政科	地方股	股长、属官委试事务员雇员	7	全县各村筹备处及人事与义会	
	民籍股	日系股长委试事务员、雇员	5	全县户口管理、户口调查、国兵适令检查	
	劳务股	日系股长委试事务员补雇员	5	全县劳工调配及勤劳俸仕	
	烟务股	日系股长委试事务员事务员补、雇员	7	各管烟所业务及人事 康生医院之管理	
	土木股	日系股长技士、技术员事务员补雇员	10	全县桥梁、道路补修及新建	
	水道股		10	县城水道管理及扩建	未设股长
	计		55		
开拓科	日系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拓政股	日系股长委试事务员事务员补、雇员	7	满鲜拓用地收买发价、开拓地租金经理、开拓团之指导	
	农产股	日系股长技士技术员事务员补 雇员	8	全县农业生产之指导 大牲畜防疫及配种	
	林政股	日系股长委试、事务员补雇员	5	县有林木之采伐及运出	
	计		21		

财务科		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征收股	股长属官委试事务员、事务员补雇员	8	征收田地租税、地方捐契税营业税	
	理财股	股长、委试事务员雇员	4	管理县有财产（如房产及学田）	
	计		13		
警务科		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增设经济警尉二名直接归科副领导
		日系科副	1		
	警务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7	警察人事任免、俸给、奖惩、武器装备	
	司法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5	现行犯及违警处罚	
	特务股	日系股长警尉、警尉补 警长	6	广泛侦察思想动态着重宗教团体及知识分子有无反满思想、外侨事务	
	保安股	股长、日系指导官警尉警尉补警长	7	维持县内秩序（如防火、防盗、防谍等）小讨伐	
	督察股	股长、警尉警尉补警长	6	纠察警务人员有无违法乱纪、直接报告省厅。	

	电话处	技士 技术员 电话生	5	警备电话之架设、修理	
	计		38		
经济科		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统制股	日系股长委试、事务员事务员补	5	统制品之分配、价格规定	
	工商股	股长事务员补、雇员	4	工商业之指导	
	计		10		

（五）

1942年（伪康德九年）开始地籍整理，增设一个地政科，原行政科的土地股并入地政科，分设事业、管理两个股。其人员及掌管事项如下：

科别	股别	职别	人员数	掌管事项	附记
地政科		日系科长	1	综理全科事项	
	事业股	日系股长 属官技士 委试雇员	20	城市房基地测绘，农村民有地开拓用地测量整理、航空写真保管。	
	管理股	股长 事务员补 雇员	4	土地执照存根保管换照、补照、开拓用地军用地。	
	计		25		

（六）

1944年（伪康德十一年），地籍整理完毕，原有事业股改称地政股，管理股改称地籍股，同时又增加一个登录股。其人员及掌管事项如下：

科别	股别	职别	人员数	掌管事项	附记
地政科		日系科长	1	综理全科事务	
	地政股	日系股长 属官、技士委试雇员	10	编制土地登记簿、测绘航空写真保管。	
	地籍股	股长 事务员补 雇员	4	土地执照存根保管换照、补照、开拓用地、军用地出卖	
	登录股	登录官 委试 事务员 雇员	7	土地买卖之登录，所有权之确定。	
	计		22		

从伪"敦化县公署"机构的几次变动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时期采用的毒辣手段。

1933年成立"鸦片零卖所"，公开卖鸦片、吗啡、海落因。城乡居民中毒者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的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为犬嚼、狼啃。

1935年颁布特别治安法，警务局对于盗窃案，可不通过县长，承审员直接处以死刑，使多少无辜者被严刑逼供，惨遭杀害。在农村强制实行归集团部落，深沟高垒，由警察督率自卫团昼夜严守。

1941年伪警务科，特别编制经济警察，负责经济统制。

人民生活必需品，大都变成统制品：棉布不许穿、白酒不许喝、大米白面不许吃，猪、牛、羊肉一律实行配给。如有违犯，就以“经济犯”论处。

1942年，特务、警察及宪兵对于知识分子加强控制，稍有可疑，便拘入“矫正院”长期拘留矫正，有些被活活折磨死。另外，通过开拓政策，将大片良田强行收买，大批移民迁来。当时，黑石村的日本开拓团最多。这些日本移民种地者少，坐享其成者多。他们把原有土地主人变成佃户征收租税、出荷粮。如有交晚或少交者，不是打就是骂。回忆起来，真令人痛心。

日伪时期敦化的街村组织机构

杨明谷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了严酷的统治，在各地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县以下的机构，前期是保、甲制，后期是村、屯制。就敦化而言，1940年蛟河县岭东部份划归敦化后，敦化全县共设10个街村。这10个街村是：敦化街、官地村、额穆村、黑石村、北黄泥河子村、沙河沿村、大石头村、维新村、大蒲柴河村和南黄泥河子村。

1、村公所

村公所是村的办事机构，设村长1人，负责全面工作。村长的产生，是由日本人内定后，履行象征性的民主程序。另设助理员1人，辅佐村长工作。个别的村还设有指导员1人。指导员与村长平级，由县里指派，还有司计一人，是全村的总会计。以上4人是村的领导核心，下设若干办事机构。①、庶务系，类似今天的秘书科，设系长1人，雇员数人，负责机关日常事务、文件收发等。②行政系，设系长1人，办事人员数人，负责全村屯、排干部管理。对各屯联络员的领导、地方义仓管理等。③财务系，设系长1人，办事人员数人，负责全村财政税收。④实业系，设系长1人，办事人员数人，负责全村农工商业的管理与指导。⑤国兵民籍系，设系长1人，办事人员数人，负责征兵、民籍等。县城所在地，设街公所。街公所的组织机构与村公所基本相同，不过不叫系，而叫“课”。如民政系叫民政课。

街下设区，区下设邻、组。村下设屯，屯下设排。屯、排长是义务制。每屯有雇员1人，后期叫联络员，负责日常事务，是村的派出人员，待遇是薪金制。

2、自卫团

自卫团是村一级的武装组织，设团总（团长）1人，团员数十人。经费由村财政开支，领导权归警察署。

3、交易场

交易场是个地方粮库，只入不出。是日本人设立的专门负责搜刮农民粮食的机构。每年秋冬把大批"出荷粮"强行征入，并负责运走。交易场主任大都是日本人，是县的直辖单位。小的村不设交易场，有的与兴农合作社合为一体，有的则另设。

4、兴农合作社

兴农合作社负责发放农业贷款，推广新式农费和农业技术。村公所的实业系是行政部门，兴农合作社则是具体业务部门。归县直接领导，同村是平行单位。合作社设董事1人，办事人员数人。

5、警察署

警察署是地方"治安"管理机构，实行垂直领导，管辖区域与行政区划基本相同，名义上与街村是平行单位，实际要高出街村一筹，当时是一个令人听之不寒而慄的机关。日伪时期在敦化共设10个警察署，署下设若干分驻所。这10个警察署是：大石头警察署、敦化警察署，沙河沿警察署、南黄泥河子警察署、马号警察署、三台山警察署及黄泥河子警察署、额穆索警察署、官地警察署。署内设署长1人。（警衔多为警佐，也有个别是警正的）。署派1人（一般是警尉，全部是日本人，名义是协助警长工作，实际是独览大

权，并对署内中国人起监视作用）。下设警务、特务等若干系。系长多为警尉，也有警尉补和警长。后期取消警尉补这一警衔，改为监督警尉和事物警尉。各系配有警士数人，做为办事人员。地方上除村公所的行政工作外，其它一切都由警察署管理，所以警察就是当时农村基层的太上皇。

至于学校、商会、邮局、医院、气象、满拓，后期个别地方的防空监视哨等单位，是属于企事业单位，或是上边的垂直隶属机构。

日伪时期东北基层地方组织机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日臻完善的统治网，是一架桎梏人民的机器，它把东北人民捆得牢牢的，以便于听凭他们的摆布和压榨。

在敦化建政的前后

莫义道

行军路上

1945年，我在太行山二分区二十八团二营任教导员。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战胜利之际。9月，我奉命调太行二分区，筹备组成一个干部团架子，由二十八团团长陈福章、张国[illegible]领队到东北接受新任。干部团编成两个中队，我们一队一支部由刘华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我为副指导员兼副支部书记。

1945年10月13日，干部团从太行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涉县出发，经过冀中平泉马兰关、承德、锦州等地，于10月26日到达沈阳。到沈阳后，我们住在沈阳铁路局大楼招待所，平时不准随便外出，如必须外出，一定要更换便衣。两天后，干部团架子被分配到新民县大有镇警备二旅各团、营去了，我被分配到旅政治部任民运科长。干部团被分配后，在大有镇新民屯进行了整训、充实，并给各团营配备了干部。之后，部队调到黑山县，与河帮子的国民党军队相对峙。

警备二旅旅长邓克明为做宣传工作，到黑山县朝阳镇、桦甸县召开绅士座谈会。座谈会由政治部发通知，我来主持。会议主要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八路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八年抗战的功绩，其次控诉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从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罪行。除此以外，我们对“西安事变”，张、杨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做了大量宣传。这些宣传对绅士们促动很大，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扩大了我党和我军的声威。

1946年2月10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部队就顶着寒风和大雪出发了。当晚，在秀水河宿营，然后经过两天的行军，部队到达新开岭脚下。第二天我们翻过新开岭，于1946年3月24日傍晚到达三台子附近。一营准备进驻三台子。我们二营准备进驻官屯子。当时，我们不知道三台子有土匪。当部队快到三台子时，带路的老乡就不肯走了，他对我们说：“老总，前面就是三台子了，你们自己走吧。”老乡走后，我部四团一营一连一排三路纵队行到距官屯子200多米时，突然枪声大作，土匪的机枪、步枪一齐向我军猛扫过来，一营一连一排排长立即命令队伍散开，但由于积雪太深，战士们拔不出腿来，行动迟缓，在土匪密集的火力下，一排战士几乎全部牺牲，二排、三排只有一半人员撤回，这一仗一连损失惨重。

在这紧急情况下，团长曾涛命令二营增援，但是土匪凭着高高的土围子继续猛烈射击。为了避免更大伤亡，团里命令部队撤到三台子后面的官屯子宿营。在紧张的战斗中，二营五连有个文化干事负了伤，我把他背下阵地，他伤口流的鲜血，把我的棉衣都浸透了。

1946年3月25日，四团把与土匪作战的情况向邓克明旅长和袁克服政委作了汇报。二位首长听后即心疼又气愤，并批评了团里的轻敌麻痹思想。第二天夜里，部队在旅长的部署下，在靠山屯与土匪继续作战，双方互有伤亡。天快亮时，土匪发现情况不妙，便突围逃跑了。

建立额穆县民主政府

二旅进入敦化以后，除进行剿匪外，还积极帮助建立和加强中共敦化县委、县政府及下属机构的领导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奉命调到额穆县任县委书记，并抽调一批干部到额穆县工作。

接到命令后，我同县长何佩（何佩离任后，赵东黎继任额穆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董福汉（董福汉调离后，鲁峰同志任县公安局局长）一行三人于1946年3日上旬骑马从敦化出发，途经额穆所管地区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及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宣传日伪军的残酷统治，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没饭吃，只好吃橡子面，如果吃大米，就是所谓的经济犯。蒋介石一贯实行对日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把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卖给日本人等宣讲使群众听得入了神，不少人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大会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点干粮，又骑马上路了，大约10点钟左右到达了额穆县县城。

在额穆县，我们撤销了原维持会，筹备成立我党县政府；召集在伪满时期没有做过坏事的群众开座谈会，了解当地情况和风土人情。同时，通过填写表格形式了解情况，逐步筛选出三个县政府干部，其中一个是原维持会中的戴××任城关区区长，一个是曾在伪满时期替人写信的王××任县政府秘书，再一个是额穆卫生所负责人胡××任民政股长。这样，"额穆县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

在原维持会自卫队的基础上，清除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员，成立了县公安局。公安中队也开始维持社会秩序，并解散了原有卫队。

我们进额穆后，与苏军关系一直很融洽。当地苏军中队

长叫马沙洛尔，另外有个中队政委即苏军党代表，我们经常在县委亲切闲谈。据苏军中队政委讲，他曾为列宁开过车，列宁遇刺那天，就是他开的车。我们开会时，他也经常来旁听。有一次，我们请他讲话，他说："苏军解放东北，不是侵略，而是建立友好的联盟。"

处决恶霸地主张久龄

建立县政权初期，县政府经常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坚决打击伪满时期作恶多端的汉奸。经过群众检举，揭发信象雪花般飞来。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大量揭发材料，确认张九龄是额穆县最大的恶霸。他曾经任日本额穆县开拓团团长兼伪保长，霸占老百姓土地200多垧，并雇用长工。残酷的剥削使额穆县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群众称张九龄为"南霸天"。

县公安局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逮捕了恶霸地主张九龄。斗争地主是很复杂的，正当政府准备召开公审张九龄大会时，突然又出现了百名群众保张九龄的怪现象，我们觉得很意外，很反常。我就决定亲自去了解情况，处理这一突然事件。

我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战士，来到张九龄住的村张家街，召集保张九龄的群众来开会，会场一下子来了100多人。我询问了他们保张九龄的原因，一开始群众交头接耳，互相张望，并无一人站出来回答。我又说："愿保张九龄的人，到东面来坐！"很快过来两人。随即，我严肃地询问第一个走过来的人，问他为什么要保张九龄，一定要把道理说清楚。这个人从裤兜里拿出一封上有100多人签名的揭发检举信，说："我不是保他，而是要告他的！"我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先告后保，而现在又要告张九龄呢？"他回答："没法子啊，张九龄的家属写好保证书，挨家挨户要人签名。他们还

威胁我们说，土八路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还是为你们留条后路，中央军才是国军、正规军。”原来老百姓是怕变天啊。真象大白了，我立即向群众揭露了张九龄家属的反动宣传，同时也向群众宣传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老百姓唯一信赖的党，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把中国老百姓从被剥削、被压迫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有共产党的存在，天是不会变的。听了我的宣传后，再也没有人出来保张九龄了。

1946年5月端午节，经上级地委批准，在额穆县城东大庙前的空场，举行了公审恶霸地主张九龄的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愤怒的人流如洪水涌向会场。上午9点多钟，我宣布公审大会开始。然后，由民兵把五花大绑的张九龄押上台来。群众见到仇人个个义愤填膺，“打倒恶霸地主张九龄！”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老百姓说：“民主政府给咱们作主，解放军是靠山，咱们怕啥！”群众争先恐后上台揭发控诉张九龄的罪行，公审大会达到了高潮。我在大会上讲了话，进一步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全面揭发了恶霸地主张九龄的罪行。最后，由县长何佩宣读了张九龄判决书，当群众听到判处张九龄死刑的决定时，一致把手举起来，高呼拥护政府的决定。在愤怒的海洋中，张九龄被民兵押到东南谷地处决了。

张九龄被处决后，由于罪大恶极，人人痛恨，很久无人收尸，处决张久龄真是大快人心。群众纷纷说：“民主政府为咱除了一大害，我们翻身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啊！”

镇压席德珍

席德珍在伪满时期曾经当过日本人的忠实走狗，任过协和会会长、保长。日本战败后，席德珍拉了20多人在山上当土匪，后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投降我军，被编入黑石区区

干队。但是，席德珍一贯表现不好，他经常威胁同村的老百姓不许为难他家兄弟，不许检举他过去的罪行等等。鉴于他的种种错误，我们请示了地委，决定把席德珍清除区干队。1947年初，我们把区干队的人员请到区政府吃饭。我把席德珍单独请到一个房间，席间趁他不注意，缴下了他的匣子枪，并派人把他看守起来。

解除了席德珍的武装后，我们发动群众揭发他的罪行。通过群众的检举，我们了解到，席德珍不但在伪满时期当过黑石区协和会会长、保长，而且在东北解放后，组织国民地下军，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杀人，抢掠老百姓财产，群众都称他是"活阎王"。凡是被调查的群众无不咬牙切齿，一致要求枪决席德珍。

1947年春节前夕，我们在黑石区政府搭了个台子，召开了1000多人的公审大会，大会由我和公安局局长鲁峰同志主持。会上，群众纷纷上台清算、声讨席德珍的滔天罪行。公审大会后，席德珍被依法处决。群众高兴地说："处决了活阎王，人人喜洋洋"。

1947年10月中旬，在敦化县成立了独立五团。部队整编后，敦、额两县合并，我调到县大队任政委兼城防司令部政委。大队长是林永德，后来继任者有路长生、徐福德。等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我奉命调到长春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从此，我又开始部队生活了。

敦化早期基督教会概况

刘志来

一、基督教传入敦化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一世纪开始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间，到四世纪，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1054年，基督教分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十六世纪，罗马公教内部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陆续产生了基督教新教各宗派。从此，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鸦片战争后，基督教新教各宗派陆续传入我国。

光绪年间，基督教开始传入敦化。创建之初有传教士胡天锡，受吉林教会管辖，由外国人操纵。基督教会原址在今敦化旅社一带，原有三间草房。敦化基督教属长老会派别。光绪26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蔓延到敦化，牧师逃走，拳民一举烧毁了教堂，杀死了12个教徒。光绪29年(1903)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向教会赔了抚恤金。教会为死去的教徒立了碑。不久，在十字街西路北，买了两垧地，重新建了五间礼拜堂（在今四商店以西）。当时，教会的经费来源是差会供给（差会是由外国人兴起的国际性教会组织，为各国的贫困教区出钱扶助），传教士亦由差会支派。

1906年，敦化基督教会由牧师戴永胜掌管，并连任三次(按基督教教规牧师只能三年一任)。戴牧师死在任上，死后葬

在基督教后院。

1923年，敦化基督教会从辽宁省请来吴国期牧师。他连任6年，后吴牧师因病离职。这时教会的经费达到半自给的程度，但还没有与差会经济完全割断。

1933年，教会由吉林惠彰德牧师（英国人）派来董英堂准士传教。这期间，吉敦铁路修复，信徒在教会的土地上修筑房屋，供董准士居住，7年内不纳租金，以后继任牧师。继董准士之后，又派来一位杨教士（山西人），但后来不知何故，董杨二人全部调换。当时的人员调动、安置及经费开支都由英国人惠彰德一人掌握，教会无自主权。

二、敦化基督教的发展

1934年，由吉林派来兴纯历准士，在敦化封立牧师。兴纯历系辽宁铁岭县人，沈阳神学院毕业。这时，敦化基督教会已有房屋70间，经费完全可以自给。差会因款项不足，无力负担教会的费用，来往也受到限制。因此，教会脱离了差会的控制，经费来源依靠房租自给。以后，由东北17个教派成立了满州基督教总会，至此，外国人全部被赶到山东维县一带，东北的教会摆脱了外国人的控制。兴纯历在敦化基督教的5年时间里，教会的经济状况最好。兴纯历本人月薪60元，准士40元，教士20元。5年后，兴纯历调到龙井。

1940年，由吉林请来谢玉苏牧师，（谢玉苏，辽宁铁岭人，沈阳神学院毕业。）这时教会信徒有200多人。谢玉苏连任牧师6年，之后回到吉林。

1942年至1949年，教会由邱敬久继任牧师（邱敬久，沈阳人，营口学道馆毕业。），赵纯豐（女）任传教士（沈阳人，北京香山神学院毕业）。

1940年至1949年是敦化基督教会最兴盛的时期。

解放后，教徒逐年减少，经费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邱牧师回到沈阳，教会房产全部被三野病院占用。教徒们礼拜聚会，只好借用东关刘殿忠执事的房子，直到1966年文革初期，教会才停止礼拜。

三、基督教会的内部设施

敦化基督教会设在十字街道西（现四商店后院），占地面积2垧，房屋70间，5间做礼拜堂，4间做传教人住宅，牧师占2间，传道人占1间，堂役占1间。教堂设在5间大瓦房中，教堂内通常设镂刻有讲桌、写字台、风琴、钟仪及凳子60多个。教堂院中立光绪奉旨石碑一块。

四、教会的神职人员

敦化基督教会依次设牧师、长老、执事。牧师一般都是外请，掌管查经、礼拜、讲道等事务，有时到信徒家探望患病或有事的信徒，为患难的的信徒祈祷。长老、执事由当地信徒担任。长老掌管教会日常事务，并负责外请传道人。执事掌管教会的一切事务即杂务，包括收房租、买东西、取暖等。长老、执事都没有月薪，纯属义务性服务。

五、教会的活动程序

教会每个星期做一次礼拜，两次查经会，一次祷告会，一次妇女会。每年过一次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

礼拜是全体教徒聚会的日子，先由牧师讲经传道，然后教徒唱诗三次，唱诗即唱圣经歌和赞美诗。

查经会一般在星期二、五举行。查经就是考查圣经，圣经的见证，新旧约对照，以鉴证神的真道。

祷告会在礼拜三举行，主要祈祷圣徒生活，有做错事的信徒祷告忏悔，体现信徒的修养。祷告会上谁有病为谁祈

祷。

妇女会多半是不识字的妇女参加，目的是来教会认字，听讲道、唱歌。

圣诞节是每年的12月25日信徒聚会，纪念耶稣为拯救罪人降生在世，普天同庆。每逢过圣诞节，信徒都自愿捐钱，多少不限。

复活节，即纪念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日子，信徒聚会，唱歌、讲道。

感恩节是信徒一年来蒙神在各方面的恩典，于每年秋后聚会举行感恩仪式。

解放前“敦化卍字分会”概况

刘志来

敦化卍字分会的兴起

世界红卍字会兴起后，蔓延到中国各地，各省有多人参加，东北各大都会也有很多巨绅大僚加入。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借扶助宗教麻痹中国人民，从而在东北各大都市纷纷成立道德会、佛教会、道教会、红卍字会、家理教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等，各种教会如雨后春笋应时兴起。东北人民因处在日军的蹂躏之下灾难重重，无法解脱，许多人以信仰各种不同宗教以求解脱灾难。在这种形势下，敦化卍字分会于1939年（伪康德7年）秋季随之而诞生，参加者贫富皆有，但多数是工商业者。

内部设置

敦化卍字分会设在当时北大街西胡同的一所大瓦房里。前厅是正瓦房6间，东3间分别做为客厅2间，办公室及宿舍各1间，西2间为义学校教室，中1间为大门，门上悬挂刻“道院”二字扁额。中厅正瓦房6间，内4间中设释道耶回祖木质神位一尊，横木扁额上刻“教垂圻鄂”四字。两边设五院，左侧坛院供岳圣神位，次左坐院供达摩又经院，供普贤、普净神位。右侧统院供孚圣、吕祖、吕在神位，次右慈院供济颠、孙真人神位，又宣统供孟子（各神位均系木质牌位），各神位前各设供案，陈设铜制香炉、灯烛等彝器。五院各设

掌院务人员1人，东2间为经堂坐堂，西1间为储存祭器灯油等仓库，又正殿前檐接建拜殿5间做为朔望拜神之用。

女社

女社系供观世音菩萨神位，设在后院5间草房中。内4间供观世音菩萨神位，左右供设，正位房额木质，横书"正位居体"四字。靠西一间是女供奉老修1人的宿舍，是一位50余岁的老处女（不知姓名）。

参加院会及经费来源

初次参加者称"修方"不收费，愿入会者为会员，每月依个人经济能力自愿交纳会费1—4元不等，做为院会香炉、用人之费用，也做为学施棺、施粥、学生书笔费、旅费等慈善事业费用，向不外募。

事务人员

卍字分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掌管院会一切事务。道院内设掌院5人，分掌经慈坛教坐事务。设司仪1人，掌管朔望拜神赞礼。以上均为名誉职务，不支薪。

支薪者，设文书1人，月薪60元，掌管经费收支及文书。设前殿供奉1人，月薪30元，掌管香烛，清扫神殿。设女社供奉1人，工资20元，掌管香烛，清扫神殿。设义学教师1人，工资40元，掌管义学儿童课读。设夫役1人，月薪30元，掌管勤杂。

六、书画坛概述

卍字分会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补助办法。

每年秋后由吉林省红卍字会指示定期函请地方各机关监临，并由吉林卍字会派来的人员开书画坛一次，由坛训先期规定书画价目每联为10元至30元，由会员自愿请领做为补助经费之用。但请书画者均系财力能办的会员，概不勉强。

开坛情况。开坛时由省会派员，内有纂方（扶乩笔者，2人，东西夹供案对面站，各人手执横杆的两端。横杆中间有笔槽安装木笔或五色笔随时更换，木笔向供案沙盘上写字，每写一个字由测方一人高唱某字，另有録方二人分録，特别快。沙盘上每写一个字唱毕后，随即有一人持木版把沙抹平，再写再抹。为此分工时间不长，即録出长篇大论或短篇，指示某人的坛训、诗歌、训辞均有亦云奇观。

书画坛。写字画用墨笔，写彩画用五色笔，均用宣纸。亦由纂方两人各执横杆两端，中间安装毛笔如书坛，用墨笔画坛，用五色笔随时更换，写的字风神有力，词句流畅，画的画雄伟清逸，姿态天成。尤其是下款屑名字小如钱俊秀可观，是人力所不及的。

经　　院

经院设经掌1人，担任集合及谕经事宜。经院多在晚饭后灯下人闻清静时诵经，每次需2至3小时。诵的经是太乙真经、金钢经，每次只诵一种。经院每次诵经人数8至10人或10几人，在经堂设低案，每人坐小方凳上，面前放1本经。诵经时由经掌摇铜铃，以齐音调朗诵，诵至卷终为止，然后各人回家睡眠。每次不能长诵，每周期诵8至10天，因人忙或厌倦就停止，有时每隔3、4个月举行一次。

坐　　院

坐院设坐掌1人，担任集合及坐功事宜。时间多在早晨饭前来院坐功，需坐40分钟。每次人数10人、20人不等。坐时在经堂设有矮小方木凳数10个，上有棉垫每人坐1个。坐法是体直腿曲，两手置两膝上，两目稍合下垂，呼吸轻细，有收心养气之效，坐至40分钟各人回家吃早饭，个人做个人的事。但也不能持久，情况与经院相同。

慈　　院

慈院设慈掌1人，管理施棺（须有本会组长证明其家贫即施棺1口），在冬季大寒季节，由会长会员等筹备棉衣施舍。其它施旅费及临时救济事业，因无固定经费因此未办。

统院及宣院

统院、宣院，虽各设统掌宣掌2人，但由会长兼任，并无任何事可做，只是备员而已。

领经领宝

修方及会首愿意领经领宝证章者，本会予先由吉林省卍字会请领太乙真经数10本修宝（红心形），会员证章（1分钱形式），刻的均系铜质烧磁），每次刻数10枚，工本费1枚2、3角，经1本1元，集有成数一并缴省会。

结　　语

敦化卍字分会系神道设教之一，至1945年"8.15"光复后停止。

侵华日军在敦化遗留的废、毒弹及处理

王义杰　王仁学　陈延生

自1931年9月23日，日本关东军兵野旅团清水支队，从吉林经蛟河侵占敦化时起，至1945年8月19日苏军进入敦化，日军投降为止，敦化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煎熬了整整14个年头。

日军在侵占敦化期间，曾先后修建了许多军用设施。1938年5月，首先在城区西郊原回民义地修建了一个永备机场(西机场)并修了一条铁路专用线。1942年，在敦化沙河沿又修建一个大于西机场的永备机场，亦修了一条通大桥车站路专用线。1944年还在官地的八棵树、秋梨沟、大蒲柴河三的铁处各修建了一个野战临时飞机降落场。在敦化北山、小山嘴子535.5高地上，日本人修建了炮台，小山嘴子山上配置的是要塞炮，口径为240毫米，因此535.5高地亦称炮顶子。

同时，日本侵略军在敦化还驻有重要指挥机关和大量部队。据资料记载，日军投降前，敦化驻有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第139师团约20000余人，指挥官是富永恭次中将，所属各部主要分布在沙河沿和敦化城内。此外，还有日本宪兵分遣队、日本独立守备队第8大队及满军两个团。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将他的司令部从牡丹江市迁至敦化。同年8月下旬，在敦化神社

（现农机公司一带），喜多诚一率僚属及两个师的兵力向苏军及88独立步兵旅分遣队（原抗联队伍）投降。

妄图负隅顽抗运进大批毒弹

德国法西斯投降前后，日本关东军妄图延缓其注定失败的命运，于1945年4月至1945年7月间，从外地向敦化运来大批弹药，其中大部分是化学毒剂弹。

据目睹者陈延生（原市民政局局长）讲："当时我是火车司机，经常在图们至敦化区间跑车。仅1945年4月至7月间，日军就从五常、图们等地运来大批弹药，每天约有四列车（每列38节），均运到东机场，存放在河沿屯。东机场专用线以北的山沟里，没有库房，只好露天堆放。当时卸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农安、榆树抓来的劳工，这部分劳工在日本投降后，基本上都回乡了"。

据查，日军在秋梨沟站东也卸了大量弹药，主要存放在秋梨沟至河北屯沿途。另外还用汽车向大山、马鹿沟、江东等地运送了部分弹药。这些弹药在日军投降后分散遗留在县内各处，后因各种原因，部分弹药散落到存放点附近的沼泽、草丛、灌木林中。这些毒弹，使曾遭受日军蹂躏14年之久的敦化人民在日本投降后仍继续遭到危害。

仅在敦化，因废弹造成的伤亡人数达500多人，包括处理废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废毒弹伤亡事故。仅举几例如下：

（一）1954年，在搬运毒弹时，有一名车夫和一名民工中毒。

（二）1954年，在挖弹坑时，一名工人被炸伤。

（三）1958年，废委会工人付立叶，因毒剂容器破裂而中毒。

（四）同年，处理废弹工人刘洪尧、刘庆田，因毒液泄露，造成糜烂性染毒。

（五）1969年5月20日，官地公社官地大队铁匠炉用废弹打铁时，1发105口径的糜烂性毒剂弹破裂后，使在场的工人和社员9人染毒，经抢救脱险。

（六）马鹿沟一名村民因在六二三（今三三〇五厂）厂处理废毒弹现场活动，被染毒，腰部糜烂，经抢救治愈。

（七）1956年，废委会工人因废弹爆炸，造成庄明有、李宝成、张守荣3人死亡，于志一、李万乐2人重伤。

（八）1958年，因废毒弹爆炸，造成废委会工人孙福臣、孙炳杰、戴吉学等5人重伤。

（九）1968年，贤儒铁木社工人张祥被废弹炸死。

（十）1987年，大桥乡办企业的梁××被废弹炸死。

动用大量人、财、物，搜集理藏废毒弹

为保障我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后东北军区决定对日伪时期遗留的废毒弹进行搜集、处理。遵照上级指示，于1951年成立了"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由县长陈振任主任，六二三厂（三三〇五厂）厂长张克文任副主任，成员有田玉才、陈延生、张洪斌、谢树春、杨俊峰、吕文良等人。

敦化曾是日军对苏作战的重要防线，实属战略要地，故日军在此存放了大量弹药。日军准备对苏作战时使用，所以在清理搜集弹药时发现存放在县境内的废弹中，化学毒剂弹占有很大比重。数量最多的是大桥，其次是秋梨沟、沙河沿、马鹿沟。在大山，尔站、江东、凉水泉子等地也发现了废毒弹，这些废毒弹主要是320毫米、240毫米、150毫米、105毫米、90毫米、75毫米等几种口径的炮弹，其中含相当数量的化学毒

剂弹（75毫米、90毫米、105毫米、150毫米及500公斤、800公斤航弹多是毒弹，有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全身中毒性4类。含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双光气、二苯氯胂、氯化苦、苯氯乙酮、亚当氏气等多种化学毒剂。普通炮弹多半是露天垛在地面上，部分散失在沼泽地和河泡中。毒弹基本是分坑埋在地下，一般坑长7米，宽3米，深1.5米，每个坑存放2汽车左右，弹箱上盖有油纸和草席，然后用土覆盖。

1952年秋，吉林省军区后勤部军械科长刘可鞠率参谋张福恒、付立叶等人来敦化处理日遗弃的废、毒弹。

1953年，在哈尔巴岭南炮弹沟、四棵杨树两侧的山坡上，由李光明负责，组织200多名民工，昼夜分班，长达两个多月，挖了一个长25米、宽12.5米、深10米的大坑（土质为风化沙石），将本县境内各处搜集的毒弹（以大桥为主）埋在坑内。这些毒弹分别标有红杠、黄杠、绿杠、白杠。那时，上级一再强调"宁可错埋10发榴弹，也不漏掉一发毒弹"，所以将部分标志不明、种类不清的废弹也埋入坑内。此坑于1954年4月间装满毒弹后封顶，坑顶覆盖土3米左右，在坑四角各置有一个刻有"日遗毒弹埋藏处"字样的石碑，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号坑。

当时上级下达的任务是两年处理完，但因毒弹数量大，分布散，又都散埋在地下，短期内未能清理完，故于1954年4月15日结束第一阶段工作后军方人员撤回，由县政府废弹处理委员会负责全部废毒弹处理工作。他们先后在各地采取拉大网、钢针探查等办法，又搜集到大量毒弹，并于1954年11月17日至1955年2月5日在原一号坑下方40米处，又挖一长20米、宽10米、深8米的大坑。此事先由杨俊峰负责，后

谢树春接管。当年埋入废毒弹占全坑四分之一，并简单用土覆盖，剩余部分每年冬季封冻后用爬犁将当年搜集的毒弹运入坑内掩埋。至1958年坑内毒弹基本装满，本县内毒弹亦基本清理完毕。之后，用风化砂覆盖，复土厚度约3米左右，并将一号坑石碑移过来两个，以标示坑的位置（即二号坑）。

二号坑内，除本县的废、毒弹外，还有从沈阳运来的1车皮、梅河口运来2车皮、集安运来1车皮、保康1车皮，计5车皮废毒弹，合250吨左右，有毒弹和燃烧弹及不明标志的废弹等。

另外，在本县秋梨沟明川村西南山也埋有在敦化北片发现的废毒弹3万余发，坑长5米、宽5米、深4米，也是以毒弹为主。

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于1963年撤销。

1965年至1966年，三三〇五工厂分两次将10万余发废毒弹埋入2号坑内，其中有苏式燃烧弹，也有毒弹。

在处理整个废弹期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常年从事搜集、处理废毒弹的40余名正式工人，每年还需动员大批民工挖、运、埋毒弹，最多时一冬天动用民工500余人。仅1954年冬天就动用大车37台，牛马爬犁40余张，用工3060个，支出现金17亿多元（旧人民币），1953年前的第一阶段处理工作中，还动用汽车35辆，牛、马、爬犁50张，运了近半年时间。

敦化早期社会文化机构设施的建立及其活动

韩再环　隋欣欣

社会文化专门机构及其设施，在我市出现是本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事情。其最初的社会文化专门机构，包括第一所官办的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民众讲演所、民众学校、民众运动场等。随着这些机构设施的逐渐增多与完善，社会群众文化教育与社会教育逐渐自成体系，并历经了半个世纪延续至今。

敦化早期社会群众文化机构设施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中华民国19年（1930年）4月10日，吉林省教育厅颁发了“吉林省县民众教育实施办法”。这个“实施办法”，是吉林省社会群众文化事业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以教育厅长王翠林的“指令”形式下发的（见敦化县公署档类第83号卷收文编号第7321号）。“实施办法”规定的内容主要是：“一、省内县立通俗教育馆改称民众教育馆，其未设立通俗教育馆各县亦须筹设民众教育馆。二、民众教育馆应办理下列事项：1、民众学校；2、民众问字处；3、民众讲演所；4、民众运动场；5、民众图书馆；6、民众茶园；7、编审民众刊物；8、办理各类博览或展览会；9、改良民众娱乐；10、检查电影戏剧；11、巡回文库；12、其它民众教

育。新设民众教育馆的各县，如因财力困难，至少须办上列1、2、3项事务。三、自民国19年度起，省立民众教育经费遵照部令得陆续增加至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二十。四、……略”。从这个实施办法的第三条看，“民众教育经费”与“教育经费”已经列为两个不同的经费支出。这在当时吉林省教育厅的众多文件（指令）中，是第一次出现的。它标示着文化、教育两个体系的自立。

敦化县政府在接到吉林省教育厅颁发的“民众教育实施办法”之后，开始筹办“实施办法”中要求的有关事项，但由于当时敦化县没有通俗教育馆，只有一个通俗讲演所，这样，在短时间筹办教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众多文化设施有一定困难。缺乏专门人员，经费也不宽裕，所以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吉林省教育厅又发出了“第70号训令”，批评并敦促敦化县政府抓紧筹办。省教育厅70号训令指出：“本厅为发展民众教育起见，曾于19年4月订颁“民众教育实施办法”，各县或由通俗教育馆改组或由通俗讲演所改组或另行筹设或暂设于教育局内由局长兼办，均经先后呈报在案，惟该县尚未具报前来，查民众教育所关甚重，势必推行，而所办事项虽有十余项之多，可就经济情况分年计划逐渐实施，非必待筹有甚充裕之经费方行举办，乃亦稽延岁月，殊有未合，所该县长即行转饬教育局，遵照前颁办法，速将民众教育馆组织成立，并将拟办事项连同章则具报备核，不得再事延误，是为至要此令（原件为竖文小楷，无标点）。

吉林省教育厅长，王莘林”

敦化县政府接到这个“训令”后，于民国20年（31年）1月[illegible]日，由敦化县教育局下发了“第539号训令”，敦促教

育局按省教育厅"第70号训令"要求迅速办理筹建民众教育馆，"训令"摘引如下：

"吉林省教育厅训令第70号内开为令……（此段是敦化县政府引转70号训令的原文）……不得再事延误是为至要。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局迅将民众教育馆组织成立，并将拟办事项连同章则，速为具报）以凭核转，勿再迟延，切切此令。"

敦化县教育局长张成之接到此"训令"之后，下令通俗讲演所主任杨乃成改组成立民众教育馆，民国20年2月12日，杨乃成拟定六项筹办事宜，呈报敦化县教育局，教育局又呈报县政府，经县政府核准之后，敦化的社会文化设施相继创立。民众教育馆下设民众图书馆、民众问字处、民众运动场、民众讲演所、民众阅报室等。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教育馆是一个专管社会文化事业的职能部门，它的业务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局。

民众教育馆

敦化县民众教育馆创建于民国19年（1930）7月16日。据敦化历史档案（敦化县民众教育馆向敦化县教育局上报的《民众教育馆启用图记日期并将讲演所图记截角缴还》的呈文）载："……职馆（馆长杨乃成自称）奉到钧局颁发民众教育馆木质图记一棵，文曰'吉林省敦化县民众教育馆图记'，拟7月16日启用并将以前讲演所木质图记一课截角缴销、呈报……"。又据县教育局长张成之提交县政府的呈文载："呈为遵令改组民众教育馆成立及启用图记日期并请加委馆长仰祈。"

"……等因奉此职局（张成之自称）遵即转饬通俗讲演所遵章改组并一面改委该所主任杨乃成代理教育馆长职务，逐

刊发本质图记一颗。文曰，"吉林省敦化县民众教育馆图记，"分别令行该馆遵办，兹据该代理馆长呈称，业经遵令于7月16日改组成立，并启用图记等情报，请核转前来职局覆查该代理馆长杨乃成资格于民众教育实施办法第四条甲项第二款所列尚属相符，理合检同该员履历一并具文呈报伏乞

谨呈

敦化县政府

敦化县教育局长张成之（印）

民国19年7月12日拟稿

7月19日盖印封发"

从这篇呈文中可以看出，委任教育馆馆长，是有相当高的标准的。"民众教育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教育馆长必须具有后列甲项资格之一：

"甲、1、毕业于大学文法、教育、社会等科及师范大学或高等师范者；

2、毕业于师范学校并曾任教育职务二年以上者；

3、毕业于专门学校并曾任教育职务一年以上者，

4、曾任中等学校校长，并对于社会教育素有兴趣或充小学高级校长三年以上者，对于社会教育素有研究者；

5、毕业于旧制中学、新制高中，及新制初中毕业后在师范讲习科修业一年，曾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并对于社会教育有兴趣者；

乙（略）"

杨乃成，敦化县人，吉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曾任敦化县立第一小学高级教员，讲演所主任。民国19年，敦化县教育局向县政府的呈文载："覆查该代馆长杨乃成资格，对于民众教育实施办法第四条甲项第二款所列尚属相符，理合检同

该员履历一并具文转报，伏乞宪鉴察核，转请加委施行，谨呈，敦化县政府”，敦化县政府报到此呈文后，又携杨乃成履历表呈请省教育厅批复。民国19年9月5日，吉林省教育厅指令（批示）：“拟报教育馆长杨乃成履历尚无不合，仰由该县加委”，敦化县政府接到“指令”后，县政府的委任令于19年9月6日拟稿，即日判行，9月7日盖印封发，杨乃成遂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之职。

民众教育馆，是我市历史上第一个专管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的职能部门。民国20年（1931年）初，它拟定了《敦化县民众教育馆总则》。根据省教育厅颁发的《民众教育实施办法》中指出的具体要求，对民众教育馆的定名宗旨、人员编制，及其所属基础设施和机构的活动内容、职能范围，以及民众教育馆的例会制度，等等，都作了详细规定。这是我市群众文化史上第一个重要文献。

民众图书馆

民国19年，吉林省教育厅发出第425号训令，颁布了《民众图书馆办法大纲》，“大纲”共有十条款，对图书馆的建立作了具体规定。民国19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颁发的《民众教育实施办法》中，要求民众教育要开展十二项工作，其中第五项就是建立民众图书馆。19年7月16日，我市的民众教育馆成立后，拟定年内案行的六项工作，其中就有建立民众图书馆一项。教育馆长杨乃成向县教育局提出建立图书馆的呈文，县教育局又将呈文转请敦化县政府，民国20年2月7日，敦化县县长夏福升接到教育局的呈文后，批示“同意”，（原批件是敦化历史档案、敦化县政府收文第31号卷）。根据县政府夏县长的批复，民众教育馆于1933年8月，分类购买了一批书报，成立了敦化县第一个图书馆——民众图书馆。

图书馆建立初，因无馆舍，暂设于民众教育馆内，负责人由当时的讲演员梅占魁兼任。

图书馆建立之前，吉林省教育厅下发了第99号训令，批评了敦化县政府"待筹有充裕之经费方行举办"的态度。99号训令指出："……设置民众图书馆由非筹有巨款不能立即举办，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民众图书馆或由图书室内多备民众图书，于推进民众教育大有裨益……"敦化县政府接到这个训令后，指令教育局暂不兴建馆舍，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民众图书馆。

从敦化县教育局长张成之在民国20年3月16日给县政府的呈文中可以看出，民众图书馆自2月7日成立，到3月16日仅仅一个月，业务工作进展很快，图书馆根据省教育厅关于"民众图书馆办法大纲"的要求，制定了图书目录一册，拟定了"民众图书馆规则"。图书馆开馆后，"每日阅览人均在20人以上"。特别是实行"敦化县民众图书馆规则"之后，这个敦化县历史上的第一个图书馆，从机构设置上，书报储量上，业务管理上都日臻成形，初具规模。《民众图书馆规则》规定，办馆的宗旨是"启发一般民众知识。"《规则》还对图书馆的书刊借阅方法、阅览室纪律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它是研究我市图书事业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民众讲演所

民国18年（1929年）前，县里曾有通俗讲演所。民国19年6月底，由"吉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曾任敦化县第一小学高级教员的杨乃成任讲演所主任；由前清的"附生"、曾任敦化县二等校长的孙镛任讲演员。民国19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颁发了《吉林省县民众教育实施办法》之后，杨乃成受命将通俗讲演所改组并成立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人

附设了民众讲演所。杨乃成接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后，县长委任孙镛为民众讲演所讲演员。继孙镛之后，又有梅占魁、陈翰章等人任讲演员。据敦化县公署统计局1933年（伪大同二年）敦化县年报记载，民众讲演所有新式瓦房5间，240方丈，座落于县公署东墙外，现评剧团处，房舍修建工程由教育经费支拨，于同年8月15日竣工。

民众讲演所的活动，1931年至1933年间较为活跃。东北抗联重要将领陈翰章将军投笔从戎前，曾任敦化县民众教育馆讲演所讲演员。继陈翰章之后，又有郎文璞任讲演所负责人兼讲演员。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民众教育馆讲演所也随之倒闭。

民众讲演所的活动以1930年为线，分为"前期"和"后期"，也可以称通俗讲演所时期和民众讲演所时期。这个"前期"和"后期"之划分，虽然主要依据讲演所的活动内容而定的，但不包括"五卅"以前和"五卅"时期民众自发的讲演活动。民众讲演所"章则"规定："讲演的范围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纲要、民权之使用法、卫生、风俗、道路、教育、日用普通常识"等等。1930年以前，讲演的内容大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推崇民权神圣，有一定的政治色彩。1930年以后，则以宣传国内外形势，反法西斯战争，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光复中华为主要讲演内容，也讲了一些发动妇女、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问题。除此之外，还讲授了实业知识，破除迷信，抵制封建礼教的残害，以及开展健体、卫生等方面的常识。

陈翰章任讲演员期间，由他亲自操办订了《大公报》、《申报》、《新民晚报》、《泰东报》等报刊，广泛收集国内外形势和战事消息，特别是欧亚两大战场的战事争端，进行了

大量的演讲活动。他利用讲演所、教育馆门前、街心闹市等场所，向各界民众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揭露了日寇的侵略罪行。他曾以“日寇侵略东北史”为题，作专题连续演讲，在学生、工人、店员、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3年前后，讲演所由郎文璞管理，这时，讲演所已在日伪控制之下，讲演活动已濒临销声匿迹。

民众讲演所的演讲活动，受吉林、长春、哈尔滨等省内外大城市的影响。开展得颇有成效，使日伪分子极为恐慌。民国18年6月7日，吉林省教育厅下发了“第340号训令”，训令指出：“……各学校时有邀请外人讲演情事，系为研究学术，籍资参考起见，自属重要，惟查近来各学校时有反动分子肆行活动，籍演讲之名，乘机惑乱青年，影响所及殊觉危险，本部屡次查出各反动刊物中常登载某学校讲演之稿件，公然以学校为宣传反动之地点，而以青年学习供其诱惑，长此以往，学风殊难改变，学术何由进步，为特函请贵部令饬……后略”。可见当时的讲演活动，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民众运动场

伪敦化县公署统计局编纂的伪大同二年（1933年）《敦化县年报》有如下记载：

“公共建筑：

1，县公署东墙外官有隙地约六百坪，建筑体育场一处，内敷垫沙土，北部设蓝球、网球木架，西南端建修八角凉亭，周围埋设栏杆，正南设木门，于七月末竣工，计国币六百六十一元五角。”

这个体育场是我市体育发展史上第一个官办体育场。它的位置在现工会学校院内。

体育场建成之后，制定了《民众教育馆体育场章则》。

《章则》规定：“一、本场宗旨是锻炼地方民众的体育，增进他们身体的健康，间接帮助各种事业的发展，又兼推广民众教育，拿智育、德育为辅佐”。《章则》所规定的条款，明确表明它是属于服务性（不收费）的专门场所。《章则》中的几条及若干款项，对参加锻炼者的要求，各种比赛的时间、方法，体育场的器具使用细则，参加各类运动的注意事项等，都作了详细说明。

民众问字问事处

敦化县民众教育馆下属的“民众问字处”，是1931年建立的，地点设于民众教育馆内。在敦化早期社会文化教育活动中，问字处仅存在近4年时间，每日问字问事者30余人。

民国20年（1931年）2月12日，民众问字处拟出一份《章则》，称：“本馆为解释民众的疑难，推广民众的知识起见，设立问字问事处，并派专人管理应答的事情”。《章则》中所列的问事范围相当广泛。“问事的范围，仅限

（甲）交通—邮—电—路—航

（乙）实业—农—林—工—商

（丙）外交—国民外交—通商

（丁）法律—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公法—违警律

（戊）教育—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己）礼俗—婚—丧—应酬

（庚）其它普通常识”

从上述问事范围看，问字问事处的工作人员须具有广见博识的能力，才能够解答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创办这样一个

社会文化设施，乃很有意义的。民众公益事业，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民众学校

民国18年（1929年）10月，在敦化县设出现了三所民众学校。它的办学宗旨是“让民众在极短之时间适应识字”，办学对象是“不识字的劳动民众”。这三所民众学校里共有1个女生班，学生32人，2个男生班，学生68人，学生年龄不一，有成年人，也有青年、儿童。这三所民众学校经过一段教学实践，学生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常用的汉字，比正规学校学生识字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经过办学者以及学生向社会的积极宣传，自愿报名入学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信誉也有所提高。民国18年12月间，学生大量增多。加因课本（千字文）邮寄不到，教材缺乏，三所民众学校不得不停办。民国19年春，教材邮到，办学条件亦好于过去，学校遂重新恢复办学，拟定招一个女生班、二个男生班，定于3月25日开学，7月25日毕业，学期4个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办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敦化县教育局总结了民众学校的办学经验，认为这是一种“解国民之愚蒙”的好办法，并责承民众教育委员会和民众教育馆发布了《推广民众学校计划书》。

《计划书》内容中有这样的文字：“[illegible]

划。

查敦化地面之辽阔，人口星散，除县城以外无大村庄，对于推行民众教育颇感困难，现经民众教育委员会开会讨论，拟定办法如下：（一）凡每一村镇其住户在30家以上者，设民众学校一所，原有小学校者，附设于小学校内，无小学校者，另请识字之人教之；（二）住户星散之区，该村镇

实施后，查看实际情形再行筹划；（三）拟于本城乡关于人烟稠密之所，利用露天讲演，期收普及之效……”

《计划书》下发以后，不但城内增设了一些民众学校，而且农村也相继办起了众多的“认识普通字为主”的民众学校。

办这类学校，是敦化县民众教育馆成立初期所拟办的十二项活动中的一项。这类民众学校不同于正规学堂，它是一种最基础的社会教育设施，与后来出现的“扫盲班”、“夜校”等群众文化设施，有相同之处。《民众学校计划书》下发之前，敦化县民众教育馆拟定了《敦化县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章则》。《章则》的第一条规定了办校宗旨和办学对象，提出“本县设立民众学 校4 处，招收年长失学的男女和贫而无力的苦学童，传习识字，并授以民众应有的常识”。《章则》第二条规定了学校的办学性质：“本校不收学费，并 供 给 书籍。”可以看出，这种学校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经营型”的。这种学校与现代文化部门举办的服务型的学习班类似。《章则》的第三条规定：“学期暂定四个月”。这标明它是群众性的短期办学机构，不同于当时的正规学堂。

民众阅报室

县公署统计局编纂的大同二年（1933年）《敦化县年报》“社会教育”一栏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本县关于社会教育，已施设者计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讲演所、阅报室、民众学校、日语学校等六处”。可见民众阅报室已成为社会教育的一个设施。

敦化县民众阅报室，创办于大同二年（1933年）8月，附设于民众讲演所内，地址在县公署东墙外（现敦化评剧团

处）。管理者郎文璞，职员一人，每日阅报者40余人。

这个阅报室，不同于现在的各机关、学校、厂矿等企事业单位内部设置的阅览室、学习室、资料室，而是对外开放的一种公共阅报场所，它也不同于当时图书馆，不开展借阅图书业务，而只是在阅报室看报。这种简单的文化设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对普及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书曲茶社

敦化县城里的书曲茶社主要有两个：东亚茶社和丹江春茶社。民国22年（1933年8月），敦化县城东门外有一家"东亚茶社"开业，由李相九（绰号李胖子）经营。茶社的建筑是旧式草房 3 间，设有桌凳30套，讲坛 1 架，此茶社有演员 2 人，职员 1 人，平均每日接待听书者40余人，票价为国币 1 角。这个茶社到伪康德二年（1935年），职工增加到 2 人，男演员 4 人。敦化县公署编纂的伪康德二年《敦化地方一般状况》载：

《第四节，娱乐、趣味》中记述"本县娱乐场所……东门外有东亚茶社一所，职工二人，男演员四名，平时系中上阶级前往欢听，农民逢闲暇时有前往随意娱乐以饱耳者。"

东亚茶社开办之际，正值民间书曲艺人"桐"字辈红火时期，有很多流动艺人来这里"占地儿"开书。这个茶社年收入为国币1500多元，年支出这里约为国币800多元，茶社自留资金200多元，除有固定演员"摇空儿"外，主要靠"接先生"来茶社演出，上演曲调有评词、东北大鼓、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等。东亚茶社是延边地区建立较早且较有名气的曲艺演出场所。

伪康德二年（1935年）4月，在敦化县城的东门外（现

敦化镇市场三胡同北头道西处），曾有“丹江春茶社”，经营者周丛山。解放后从1952年至1957年间，由李哲堂经营的“东风茶社”，也就是“丹江春茶社”旧址。“丹江春茶社”无固定演员，主要靠“接先生”营业，每日书客约40人左右，收入略次于“东亚茶社”。

这两个茶社开办之前，敦化城里曾有过茶社，是纯属民间经营的，这两个茶社虽然也由个人经营，但在民国19年吉林省教育厅颁布，《民众教育实施办法》之后，由民众教育馆协助开办，列入民众教育、社会文化的管理范围。

专业演出场所

本世纪30年代，敦化城里曾有敦化戏院、娄家戏楼、庆光舞台等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场所。

“敦化戏院”、“娄家戏楼”、“庆光舞台”的开办时间、设备规模、演出活动、演出收入、场所旧址等情况，详见本辑李承祥撰写的《敦化戏曲活动的历史与现状》一文。因为这些专业演出场所也是敦化早期社会文化设施的组成部分，所以仅列题目于此。

场营型社会文化设施“普生画堂”

1932年至1933年间，敦化县城内有“普生画堂”一处，经营者无法查寻。这个画堂属于敦化最早的、以经营文化艺术品和文化用品为主的经营型民众文化企业。画堂分期招收艺员，讲授绘画裱褙艺术，仅管短期培训艺徒，但它对于当时开展社会文化教育，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937年“7.7”事变后，“普法画堂”宣告倒闭。

民营文化教育设施

30年代初期，敦化城的民营文化教育设施有“通俗馆”和“育英学社”。

据敦化县公署统计局编纂的大同二年（1933年）《敦化县年报》载：在敦化县东南阁设有“通蒙馆”一所。这个“通蒙馆”实际上是高于塾学，低于正规学校的一种民营文化教育设施。“通蒙馆”的主办者是张峰，建于1933年2月，全年经费70元，教员人数1人。教育宗旨是：“认普通字以资谋生”。它的70元经费，由民众教育总经费中支付，做为办学者的补贴。

与“通蒙馆”同时存在的还有“育英学社”，它位于敦化县城西门里，主办者李玉山。它的教学宗旨也是“认普通字以资谋生”，“育英学社”的性质与“通蒙馆”相同，它的办学方式，用现今的说法应该是“民办公助”的文化短训班。

反映敦化历史的几篇古诗文

李雯瑚

在延边地区，敦化可视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远在公元777年（唐代宗大历12年）镌刻的渤海郡国第三代国王大钦茂的女儿贞惠公主的墓碑碑文，就是一篇敦化早期的杰出诗文。它显示出璀璨的文学光彩，既是反映敦化早期诗文水平的珍品，又是今人考究渤海与唐朝之间文化交流的佐证。碑文为骈偶体，前有“序”（或）“志”，后有“铭”。结构谨严，对仗工整，辞藻华丽，是一篇仿盛唐诗文的传记文。由于此碑长期埋置地下，出土时又分裂为7块，已有234字剥蚀难辨，只有491字尚清晰可辨。1980年10月，和龙县龙水乡龙海村西山一龙头山，又出土了贞惠公主的妹妹贞孝公主的墓碑。碑石保存完好，经专家研究（见王承礼《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碑”和“贞孝公主墓碑”的比较研究》），现只有两个字尚未确认，其余全部辨认清楚。为便于阅读，现按简化汉字并加标点，将碑文抄录于下：

“贞惠公主墓志并序

夫缅览唐书，妫汭降帝女之滨；博详丘传，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袭祉之称，其斯之谓也。公主者，我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之第二女也。惟祖惟父，王化所兴，盛烈戎功，可得而论焉。若乃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立极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配重华而肖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公主禀灵气于巫岳，感

神仙于洛川，生于深宫，幼闻婉Y1。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恩齐，每慕昔家之风，敦诗悦礼。辨慧独步、雅性自然。□□好仇，嫁于君子。标同车之密义，叶家人之永贞，柔恭且都，履慎谦谦。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动响环佩，留情组紃，黼藻至言，琢磨洁节。继敬武于胜里，拟鲁元于豪门，琴瑟之和荪蕙之馥、谁谓夫婿先化，无终助政之谟，稚于又夭，未经请郎之日。公主出织室而洒泪，望空闺而结愁。六行孔备，三从是亮，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凄。惠于圣人，聿怀闻德而长途未半，隙驹疾驰，逝水成川，藏舟易动，粤以宝历四年夏四月十四日乙未，终于外第，春秋四十，谥曰贞惠公主。宝历七年冬十一月廿四日甲申，陪葬于珍陵之西原，礼也。皇上罢朝兴恸，避寝弛悬，丧事之仪，命官备美，挽郎鸣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喻以鄂长，荣越崇陵，方之平阳，恩加立庿。荒山之曲，松槚森以成行，古河之隈，泉堂邃而永翳，惜千金于一别，留尺石于万龄，乃勒铭曰：

丕显烈祖，功等一匡。明赏慎罚，奄有四方。爰及君父，寿孝无疆。对越三五，囊括成康。惟主之生，幼而洵美，聪慧非常，博闻高视，北禁羽仪，东宫之娣，如玉之颜，舜华可比。汉上之灵，高唐之精，婉娈之态，闻训兹成。嫔于君子，柔顺显名，鸳鸯成对，凤凰和鸣。所天早化，幽明殊途，双鸾忽背，两剑永孤，笃于洁信，载史应图，惟德之行，居贞且都。愧桑中咏，爱柏舟诗，玄仁非晚，白驹疾辞。殡殡已毕，即还灵辖。魂归人逝，角调笳悲，河水之畔，断山之边，夜台何晓，荒陇几年。森森古树，苍苍野烟，泉扃俄闭，空积凄然。

宝历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文中凡有重点号者，都是参照“贞孝公主墓碑”碑文辨认出来的）

从碑文可知，贞惠公主是渤海郡国第三代郡王大钦茂之次女，不幸中年早逝。文中详细记述了她的生平行状，也颂扬了渤海建国以来的武功文治。后部分则用四字韵文的“铭”，对贞惠公主予以赞颂和哀悼。由于两位公主的碑文，中间只不过变换了几个字，有人认为这种碑文似有现成格式；也有人认为贞孝公主墓碑是袭用贞惠公主墓碑的。不管怎么说，远在1200多年前，地处东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属国，能有这样的诗文作品，实在是不可多得，应予珍视。因为碑文用了不少典故，将“序”（或“志”）的部分试作简释附后。

渤海之后，自辽金至明末，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未见有其他诗文作品。直到清初顺治14年（1657年），江苏吴江举人吴兆骞（字汉槎），因涉嫌科场舞弊案，被遣戍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他途驿道经额穆住宿，早起赶路，赋有《昂木沙逻（即额穆）晓发诗》一首。全诗如下：

“树杪月犹在，城头角巳残；
荒途分五国，归骑发三韩。
野雾依山尽，春星落塞寒，
鸣鞭及前侣，霜露湧孤鞍。”

吴兆骞时为江南著名才子，因受了冤案被流徒戍边，心境自然是很沮丧的。因此对额穆驿站的景色，也就难免充满凄凉之感。不过从诗里还是反映出当时额穆的交通发达，行旅不断，北通“五国”，南连“三韩（指马韩、辰韩、弁韩）”的胜况。吴兆骞在塞外20余年，后经好友顾贞观

（与吴齐名的江南才子）设法营救，并以词”代“书”，写下有名的《金缕曲》两阕寄给他，感泣了当时的文学家纳兰性德，纳兰便求其父明珠（时为太傅），才得“纳锾（即罚金）赎归”。以上均见《清史稿--碑传集》。

清康熙年间，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杨宾（字可师），为其父得罪遣戍宁古塔，曾面觐康熙皇帝讼免得赦，为此，他亲去柳条边迎父归来，也曾遵此驿道，经张广才岭、额穆、塔拉站、尔站等地，写了一路的纪行诗。其中有《色齐窝集》（蛟河与敦化交界处）五言古诗一首。

“纳木（在张广才岭上）五十里，颇极登顿苦。

色齐林更深，未入心已阻。

豺狼逐我驰，山鸡向我舞。

谷口咆熊罴，树根窜貂鼠。

云横道不通，雾里眼若瞽，

幸有凿山人，乃见天一缕（今烧并胡同）。

架木度层岗，欲鞍籍茅土，

才看日色暝，不觉夜已午。

自卫凭野烧，畏惧不敢语，

俄顷雪满衣，一一沾徒旅。

冱寒手足僵，皲瘃从此数，

釜鬲莫为炊，调饥腹中鼓……

冻馁虽切虑，达曙才可努，

但得脱窝集，乌道吾所取。”

这首诗详细记述了作者在张广才岭上的旅途中，看到豺狼奔驰、野鸡飞舞，黑熊吼叫，貂鼠蹿跳等景象，非常信实。后段写他在窝集口打小宿，如何弄火自卫，担惊受怕；不一会，天又下起雪来，冻得手僵皲裂，做饭不

成，饥寒难忍，只盼天亮，赶快脱离窝集困境的心情，这些生动的描述，犹如今天我们身临其境，切身感受。第二首是《宿贺莫索落（即额穆赫索罗）山中》，看来此次他还是没有奔上额穆驿站，又遭受一夜荒野露宿之苦。全诗如下：

"日落万峰西，荒荒路欲迷；
依然成露宿，何必过前溪。
野火凭风力，孤群仗马嘶，
穷途鸡犬绝，莫听五更啼。"

大约第三、四天，他便走出敦化境域，奔镜泊湖西岸，经德林石（今宁安县石头甸子）留下《德林石》一首。

"四臂围德林，廿里策若掌，
铁色蚀土花，陶铸一何广。
变态极千端，寒光凌万象，
玲珑有鬼工，登顿腾异响。
洞壑积层冰，草木犹能长，
不因车马迟，何由独欣赏。"

这些诗篇，均收在作者所撰的《柳条边纪略》里，见《清史稿--列传》。

到1882年，敦化始设县治，第一任县知事为赵敦诚（俗称赵大老爷），系进士出身，但在敦化未见其有诗文留传。到1888年（清光绪16年），戡边大臣吴大澂，奉使赴珲春与俄使戡订东部界线。也曾遵此驿道，经额穆住宿，赋有六韵七言古诗一首：

"狂风似火卷地来，吹冻顽云拨不开，下罩千山同一被，满空飞絮搅成堆。天公玉戏巧难就，重阴密密谁相催，特遣封姨（即风神）作大磨，回旋鼓荡声如雷。须臾碾出白

瓷粉，落花片片皆琼瑰。老农拍手笑不止，顿令茅屋成瑶台。”

诗里描述了额穆大风雪的情景。又赋张广才岭七言古诗一首：

“岭长二十有五里，平冈一伏又一起，首尾蟠屈如卧龙，半身隐现白云里。远脉原从长白来，蜿蜒下饮松江水。满山鳞甲烟翠重，亭亭直节攒古松。千株万株不纪岁，子孙多受秦王封。涧底杂树纷罗列，忽横忽纵皆奇绝，俯听流泉虎虎鸣，中有万古不化之冰雪。此山深处无人行，熊罴夜斗狐狸惊，远闻伐木声丁丁，又疑车轮触石相硼砰。山灵怪我往来久，无句留题不放走，我问当年张广才，何物区区，乃与山灵同不朽。”

本诗详尽地叙述了张广才岭的自然景貌，并对当年的张广才岭予以热情地赞颂。第二天，他到凤凰店打了尖，与同僚夜宿塔拉站，得诗两首：

其一“行经历尽厂东西，偶触吟情信笔题，风土犹存雨俗俭，几双乌拉一爬犁”。

其二“闲游人似打包僧，晓起餐风夜宿冰；只为萍踪飘泊惯，一生衣食寄行縢”。

第一首里的“厂东西”即今青沟子上马厂附近。“乌拉”即“靰鞡鞋”。第二首的“行縢”，即“裹腿”。完全描述当时山沟里猎人的装束。吴大澂在一路上还继续写了些纪行诗，那已出了敦化县境去珲春了。这些诗都载在《皇华纪程》里（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李澍田主编）。

1908年，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在吉林省教育厅任视学。是年大寒季节，曾以

公务来敦化，登上鄂达里台。那时，日俄战争结束，日寇欲继沙俄觊觎侵犯我东北，而满清政府一味屈辱和约，作者借咏鄂达里台（并序），抒发了他悲国忧民的壮怀。全诗如下：

"咏鄂达里台并序

鄂达里在敦化境内，相传为清始祖起兵誓师处。

故老争传鄂达里，登临却趁大寒时，西来峻岭连天白，北去长江入海迟；十里炊烟连朔漠，三边狗盗越雷池，和戎尽有诸公策，满眼孤鸟雨雪诗。"

诗里"西来峻岭"，即今新开岭；"北去长江"即牡丹江，因封冻，所以叫"入海迟"。"十里炊烟"指敦城人烟稠密西连广阔大地。"三边狗盗"即指日寇。侵朝鲜后，又想侵犯我东北。作者用"越雷池"一词，既表现日寇的野心勃勃，又指斥它胆敢侵犯我神圣国土。"和戎"，即指对外屈辱和约。"诸公策"指清政府主张亲日的大臣袁世凯之流的屈辱投降政策。最后一句表现作者既愤慨又凄凉的心境。此诗载于《林伯渠诗文集里》。

附　　记

（一）《贞惠公主墓碑志并序》译文

重读唐书（尧典），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是诞生在妫汭水滨（嫁与虞舜）；细读左传，鲁国开设喜筵，迎接周天王的姑娘（下嫁于齐），那都是有光辉妇德的妇女而美名传给后代；端庄典范的母亲，称颂永世不断，所说天赐洪福，也许就是指她们说的吧！

贞惠公主，是我大兴宝历朝、孝感金轮圣法大王—大钦茂的第二个女儿。（她）祖辈父辈，推行仁厚的政治而兴旺起来；丰赫的战功，是没有可比的。要说顺应天意，辨理国政，光

明正大就象日月之光辉普照大地；坐在高位而体察民情，宽厚恩德就象天地无私布施人间。（他们）可以配得上虞舜而近似夏禹，楷模殷汤而效法周文王，这是皇天的保佑，大王的威福积来的大喜啊！而贞惠公主更禀赋巫山神女的灵秀，具有洛川宓妃的挚情，生长在宫廷，从小懂得柔顺礼貌。瑰丽的姿容，世上少见，光洁得象珊瑚树的花簇；高尚的品德，真是无与伦比，纯真得象昆仑山的无瑕之玉。（她）早年受过女师的教诲，严守训诫向古人学习；生平羡慕班昭的风采，勤学诗文爱好礼仪。（她的）聪敏是独一的，（她的）高雅是天赋的……□□公主有幸择好匹偶，嫁给英俊的君子。（她们）真象（诗经）《有女同车》篇章所标榜的亲密侣伴，有如（易经）《风火家人》卦词所协说的永远贞洁。她温柔恭顺又美貌，举动谨慎而有礼节，在楼台上，象箫史和弄玉同吹凤箫那么和谐；对着梳妆台，更象鸾鸟对镜飞舞那么形影一致。她走起路来，环佩响声清脆；穿起衣著来，衣带利落整齐。说起话来文雅中肯，举动纯正有度，她住处象敬武公主那么幽美，她家室比得上鲁元公主那么豪富。她夫妻象琴瑟那么调和，象香草气味投契，不料她夫婿竟先她去世，还没有完成协助大钦茂的政治抱负；孩子又夭折，更没到成年"请郎"的日子。公主走出机房悲哭流泪；走进闺室，也哀愁抽泣，但仍遵守德操完正不缺，坚持三从德半点不移，志学那恭姜（忠贞不二）的誓言，忍受着杞梁妇（哭倒长城）的苦凄，可惜象公主这样出类拔萃的人，遵守妇德典范，还没到人生的一半，那岁月就象白马一闪，流水一去不回，藏在深山大壑的木舟也能变动，竟在宝历4年夏4月14日乙未那天，公主在宫廷外的住处去世。年仅40，诰封为"贞惠公主"。宝历7年冬11月24日甲申那天，陪葬于珍陵的西缘，这是合乎

礼制的。

（殡葬时）大王停止朝政，放声大哭。睡也不安，乐不起，一切丧事礼仪，命官员们备至料理。唱挽歌的人们哭得失声断气，沿着纵横大道顿足；拉灵车的马儿也不断悲鸣，望着墓地低下头去，仿佛表示哀泣。（大王）告喻：葬公主要象鄂长公主那样殊荣超越高山；要象平阳公主那样恩准停放改葬。这才选定荒山的平坦地方栽上松树楸树，整齐成行；前临大河，弯曲流淌，将墓穴修得又深又严实，终与公主永别举行殡葬。并留下这块墓碑，万年流传，于是刻下了这篇墓志铭；（下为"铭"乃是"志"的概括和复述。限于韵脚和四字句，不便通译，读者可参考"志"去理解。）

（二）贞惠公主墓志简释

①唐书—指《尚书·尧典》。尧的国号唐，故也称《唐书》。

②妫汭—水名。

③丘传—即《左丘传》简称《左传》

④王姬—周朝姬姓，故称周天王为王姬。

⑤袭祉—承袭福（祉）气。

⑥大兴、宝历—都是大钦茂的年号

⑦孝感金轮圣法—渤海郡王也按大唐皇帝崇奉儒教和佛教加奉尊号。

⑧乘时御辨—顺应天时，亲自辨理国政。

⑨立极握机—极为最高宝座即王位。握机，掌握机要即政权。

⑩重华——古代大舜的名字。

⑪自天佑之威如之吉—这句话是说大钦茂得到上天保佑和自已福威，才生有公主这样的好女儿。下面便是对公主的

赞颂。

⑫巫岳一即巫山神女

⑬洛川一见曹植《洛神赋》。

⑭婉yi一柔顺貌。

⑮瑰姿一即美姿。

⑯曹家（音gū）一东汉史学家班固之妹名班昭，因嫁曹世叔，被称为曹大家（姑），著有《东征赋》、《女诫》七篇，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

⑰同车一《诗经、鄂风》的篇名。

⑱叶（xié）一协的古字。“家人”《易经》卦名。

⑲箫楼一是萧史和弄玉的故事。弄玉是秦穆公的女儿，他们夫妇和谐“有吹萧引风”的传说。

⑳鸾一一种贵鸟（或说即孔雀）对镜即舞。

㉑环佩一衣带上系的佩玉。

㉒黼藻一黼是装饰的花纹。藻是文采，这是指语言美的意思。

㉓六行一西周时教民的六条标准，即孝、友、睦、姻、任、恤。

㉔三从一封建时代束缚妇女的一种道德标准。三从指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

㉕恭姜一一春秋时卫世子恭伯之妻，恭伯早死，父母欲逼其改嫁，她“之死矢靡他”，见《诗经》“柏舟”篇。

㉖杞妇一一即春秋齐国大夫杞梁之妻，杞梁死后，她哭十天，城墙崩塌。俗传孟姜女哭长城指此。

㉗惠于圣人一一有的解此句是指大钦茂。与下文不接。故作此解。

㉘藏舟一一语见《庄子》。意思是说没有想到的事也容

易发生。

㉙谥——封建时代给死去的人追封号

㉚礼也——唐永泰公主李仙蕙陪葬在他祖父唐高宗李治的乾陵，贞惠公主也是孙女陪葬祖父，所以这是按大唐之礼葬的。

㉛避寝驰悬——免去睡觉。驰是撤去，悬是钟磬架子，这里是指不听音乐。

㉜鄂长——即汉武帝女儿盖长公主。下嫁盖侯，封鄂邑，亦称鄂长公主。

㉝平阳——东汉光武帝的姐姐。

㉞玄厝（cuò）把棺木停放浅葬后待改葬。

㉟尺石——指墓碑。

㊱勒—— 刻写。

㊲铭——一种有韵的文体。

敦化县戏曲活动的历史与现状

李承祥

敦化，满语俗称"鄂多里"、"敖东"、"阿克敦城"，曾视为清始祖的"发祥地"之一，以钦命定为封禁区长达200余年。

1878年（光绪4年），因有流民私垦，吉林将军派员履查，并专折具奏，要求设县。1881年（光绪7年），"奉旨防部核准"，派委员试署，办理荒务，始查明流民计有400余户。是年，准在阿克敦城以西二里许，起建新城。1882年（光绪8年），新城初具规模，正式设县立治，定名"敦化"，隶属吉林府。

那时，位于长白山北麓的敦化县，还是座边远小城，边民人多系为私垦者流入此地散居。因此，建县初期，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开发初期，是否有戏曲活动，无从考证。

据娄德诚（别名娄幻）、娄德埠二位先生所证："1910年间（宣统元年），经其家父多方奔走，才办起了第一所官学。同年内，为补充社会教育之不足，利用戏曲高台教化，提高国民品德，家父无视祖父的反对，尽倾家资购置木料，又在城内关帝庙前广场（即今敦化市自来水公司处），起建了一座戏楼。"因为年代久远，戏楼名称无法断定，后人通称为"娄家戏楼"。

"娄家戏楼"，园主娄明，祖居今山东省诸城县，系敦化开荒估草较早的开山户之一。清末光绪年间，他曾在赵敦诚的县衙里充任过"经承"之职。（另一说是做过"乡邮"。）他所

建的戏楼是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可容观众数百人。戏台上，"出将""入相"处的门楣上，分别书有"来兮"、"归去"4个大字。伶人具属外埠邀请。戏箱为蒋柏麟所有。1910年落成后，开始以演出为业。民国初几年为戏院的兴盛时期。梆子坤伶金彩凤，艺名"四岁红"者，所演《东了披》、《朱买臣休妻》等戏，颇受民众欢迎。1919年（民国8年），娄明病故前，家业开始凋落，戏园随之歇业，伶人四散。转年，戏楼拆毁。此后，敦化县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再经营戏院。

1928年（民国17年），由延吉来了一位韩月华，再次创办戏院。据娄德学先生所供："韩月华是一位唱武生角的演员，他经金彩凤介绍来到敦化，在士绅张跃轩和娄德诚的资助下，于娄德诚家的庭院（即今敦化市炼油第一供应站处），临街修建了一所可容数百人的板平房，做为园址，并由山东请来约有二、三十人的小科班为班底，开始演出为业。园主韩月华，虽然技艺不高，但是，他经常演出的《潞安洲》、《八蜡庙》等戏，还是很受人欢迎的。戏院开业不到两年，由于负债累累，积重难迫，于1930年（民国16年），不得不宣告破产。"

敦化县的戏曲活动，虽然是几经兴衰，但仍此起彼落，断断续续地延续下来。1933年(大同二年)《敦化县年报》记载："本县有民众娱乐场所，敦化戏院、东亚茶社二处。敦化戏院地址：北门里，创立于大同2年9月。代表者为陈竞南。戏院系木架板棚计八间，设备有黄油椅橙100套。演员30人，职员2人。平均每月游览人为150人。票价国币6角，年收入30000元。"由此可见，时年敦化县戏曲活动之景象，还是比较兴旺的。但是，陈竞南所经营的敦化戏院维时不

长，不幸失于火灾而歇业。

1639年（康德6年），日本人真谷、中国人哈树田、徐跃卿、刘芳等人，趁敦化戏院失火后无人再办戏院之机，从新京（今长春）来到敦化，在东门外银行胡同内（今敦化市工业街银行胡同），建造一所木板平房，开办"落子园"，取名为"敦化大戏院"。当时，新京、奉天(今沈阳)的一些伶人，如爱莲君、小麻红、金桂茹、牛云舫等人，都曾到敦化演出过。

1945年光复后，刘芳等人，接替了日本人真谷做财东，沿用"敦化大戏院"的原称，继续成班经营戏院。他们将院址搬迁至东门外裤裆街以东，日本岳松花酒馆院内（即今敦化市电影院处）。

1946年，吉东警备二旅进驻敦化剿匪，在旅长邓克明，政委袁克服的倡导下，以慰问前线将士之名，准备接管敦化大戏院，创办京、评剧团。业主刘芳闻讯后，惟恐真被接管，即带领自已所属班底，拉着筱佩君、李三盛等骨干艺人，离开敦化去延吉、龙井等地流动演出，与此同时，韩素艳、杨雨田等人被二旅司令部所挽留，随供给部的候映兆、军事科的武树玉，持军事通行证，赴哈尔滨邀请演员，着手创办京、评剧团。是年，吉东警备二旅司令部，责令日本战俘，在敦化大戏院的原址，扩建了一座可容纳观众千人的两层木板楼房。效仿哈尔滨三道街东北人民剧院之名，将新建成的板楼命名为人民剧场。同年冬，韩素艳、杨雨田等人，经张东川、罗峰的协助，从阿城接来辛艳秋、凤鸣莲、张盛廷、张丁铎、张鸣华等人的小股子剧团的全班人马。赶排了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次公演。1948年春，警备二旅奉命南下，将剧团交给地方政府代管。

当时，由于地方政权初建，无暇顾及剧团，为此，剧团由公属的供给制，又转为演员群众自负盈亏，盈利分红的小戏班子。是年秋，剧团赴吉林等地演出，因为收入不佳，散班于吉林省磐石县。

1948年冬，业主刘芳见警备二旅京、评剧团散班，便又将其所属班底拉回敦化，邀敦化宾宴楼的财东赵景云入伙，集股为东，重新开设敦化大戏院，一直惨淡经营到1950年，终因债台高筑，难以支撑局面，迫不得已才将敦化大戏院的经营权，转让给荣誉军人陈树槐。同年，陈树槐集资21股，被众股东推举为团长。因陈树槐常以荣誉军人自傲，故将敦化大戏院易名为："荣誉剧团。"

1952年冬，陈树槐苛扣演员工资，欺压殴打演员，被张国华、胡峋岩、李宗春等27名演员联名控告。经敦化县人民法院判决："陈树槐因侵犯人权罪，处徒刑两个月。"同时，经敦化县人民政府批准，推举张国华、刘树春等7人为群众代表，对荣誉剧团实行民主改组，建立了演员群众自主的民代剧团。为纪念这次推翻业主所取得的胜利，演员从业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有重见光明之意，故此将荣誉剧团更名为："光明剧院"。1953年春，敦化县人民政府为加强对剧团的领导，调国家干部綦云清任秘书，姜兆富任团长，张秉富为会计。1954年，吉林省举行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会，光明剧院演出的古装评剧《白蛇传》，荣获集体表演奖和导演奖。主要演员王青霞、杨俊英荣获优秀演员奖，各得奖章一枚。

1954年初，吉林省文化局进行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工作，在敦化试点。经过三个多月的整顿工作后，正式批准敦化光明剧院为集体所有制的民间职业剧团，定名"敦化评剧团。"

1958年，敦化评剧团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转为自负盈亏、差额补助的地方国营剧团。并在原称上，增填了一个"县"字，作为区分民间职业剧团和国营剧团的标志，全称定为："敦化县评剧团。"为了适应大跃进形势需要，剧团扩编组建了京剧演出队。1959年，团长王贵海依据抗日英雄陈翰章的事迹，创作了现代评剧《陈翰章》，做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先后在敦化、延吉等地演出。首排导演李少良，舞美设计李运亨，唱腔设计赵有贵。李宗春扮演陈翰章，崔力君扮演万爱英，张德义扮演陈海，臧永宽扮演松岛。

1964年间，贯彻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传统剧目停演。1965剧团进驻社教工作队，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剧团遭受灾难性浩劫，1968年8月，敦化县革委会成立后，颁发通令，宣布敦化县评剧团解体，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取而代之。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思想指导下，把王贵海、杨金娥、崔力君、胡久梅、姚子臣、王云霞等13人为首的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于1969年12月被遣送农村，插队落户。普及样板戏开始后，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提格改为敦化县革委会政治部文工团。粉碎"四人帮"后，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敦化县评剧团才得以正名。

敦化县评剧团恢复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上山下乡，重视评剧团创作，注意培养人才。1974年参加举办的评剧小科班的学员，现在多数已成为剧团的艺术骨干。在吉林省1982年戏曲。歌舞团体青年演员汇报演出中，小科班毕业的学员张学军获得表演二等奖，李秀娟、刘云鹏、何俊杰获三等奖。在剧目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0年创作的现代评剧《陈翰章》，曾代表延边地区参加全省戏

曲汇演。编剧李承祥荣获佳作奖，白同城获舞美设计三等奖。主要演员张学军、周荔、刘云鹏、高俊峰、唐坚分别获表演二等奖和三等奖。在1981年全省创作剧目演出中，根据蒋星煜故事新编《诸葛亮招亲》，创作的同名古装评剧，编剧李承祥获创作三等奖，剧团获综合演出二等奖。此外，敦化县评剧团在省文化局、省财政厅举办的，全省艺术表演团体上山下乡和经营管理竞赛中，1978年获三等奖，1979年获二等奖，1981年又获三等奖。同年，剧团被评为吉林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敦化县评剧团自1953年起，到1982年止，历任团长有：姜兆富、臧仁恭、王贵海、谢计贵、王春生。

老艺人花秦楼

李承祥

花秦楼（1912——1983），原名高璧颖，河北省新城县人。11岁在天津拜花莲舫为师，写“牛皮合同”10年，学唱评戏，专工青衣花衫，并随师更姓，取艺名为花秦楼。21岁满徒后，履行合同，为师效力三年，先后在天津大观茶园、燕乐升平茶园以及青岛市新升剧院等地，反串小生陪师演出。23岁时，在天津带艺求师，又拜在余钰波（艺名杨柳青）先生门下为徒，学戏三年。

1935年在余钰波门下师满出关，先后在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地，与筱桂花、桑友梅、金开舫等人搭帮，同台演出，是东北评剧界挑大梁头角较早的女演员之一。

1941年冬，在沈阳演出时，因为不堪忍受日伪时期军、警、宪，特的凌辱，寻偶成婚，嫁于沈阳市某商号账房李清轩为妻，从此脱离戏曲舞台，在家养闲。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重返舞台，参加辽西省锦州市国营评剧团，被公推为教师。1952年，经王明君介绍，加入敦化评剧团，以评戏老旦、彩旦应工。她的唱腔浑厚、字正腔圆、板头磁实，特别是“丹田气”，尤见功力。她在《杨八姐游春》中扮演的佘太君，《秋江》剧中扮演的老尼姑，活灵活现，犹如佘太君、老尼姑的“活脱”，不但在观众中深受赞誉，就是戏曲界的同行们，也都非常钦佩。

1954年，她被选为敦化县妇联委员。1958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历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83年11月因患脑血栓，病逝于辽宁省辽阳市。享年71岁。

娄明与娄家戏楼

娄德珲

清咸丰年间，我的祖父娄永和一家原住在山东省诸城县娄家庄。由于朝廷腐败，封建盘剥甚重，加之十年九旱，娄家庄的穷庄户人家生活极端困苦。祖父娄永和（行二）不堪忍受饥饿之苦，便同兄弟三人逃荒到东北谋求生路，祖父一人单独来到吉林省敖东城落脚。

那时的敦化还是荒山僻野，人烟稀少，敖东城也不过是寥寥几户人家。孙家网房子（现华泰公司附近）在敖东中心，以打鱼为业，郭殿荣家大院在东江沿北岸渡口处，其他散居的几家都是小户人家。祖父在这里定居后，靠辛勤种地，不几年便富裕起来，遂成了家。奶奶是当地一位农村姑娘，她与祖父缩衣节食、勤俭持家，积下了家业。咸丰11年（1861年），祖父得长子娄明（字填斋），就是我的父亲，继而祖母又生下我的叔叔7人，二叔和六叔夭亡。

到了光绪年间，迁入敦化县境内的垦民日益增多，敖东城里出现了最初的工商业作坊店铺和私塾学馆，逐渐成为一个繁华的吉东重镇。娄明幼年时到私学馆读了几年书，初通文墨。因他聪明伶俐，待人谦恭，处世得体甚得祖父宠爱。娄明到了弱冠之年，他虽然只有20多岁，但颇善料理家事，尽管家庭人口增多，家业却更加兴旺，社会上也颇善交际很有办事能力，成为当时敖东城工商界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祖父就令他当家，操持内外家务。

1882年，敖东城设县，定名敦化县。县官赵敦诚聘请娄

明，委为敦化县县儒经承（财政局长）之职，掌管发放全县地契之职权。刚刚置县的敦化，教育落后，设立官办学堂，又无经费来源，娄明便将发放土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大租地，将好地发给农民租种，以利开发全县农业。还有一种就是学田地。将次地留给学校，所得的钱粮（即税金）作为学校经费。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31年“9·18”事变。娄明在经承之职期间，很关心社会福利事业。他设立公道院（花子房），在县城西北角建5间草房，收容无依无靠的鳏寡穷人。

1890，已辞去经承之职的娄明开始经营商业，建酒厂作坊40余间，雇佣工人100余名，聘请颜少文为老板，开办了商烧锅“谦源达”。酒厂每日产酒1000余斤，倾销全县及邻县。“谦源达”因经营有方，讲究信誉，名声大噪，盛极一时，竟自行出官帖（钱币）流动于市面。娄明又在敦化、官地，与股东耿某、刘某（娄明为一股，共三股）合伙开办“富东源烧锅”，资本大，规模亦较“谦源达”更大，占地2亩余，雇工200余人，聘请田永利为老板，产品远销黑龙江、延吉等地。此外，娄明还在官地岗子开了油坊，在敦化城内盖了住宅及店堂房多处，可见当时的家产是颇为可观的。

值得一提的是，娄明在敦化城里修建戏院一事。这件事，起初祖父和他的众弟兄都反对。他首先说服祖父，不顾弟兄们的阻挠，把家中准备建造街房用的400立方米木材，全拿去用于建造戏楼。1910年，在县城老爷庙前广场娄家的宅基地上，一座180平方米的木质二层戏楼落成，起名“娄家大戏楼”。戏楼设池座和两侧边座，池座后方正面还设有军警、官员入席雅座；楼上两边设有30个包厢，可容数百名

观众。戏台面向北，台上有"出将"、"入相"两个门，后台有宽敞的男女角化装室及大小衣箱，备有珍贵戏装。戏楼门前两旁设有商贩摊床，卖水果点心等小吃食品，每到夜晚戏楼灯火辉煌、门庭若市。

经营戏院是很辛苦的。戏院每天开厢两次，白天一厢，晚上一厢。院主及手下人对官员、军警要毕恭毕敬地迎送，对观众也要和颜悦色，恭顺谦让，不然有人就会借故寻衅砸戏院子，曾发生多起此类事件，给戏院造成了很大损失。

戏院还要经常聘请新角。如果来了新角，必须先领着到官府、军警去拜见，不然不敢贸然登台。晚间，官老爷们打牌时，叫坤角（女演员）去陪客，这叫做"条子"。由外省市来的和应邀来的新角，第一次演出要打炮，过这一关是很难的，这是考验新戏班子和新角技艺的一种惯常做法，评价如何，依观众的喝彩或掌声而定。被请来的名角则不必过这道难关，活动随意，来去也自由。

娄家戏楼曾出了几位出名艺人，金彩凤就是其中一人。她幼年时，在娄家戏楼学艺，取艺名"四岁红"，很有些演技，因像貌有男人气派，多演须生角色，曾主演过"朱买臣休妻"、"东子披"等戏。剧目以京剧和河北梆子为主。金彩凤擅长京剧，常到延吉、宁安一带巡演，颇受各地观众赞赏。

那时候既没有电灯，更没有如今的各种舞台和彩灯，院主想方设法点缀戏台色彩，以争得观众欢迎。我幼年时，常由母亲背去看戏，最喜欢看神话故事改编的戏。演这样的戏时，在台前摆列四口大锅，倒上白酒，点燃后发出一缕缕青兰光，增添阴森森的气氛，令人觉得身临其神幻境界，使观众赞叹不绝。民国初的那几年，是娄家戏楼的兴盛时期。娄明

尽心照顾戏班子的男女角色，按时发放月薪，生活上也尽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以使他们为提高演技水平而竭尽全力。

1915年（民国四年）娄家戏院倒闭，戏班子四散到宁安、延吉等地。1918年秋，敦化富户梅家烧锅给儿子办喜事，曾请回金彩凤及徒弟紫玉仙（女）。她们在梅家烧锅院内搭席棚，演出数日，师徒唱作俱佳，演技比当年更好，场场都受到观众的欢迎。

1919年，娄明因病去世，年仅58岁。不久，母亲也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后，烧锅和油坊尽被老板吞掉。娄家外债累累，"南烧锅"无法支付欠雇工们的薪俸，由县商会会长万茂森替还了雇工的薪俸，"南烧锅"也就归了万茂森。随后，"富东源"烧锅及岗子油坊相继倒闭。最后，娄家戏楼也拆毁了。

忆敦化敖东中学的几位老师

范广明

敦化县私立敖东初级中学创办于1927年，停办于1931年“9.18”事变后。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五年，却成为吉林省三个著名私立中学之一。（另外两所私立中学是吉林的毓文中学和长春的自强中学）作为这所学校的骨干力量，以校长张成之为首的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又富于献身精神的几位教师，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现谨就笔者记忆所及，概述如下：

张成之校长

张成之，字器赡，吉林省敦化县人。民国初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修英语。因家境贫寒，只得搞勤工俭学，给北洋政府某部长作家庭教师。毕业后回吉林在教育界谋职多年，以办学认真，思想保守著称。历任吉林五中校长、省督学、长春第二师范校长等职。在长春二师任职期间，因处理学潮而被学生押送出校。卸任后，于1927年赴黑龙江省绥化县及吉林省敦化县料理家事。在敦化逗留时，他受到著名士绅商务会长万茂森（字荫清）的挽留，万茂森奉劝他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而万本人愿捐献大片房屋作校舍，并负责筹集办学经费。张成之见创办一所私立中学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就欣然答应。亲赴吉林招聘教师。当时的敦化，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富家子弟赴吉林、长春等地就学，来往路途上都须结伴而行，此外还需武装兵丁护送，以免遭土匪

绑架。张成之在吉林招聘教师时，也碰上了难题，他尽管以高薪引诱还是不够的，虽出价80—100元银币的月酬，仍无人问津。恰巧这时，吉林名律师杨某内弟郭度在省一中因教英语受到学生侮辱，而闲居家中闷闷不乐。郭度是保袁筹安会（筹安会乃袁世凯任总统时的国会参议院成员杨度等人所组成的拥立袁世凯称帝的半官方组织。于1916年8月成立，其首领杨度、严复等人称“筹安六君子”。1916年袁死后自行解体。杨度字晰子，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头目杨度好友，因帝制活动失败逃避通缉而出关。本想籍园丁之乐来冲淡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受到纨袴子弟冷落。他的处境和苦闷心情和张成之不谋而合，二人一谈即妥，都认为由他们亲手创办的学校将是他俩自由驰骋的乐园，既不受来自上边官府的挟制，也不会遭至下边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威胁。郭度则不计较报酬，愿意帮助他。他是通才，尤擅文科。张成之又聘了一位理科教师。这时，他还遇上一位南京金陵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袁某。他因学费不足而辍学，愿得高薪而到任何艰苦的地方去。张在吉林雇了一辆马车越过老爷岭密林险道，把这两位教师接到敦化。郭度果然作了张成之的得力助手，挫败了许多破坏这所学校的人，压住了所有的地头蛇，维护了张成之的威望。张成之首先成立了以县商会会长万茂森为首的校董会，邀请县教育局长郭景泰（字宗岳）、县农会会长于瀛洲等人为校董。通过这些地方上得力人士的协助，开辟了学校的经费来源，有了木材捐电话捐等固定附加捐税的收入。敦化是盛产木材的地方，学校成立不久，吉敦铁路的修筑工程破土动工，需要大批铁道枕木。通车之后，又有大批木材通过铁路外运，仅这一笔税捐的收入就很可观了。很难想象一所私立中学竟能享有

这样的优惠和特权。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所学校的性质几乎和公立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但又不象公立学校那样受上级的制约及学生运动影响。当县教育局长郭景泰把局长宝座让给张成之兼任的时候，张先生已集全县中小学教育及社会文化大权于一身了。

张成之对于学生的课堂教学是认真负责的，因而深受学生家长的信赖。他聘用教师，做到了任人唯贤，不管什么人推荐来的教师。如果不称职，学期终了就不再续聘。半年一换教师，几乎成了这所学校的"校风"。除了郭度和刘庭芝（字衣言，山东黄县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位老师能在这里教书一年以上。有一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一个暑假期末考试的前夕，张成之的儿子张爽夜里在家中紧张地复习数学，他在课本的练习题上画了许多圈圈，被张成之看见了。第二天，张成之把儿子的课本带到学校，当数学老师杜剑寒把已拟好的数学试题交给张成之审查时，张成之发现他出的试题多半是儿子张爽数学课本中画圈圈的题。张成之一个一个对照，断然将杜剑寒出的试题作废，偏偏出了没有画圈圈的试题，杜剑寒只好按校长所拟的试题重新刻钢板印发给同学们。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的，杜剑寒因此而被解聘。他原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因筹措学费来这里工作的，当他流着眼泪收拾行装时，人们感叹不已。这件事对张爽(光复后改名张一中。系张成之次子。曾任国民党吉林党部委员、监察院委员。东北监察使，1949年去台湾。）教育很大。在由张成之一手创造的教育环境中，任何人想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是不可能的，这就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张成之在政治方面的立场也是鲜明的，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他是深恶痛绝的。在反对延长去教

路的斗争中，他总是站在前列。在欢迎吉林省政府代表团团长、民政厅厅长章启槐率团去延吉调查处理日本浪人在龙井村放火闹事事件的大会上，张成之代表敦化人民慷慨陈词，要求严惩肇事者，决不丧权辱国。他为人正直，不怕得罪日本人。在一次中学举行的运动会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敦化出张所所长渡边乙二亲自到会场献上一条毛毯作为奖品赠给学校，张成之当着全体师生及来宾的面拒绝了，使渡边乙二快快离去。"9.18"事变后的一天，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当时日军还未攻陷哈尔滨）来敦化视察，张成之是当地唯一懂英语的人，当了翻译兼向导，他领着美国领事到中学礼堂参观被日军捣毁的现场，使美国领事目睹了被日军用刺刀戳破了的国旗和砸碎了的孙中山先生肖像。然后，张成之陪同美国领事出席县商会会长万茂森举行的宴会，渡边乙二也赶来参加，意在监视，被万会长安排在外屋的另一桌上。张成之把渡边来参加宴会的事告诉了美国领事，美总领事顺手端起一只已经吃过的鱼盘子让人送给渡边吃，张成之照原话翻译了，万会长也同意让人送去。渡边虽没有表示什么，却在心里埋下了对他们记恨的种子。

在处理校内有关政治问题时，张成之对于国共两党一视同仁，一律排斥。一次，吉林军阀政府镇压国民党地下组织，逮捕了敦化第五小学校长陈兰台，这件事还涉及到敖东中学教员高某。这时，张成之借故有事外出，把校务交郭度代理，郭度按照张成之的意愿，同校董万茂森及驻军团长王树棠搜查了高某的宿舍，只因没有任何罪证而免于被捕，郭度便劝高某逃走了事。高某是从济南齐鲁大学毕业的，来校后教英语及数理化。他和当地的国民党潜伏人员来往频繁，并在学生中发展了几名国民党党员，有李

芬曦、李凤阁、陈德蕃、陈翰章等。张成之对于此事非常痛恨，但是他又不想亲自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他不是怕高某本人，而是担心几名加入国民党的学生与自已反目成仇，更担心学生的亲属和社会舆论对自已施加压力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有些顾虑。所以他才采取了上述的办法以掩人耳目。

1931年春，张成之从吉林聘来一位教导主任兼语文教员程沐寒先生。他在学生中公开宣传"普罗"（"普罗"：即英语"普罗列它利亚"的简化词，译文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并介绍国内外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引导学生们阅读。张成之深感不快，好歹挨到暑假就把他解聘了。

张成之领导敖东中学五年的成果，可概括为人和物两个方面。在人的方面，共培养初中生三个班，其中四年制毕业的一个班，修满三年毕业的一个班，修满一年的一个班。高中一个班，只修业半年，还有附小一个班。在物的方面，除改造草顶泥墙房屋20余间为校舍外，还修建了砖瓦结构新房，因"9.18"事变而停工。在教学设施方面，有藏书较完备的图书馆，还有全省首屈一指的理化实验室，具备各种实验用的仪器、动植物标本、挂图、人体模型等。这些教学用品，是张成之通过旅日同乡孙启世向爱国侨胞募捐数千元从日本买进，并由张成之亲自赴日验收运回的。

1931年"9.18"事变时，东北军在敦化驻守一个团。团长曲某见东北军首脑没有下达抵抗日军的命令，既未抗击，也未投降，就把部队撤到乡下，自已先逃走了。日军只有小部队进驻敦化，有时还撤离几天。不久，日本驻军接受渡边乙二的建议，逮捕了敦化县的几位头面人物。他们是县商会会长万茂森，敖东中学校长兼县教育局局长

张成之，县教育会常务干事陈兰台等人，关押一星期后，又把他们释放了。原因是日军此时立足不稳。以后，被逮捕过的这几个人，除张成之外，几乎全与抗日武装部队建立了联系，或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张成之为了避免再次被捕，便躲进敦化西沟乡，化装成农民，使人看不出他曾是一位官员。隐居半年左右，他与刚从日本回国的的同乡孙启世取得了联系。孙启世系留日学生，毕业于医学校，后在日本开设医院，并入赘日本人家庭。“9.18”事变后回国工作，深受日本人的信赖。孙启世依靠这种特殊身份，贸然从长春乘火车到敦化来接张成之去吉林。他们二人从敦化登上火车时，敦化日本警宪未敢干预。但是，当他们从吉林火车站下车时，张成之立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孙启世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张成之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受尽了侮辱，还挨了一顿嘴巴。孙启世对于护送张成之的失败，深感内疚。他急忙进行营救，最后经驻公主岭的日军师团长出面说情，使张成之才被释放。当时主动降日并窃据吉林省省长职务的熙洽，立即在省政府门前挂牌任张成之为扶余县长，张成之未赴任。在孙启世的帮助下，在沈阳开设一家药房。日本朋友伊藤赊销药品并充当顾问，又在吉林市开设松柏大药房，意在保持晚节。由于药房生意清淡，收入甚微。张成之不得不兼任吉林工业专门学校英语教师。1935年，张成之病殁于吉林。兹引拙文一段，可见葬仪举行时的背景。

“他的葬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时吉林市教育界爱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尤其是张氏之死恰恰是在伪吉林市警察厅进行第一次逮捕之后的不几天……。前往张家吊唁的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似乎是有意抬高这位当时在吉林市教育界并不是十分突出人物的身价。隆重地举行了葬仪。动员了相

当广泛的各中学敦化籍学生参加了葬仪行列，女师一中学校全体师生在灵柩经过时举行路祭。这种和当时政治气氛很不协调的行动，一方面集中地显示了吉林市教育界爱国力量的集结，用对张氏哀悼怀念的形式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权汉奸们的愤怒抗议，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注意和怀疑。”（《吉林文史资料》第17辑73页）

张成之的灵柩由其儿女护送，葬于敦化西沟家乡。

郭度先生

郭度，字让贤，湖南湘潭人。早年曾求学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授业于谭延闿门下。他来敦化任教后，还曾请当时在广州的谭氏寄来亲笔书写的楷字贴供学生临摹。1915—1916年间，他在北京追随同乡杨度从事筹安会复辟帝制活动。失败后，为了躲避通缉，他逃到吉林，在其妹丈杨律师帮助下，曾在省立一中任英语教员。1927年结识了张成之，二人同被学生排出公立学校，可谓同病相怜。而郭在事业上，所经受的坎坷，要比张成之经历得多，他的满腔报国热忱，只能在天真的学生身上得到共鸣和渲泄。

郭度到敦化时，虽已中年，却象孩子梦游天方夜谭中的新奇世界似的，到处感到新鲜和有趣。他徒步爬上险峻的老爷岭山路，赤脚走过数不清的“塔头甸子”，从不叫一声苦，他还常常向学生们讲述旅途所见所闻。他的教书热情是很感人的。从到敖东中学之日起，直到二年后积劳成疾而死为止，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几十名学生身上了。他教语文、史地等科。(以语文为主)。教课的时候，首先让学生掌握基本功，每周一次的作文批改中，他也是一丝不苟，逐字逐句的推敲。郭度对优等生不优待，对劣等生也不歧视。有一次，他给学生出的作

文题目是《星期日记事》，结果，一个平日作文很好的学生，写得冗长、繁琐，郭度只给20分，并当众批评了他。而另一个平日作文不佳的学生，这次的作文却写得简洁明了，郭度给了100分 为了纠正学生普遍的写错别字的现象，郭度给学生们订了一个公约：凡是写一个错字，罚款5吊（约合5分），写一个别字，罚款10吊（约合1角）。罚款用来给学生订报纸，供同学们阅览。经过一段时间，学生的错别字基本上消除了，再靠罚款，一份报纸也订不成了。

对学生书法基本功的训练，都是在课外时间辅导。在第一学年练习毛笔字时，郭度一个一个地把手教握笔的姿势和运笔方法。他根据每个学生字体的个性特点，有所选择地介绍古代书法名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字贴让大家临摹外，又介绍湖南近代书法家钱南园和广东政府名人谭延凯的手迹，让学生们用双钩法描下保存。当时，很多学生的书法高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水平。学校规定除星期日外，每天晚饭后上二小时自习课，不准缺席。郭度经常利用这二小时时间给学生们讲授课外读物，象《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他利用这些小说穿插在其它大量读物，随时随地讲一段。把很多学生不感兴趣的又难以理解的文言文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们，其中有《阅微草堂笔记》、《曾国藩家书》（原名曾文正公家书）、《东莱博议》、《饮水室文集》、《呻吟语》、《聊斋志异》等。在他热情的谆谆教诲下，有几个学生竟在三年内攻下了文言文这道难关。他们不但能阅读上列各种书籍，而且能写出通顺的文章，为他们将来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度不仅教学有方，而且对学生作业及其它方面也严格

要求。正因为如此，遭到了少数劣等学生和家长的非难，他们恨他又怕他，巴不得一下子把他轰出校门。以李凤阁为首的几个20岁左右的学生经过秘密策划，在一次讲课时突然发难。李凤阁首先提出问题，说郭度讲错了，让他再重讲一遍，接着又有二、三个学生站起来支持李凤阁的无理要求。起初，郭先生还未意识到这是一些学生有意整他，还以为李凤阁用心听课了。其实，郭先生根本没有讲错，纯属学生刁难。后来，当郭度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时，非常气愤，极度伤心，因而病倒在家，最后竟提出辞职。这时，校长张成之正在外地，他回校后听说了此事，就召集全班的学生列队到郭度家门口接他回校，郭度见校长和大多数学生如此尊重和信任他，也就欣然同意，并在学生队列前讲了几句十分感人的话。

郭度回校后更加辛勤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终于患了不治之症。郭先生平时对学生要求严格，许多学生对他敬而远之。在他病重期间，学生们很少去看望，但他在病榻上还喃喃地叼念着一些学生的名字。1929年夏季，当郭度病危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跑到郭先生家里，一个个泣不成声。郭师母抱着郭先生的头，用她嘴嚼的人参喂他，但已经无济于事了，任何仙丹妙药都无法挽回郭先生的生命了。郭度终于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事业。他为教育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后人树立了师严道尊的榜样。

程沐寒先生

程沐寒，吉林市人，酷爱文艺理论。他在哈尔滨中学教书时，接触到进步思想。那时，程沐寒住在学校的独身教师宿舍里，每天早晨起床，常常拾到从门缝里塞进的传单、小册

子、或报刊，都是些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读后大开眼界。在这些读物的指引下，他无师自通地找到了左翼文艺理论园地，开始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新思想、新文化。

1931年春季，程沐寒受聘来到敖东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语文教师。当然，他没有因为校长张成之思想保守而不敢宣传新思想，他不仅向在校学生介绍“普罗”文学作品，而且还经常向来校的已毕业学生宣传和介绍进步思想和进步作品。他认为这是推动青年走向进步之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时，陈翰章已从敖东中学毕业在民众教育馆工作，他阅读了从程沐寒先生处转来的第一本“普罗”文学作品—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此之前，“普罗”文学他从未听说过。虽然曾经读过鲁迅翻译的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文章，不知文中“××××”就是被删掉的“无产阶级”几个字，所以也看不懂。自从经程沐寒先生的指点后，好象一把久锈的锁被打开了，他觉得心里豁然开朗，如饥似渴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这就为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陈翰章在一年后（1932）加入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思想基础。

程沐寒的思想影响和他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活动，在敖东中学和敦化县城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个历来在思想方面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小镇，似乎吹来了一股清风。然而，这强烈地震动了张成之，由于程沐寒没有开展什么有组织的活动，没有违反法令和校规的行为，所以，张成之不能采取对付高先主的那种办法来整程沐寒，只好等到暑假才把他解聘了事。不料，程沐寒临行前向张成之推荐继任人选，竟得到张成之的慨允。程先生推荐的这个人就是在吉林教育界及文坛

上颇有名声的何云祥（何蔼人）先生。“9.18”事变后程沐寒流亡关内，日本投降后，回吉林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48年冬，吉林解放后因病逝世。

何云祥先生

何云祥，字蔼人，吉林市人，原籍安徽。他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相继在吉林、长春、农安等地中、小学及教育行政部门任职，他的散文常在名报刊上发表，因与东北大学某教授在报纸上进行辩论而名噪一时。何云祥还有几位文坛好友，如我国早期新诗诗人徐玉诺，创造社翻译家穆木天，古典文学家孙晓野等。张成之能把这样一位在省内教育界著名的教师聘请来校，有助于提高毓东中学的知名度，对于以高额学费（通常是银洋20元一年，1928年高达100元），为收入重要来源的学校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扩大学校招生的覆盖率。何先生赴任之后，吸取程先生的教训，闭口不谈“普罗”文学。这时，毓东中学已经开设高中班，何先生担任教务主任兼语文教员。他的教书育人热情不亚于郭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方面，又优于郭度。至于课外辅导，则不拘于晚间自习时间的填鸭式老模式，而是个别指导，让学生们自己阅读，自己写出读书笔记。何先生对学生的笔记详细评阅，占用了很多睡眠时间。学生们闯出了古典文学藩篱，扬弃了从郭先生那里吸收来的一些封建主义糟粕。学生们在何先生的指导下开拓了视野，不少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地研读新的学科，有的学生还自学了《中国文学概论》和《近代欧洲文艺思潮论》等书，丰富了头脑，扩大了知识面。可惜好景不长，“9.18”事变后，毓东中学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夭折了。

1932年元旦，何云祥在即将离校之际，酒后在学校庭院中击鼓引吭高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以借古人诗句来抒发他的一腔愁绪。不久，他离开敦化回到吉林。1932年2月，何云祥在给他的学生们的信中写道："此次沪淞之役，（即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的"1·28"战役，19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英勇抗击了日寇），国军英勇抗战，西人作壁上观，深为赞叹。看来国事尚非不可为也。"这时，何先生仍对国家的前途抱有一线希望，但是，对敖东中学岌岌可危的前途，则无计可施。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位老师外，敖东中学还有几位教英语、理化及史地的先生，他们是王迎凡、柳伯华、袁××、高××、杜剑寒、安大開、门天南、吴恒颐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宣统元年林伯渠视察敦化学务事略

李建树　王仁学

林伯渠（1885～1960）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中共七大，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原名祖涵，湖南省临沣县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在帮助孙中山接受中共建议实行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林伯渠受同盟会派遣到吉林省从事活动，公开身份为吉林省城劝学总所会办。1909年（宣统元年），林伯渠为吉林南路省视学普通科科员，视察南路学务。他在视察伊通、磐石、桦甸等地学务后，于10月16日由吉林出发，10月22日到达敦化。

当时敦化的教育很落后。虽然自1882年建县至1909年已历27载，但只县城有一所初级小学堂，沙河沿有一所小学堂，在111个村屯中只有大山嘴子、孤山子、通沟镇、官地屯、南沟屯、小石河、占家屯、新立屯，杨木林子、珠尔多等十处，各有私学馆一所，而且私塾里学童甚为寥寥。林伯渠为了摸清教育落后的原因，探索发展教育的途径，在赴敦化的路上，广泛接触人民群众，深入调查进行开导。如他自己所记，“此次行役，至日暮山深无店栖止时，投宿民家，辄集其长老儿童，喻以学堂利益，反复推阐，力陈不学之害。青灯如豆，该长老等聆之醰醰，一时奋启悱发，祗借离学太

远，不克送其子弟前往，又憾深山之中，村仅数户，不能自立学堂。可知天良未昧，乐与人同。苟能家谕户晓，何难力却迷障？”

林伯渠到敦化后，即向敦化县知事谢祖荫询问了学务情况，并亲自到劝学所（相当以后的教育局）、两等小学堂进行视察了解，并且对私塾做了抽查，而且邀请了学生家长以及学董谈话。敦化县劝学所开办于宣统元年三月，借两等小学堂一间馀房办公。劝学所总董兼视学马德山，是贡生出身，另有一个劝学员叫朱庆荣，山东昌邑人，师范毕业，此外还有一名书记（办事员）一名仆役。经调查，此所工作很不得力，林伯渠当即指出：“劝学所之设，事关全境教育，良非浅尠。（注，尠，鲜的异体字。“良非浅尠，”意为实在不是浅薄简单的事情。）该县前虽设所，徒有虚名。并提出要求“今拟添派劝学员，认真调查乡屯房户口疏密情形暨学会儿童数目，并轮流下乡，劝导乡民子弟就学，或摊款设公立小学。”敦化县官立两等小学堂是光绪32年3月在原县办义学基础上建立的，位于县城内东南角今敦化市实验小学处），有校舍15间，其中讲堂4间，礼堂1间，自习室寝室4间，教员室2间，夫役宿室1间，厨室2间，食堂1间，操场1所，共占地面积约25,890平方丈。至宣统元年已历3载，当时堂长是郭景泰，司事是张振铭，有3个班级，3个老师。3个老师是郭景泰（兼）、谢文俊、田淑容。学校架子虽有，但无论学生数还是教学都不甚好。林伯渠视察后作了认真的分析评论。他说：“两等小学堂，高等班第2期程度之学生，仅12名；初等班第3期程度之学生仅14名；又新招11名，合计37名而已。每岁用款6千三、四百吊，进入相抵，仅足敷用。校式校具不甚完备，学生国文程度尤

劣。夫官立者，既不足为模范，则望风者安能期其兴起！”

林伯渠在视察后又与知县谢祖荫恳谈，明确指出敦化教育有四个缺点。一、学生国文程度普遍太低；二、劝学所职员津贴太薄，其中总董兼视学马德山不但无薪水，而且饮馔也须自给。林伯渠愤慨地说：“世安有如此热心之人，苟非愚则有所图耳。誌勤慎从公，断难责人以枵腹！”（注：枵xiāo，枵腹、空腹、饥饿。）三、在改良私塾上，很不认真。林伯渠指出，敦化县以前所上报的筹备学务表内说，宣统元年改良私塾已有十处，可是实地考查所见，并未改良，一仍故态，而且乡屯的私塾更为腐败。四、县里对倡导办学很是不力。林伯渠指出，县所报筹备学务表中说，宣统元年添设初等小学数所，可是这次视察才知并无此事，他气愤地说，敦化县对学务“既未提倡以资观感，复视筹备学务表如儿戏！”又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在地方贤有司之善于提倡耳。”

在林伯渠的批评下，谢祖荫不得不低头折服。林伯渠当即要求谢祖荫根据敦化教育实际订立整顿敦化学务措施。这样经过研究，以视学林祖涵（即林伯渠）和知县谢祖荫共同拟订的名义，订出了《整顿敦化学务办法六则》。

《整顿敦化学务办法》主要内容如下：一、两等小学堂高等班学生，现仅12名，嫌少，而且入学年限参差不一，有3学期者，有2学期者，有1学期者。查阅该学生等月考成绩与定章第一学年学科程度相符者尚多，又查现在所授功课并未按该学生等入学年限分别教授，应以本年下学期为始，一律作为第二级生，以昭整齐，而便教授。惟以第三级生俯就二级，与定章尚无窒碍，而以第一级生提升二级虽属程度

相合，究之学年短少，恐毕业时难免部驳，（注：学部驳回）让先行呈报。二、两等小学堂，初等班定额50名，现数仅25名，入学年限极形参差，学生程度尤不齐，一应将程度稍优者编为第三级，学生程度低者，并添20余名，以足定额之数，俱编为第一级生，统此两级合班教授，教员仍旧，而学生加多。寓推广于樽节之中，以普及教育扼要办法也。三、全境学区、观照巡警的分布法，分为六区。惟劝学所仅有总董一人，劝学员一人，似难兼顾，应添劝学员二人，每人管二区，实行劝诱，劝学所事务须从调查全境学令儿童，察看屯镇户口疏密情形，劝导设立公私小学为入手。四、改良私塾亦普及教育最为关键事务。应由劝学所调查全境私塾数，及每塾中学童若干，登记备查，并给以学部改订之初小学堂简易科课程表，令其遵照教授，随时考察。如有故意所歧异，违背定章或程度太低，不能遵循者，拟将全境塾师招集考试一次，用以淘汰。再者发给课表之时。劝学员亦须就近指点其教授管理等法，俾有适从。五、宣讲所为开通民智机关，简易识字学塾为关系国家重要事务，均须从速举办，以开风气。六、两等小学堂高等班缺图画课，照章应加。

在林伯渠此次视察督促下，敦化县教育从此有了新的起步。1910年(宣统二年)，额穆索在南大街建立了官立小学堂，敦化县城在西北角的城隍庙处设立了中区第一初等小学。1911年（宣统三年）在沙河沿设立了东区第一初等小学，在筛子沟屯设立了东区第二小学，在城山南乡的杨木林子设立了敦化县西区第一初等小学，在城山北乡孤山子设立了西区第二初等小学，在城山南乡的马号设立了西区第三初等小学。

林伯渠到敦化，还特意游览了传说的清始祖布库里雍顺起兵誓师的地方—鄂达里台。（注，鄂达里即鄂多里）并写下了《游鄂达里台》一诗，表达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和清政府无能的愤慨。

游鄂达里台

故老争传鄂达里，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雪，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满眼狐乌雨雪诗。

“五·卅惨案”在敦化的反响

刘忠义

1925年夏天，“五·卅惨案”的消息一经传到敦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敦化第一小学校长，颇有声望的爱国知识分子徐伯阳先生，首先在教育界协商，倡议组织“沪案后援会”。

在徐伯阳先生的倡议下，各界人事共同商榷，于6月22日下午2点，在敦化县教育会会场召开了代表会议，到会的有：教育会代表郭宗耀、农务会代表于登瀛、商务会代表陈卓之、基督会代表张迎祥、一校代表徐伯阳、二校代表李达夫、三校代表温养田、五校代表陈仲武等10余人。

会上，首先由发起人徐伯阳先生向大家讲述了会议的宗旨，尔后经讨论决定：1、成立敦化市民外交后援会；2、推举郭宗耀、陈卓之、于瀛洲、徐伯阳为总干事，陈仲武为游行总指挥；3、后援会设四股，文书股颜辑五、陈卓之；会计股郭宗耀、稽献斋；讲演股赵丁一、陈仲武；交际股于瀛洲、张迎祥；4、由各界全权代表分头募捐；5、于6月25日召开市民大会，讲演、游行。

6月25日上午9时，各界人士及市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操场（现在龙井路西段路北）。宣布开会后，首先由游行总指挥陈仲武先生发表演说，讲述了大会的宗旨和上海五卅惨案经过。陈仲武先生说，5月30日那天，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斗争，被英国巡捕逮捕100多人，随后群众万余人，聚集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要求释

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屠杀，群众死10余人，伤无数。当人们听到这里时，群情激愤，全场响起了震天的口号声。接着，由娄禹华先生讲述了五卅惨案前后的形势。

大会后，愤怒的人们高举着旗子和横幅标语，走上街头，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五卅惨案在一个边远山城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正说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早已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道登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舞台。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是荣辱与共，同舟共济。

张爽先生二、三事

娄德璋　口述

王仁学　整理

我与张爽先生分手已四十余载。只因海峡两岸长期隔绝，至今未能相见。几经沧桑岁月，今逢两岸开通。我虽已年逾古稀，依然会友心切。回首往事，夜不能寐。忆当年，不胜感慨万分。

我与张爽是在敖东中学相识的。但交往频繁、互相了解更多的还是在伪满协和会共事期间。张爽，字“如松”，后改为“一中”。1927年，他在吉林一中读书时，因参加反对日本人修筑“吉会铁路”请愿游行，被军警打成重伤。伤愈后随父来敦，在敦化私立敖东初级中学插入一班。1930年于敖东初级中学毕业。“9·18”事变后，他又随父返回吉林市，就读于吉林一中（高中班）。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1934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时，正置日本帝国主义者极力推行“日满亲善”、“日满协和”之际，在东三省各地层层建立伪协和会。张爽回来时，伪敦化县协和会刚刚建立不久，正缺少象他这样会日语的人，自然他也就很容易挤进去，充任了协和会本部部员兼翻译。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虽然在亲日的汉奸团体供职，然而爱国爱民之心却有增无减。这也许是他受家庭和社会影响的缘故吧。他的父亲张成之是敦化县小石河屯人，字“器臣”。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修英语。毕业后回吉林省从事教育工作，历任省

教育厅视学、吉林五中校长、长春第二师范校长。1927年，应聘回敦化创办敖东中学，任中学校长兼县教育局长。他是我省小有名气的教育专家，又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以计划细密成绩斐然而颇有声誉。“9.18”事变后，他险遭日本人杀害，他对投靠日军的省长熙洽任命他为扶余县县长，嗤之以鼻，拒不赴任。相反，却弃教经商，开起药房来。张爽回国任协和会部员时，其父已忧郁成疾，翌年病逝于吉林。母亲也相继去世。这种国破家败的处境，不能不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学生时代那种真挚的爱国热情，在他身上更加成熟。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因此，在他任职期间，表面上为日本人做事，暗地里却为民族百姓分忧解难。许多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青年。

1939年，我到沙河沿小学任校长时，抗日联军在沙河沿二龙山密林活动并取得了辉煌战果。敌人调动了一批伪满军、警察、日本宪兵到沙河沿一带对抗联实行残酷的大讨伐、大围剿。为了配合敌军的围剿，伪敦化县协和会决定派张爽，李树勋随同省协和会部员郭潜华进驻沙河沿小街与宣抚班一起，组织沙河沿伪协和分会，开展稳定治安的宣传、安抚工作。张爽来到这里既不宣传，也不做安抚工作。然而却千方百计把那些替老百姓说话的人拉进协和分会，任命村长解永吉为分会会长，推举我为协和分会副会长。

张爽还要求我们把各屯穷困户调查清楚。在他的旨意下，我们调查了百余户的穷困户，经他汇综上报，每户发给救济款20至30元不等的伪币，缓解了一部份人的临时困难。

为了麻痹人民维持满州伪政权，伪县协和会每年春天，都要召开一次协议代表会。由各分会派代表出席，反映当地治

安、安抚工作情况。我经常以代表身份出席协议代表会。记得我还当过省代表。我和大桥屯校长王德海(也是代表)在会上敢说话、敢揭发伪军、警察、日军宪兵欺压百姓、骚扰村民之事。张爽就暗地支持我们搜集这方面情况，暗地里鼓励我们说："你们不要怕，有我们给你们作后盾"。他还亲自帮我们审查、修改发言稿。这样我们也就毫无顾虑地在大会上披露敌人的种种乱民之举、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农民饥寒交迫无法生产。衣食无济，甚至晚上没油点灯，并要求大会协助解决。敦促与会的军方代表答服，弄得这些军方代表十分狼狈。大会在迫于众人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答应设法解决。张爽见大会答应解决，便于会后亲自到兴农合作社要出青布百余匹、面粉百余袋、火油 80 桶，让我们向村公所要车拉回沙河沿协和分会，然后分发给各屯。

1939年新年前夕，我到县里去领饷，顺便到伪县协和会本部询问补助费一事，碰上了张爽。他便约我去喝酒，在酒桌上，他小声告诉我。敦化宪兵队要派一个小分队去沙河沿抓人，我已介绍他们去找你。你可得利用协和分会的合法地位，替中国人说话呀，果然，事隔不久，一天上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分会的杨俊峰来找我，说唐贯一翻译和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来找你，要你到分会去一趟。我到分会一看，那个日本人原来是敦化宪兵队分遣队小队长岸北。因为他来过我们分会，所以我认识他。见面后，互相寒暄了一阵，然后岸北通过翻译告诉我，"我们准备在这住一段时间，要我过几天向他汇报情况。我回去后，想他们一定是来抓人的。要按张爽的嘱咐多救些人，就得把这个岸北小队长拉住，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再利用他。于是，我上街买了一些酒菜，让我妻子

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宴请岸北小队长和唐翻译，并把村长、屯长、商会会长请来坐陪。席间，我有意向岸北表白："沙河沿的老百姓是安分守已的，就是太穷了一点，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粮食给抗联送。再说我们协和分会是讲协和的，决不会做与本会宗旨相悖的事。"最后，岸北走时让我十天后，到他那去一趟。

十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听说他们抓了一些人。这时，我想起张爽救人的嘱咐，便鼓起勇气主动去找岸北小队长。岸北当时住在沙河沿警察署西院的三间草房里。我进屋时岸北正坐在炕上看什么东西，地下站着一个朝鲜族青年博役。因为唐翻译进城去办事，所以博役便充当了临时翻译。见面还是互相寒暄了几句，然后岸北告诉我说："最近沙河沿东沟、八家子不稳定，靠近二龙山一带，常有"通匪"（指给抗联送给养）活动，我们抓来了几个人，正准备请你来认一认，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然后，他叫"博役"通知宪兵把被抓来的人带上来。不一会，有6、7个身穿破棉袄，脸色苍白、满脸血痕的人被带上来。我一看他们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很难受，但一想到要救人就不得不耐着性子，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几个人，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从没见过面。他们一见我都争先乞求说："分会长、冤枉啊！我根本没给抗联送过东西，请会长救救我吧！"，我也就不管认识不认识，装出全认识的样子，毫不犹豫地冲着这几个人说："噢！原来是你们几个。"说罢我向岸北说明这几个人我都认识，是东沟和八家子的农民，都很守本份，和抗日联军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岸北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我一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假装有事，告辞了。过了几天，唐翻译告诉我说："岸北队长让我告诉你：上次

被抓的那几个人都放了。”当我把这事告诉张炎时，他也很高兴地连声说‘这太好啦。”

1940年春天，从长春来了一帮日本宪兵，到官地一带抓人。凡是与抗日有关连的人统统都要搜捕。随同日本宪兵一起来抓人的还有满军、警察。这些人当中有个外号叫小林（原名陈长林）的翻译，抓人最凶，他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听说谁与抗联认识，就把谁抓起来。更可恨的是他张口就骂，动手就打，闹得人心惶惶，个个提心吊胆，那还有心种地。一天，有4、5个农民到我家找我，让我给想个办法。为这事，我特意去县城找张炎商量。张炎想了一会，带我去见事务长渊上（日本人），让我向他直接讲述这一情况。渊一边听我讲述，一边插话说：“小林这样干，不仅抓不到抗联的人，相反破坏了治安，影响了种地”。渊上听了也很生气地说：“这样干的不行，他们（指农民）种不上地，我们粮食从哪里来。”

这件事后来让县里守备队大队长知道了，他把东沟宪兵队队长大骂一顿，并命令他回去教育小林。这个队长回去只好拿小林出气，把小林臭骂了一顿。小林满腹怨气，开始找我去县里告他的人。我闻讯后大吃一惊，赶紧到县城找张炎商量对策。他听后说：“小林子这种人就该这么治他。”然后他转话题说：“小林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咱们可不能吃眼前亏。”他想了想说：“走！咱俩到教育股找张跃轩股长，看看能不能让他给你调转一下。”事儿也真巧，当时吉林师道训练所开班，给了敦化一个名额去吉林学习半年。张股长与张炎很要好，一看是张炎求他，便爽快答应把我调回敦化先去吉林学习，回来再分配工作。就这样，我在他俩帮助下，离开了沙河沿，幸免了这场灾难。

1940年底，陈翰章将军牺牲后，日本人在伪县公署前，为被陈翰章在牛心顶子处决的四名日本军官举行"慰灵祭"时，把陈翰章将军的首级供在灵台上，张爽以县协和会部员身份，公开将陈将军首级摄了下来。后来我从吉林回来休假，他把照片偷偷交给我，让我辨认是不是陈翰章。当时，我想，这明明是陈翰章，他为什么还让我辨认？真令人费解，我同他和陈翰章是同班同学，难道还分辨不出来是不是。很可能是出于他的善良愿望吧！从他以往流露出来的对陈将军爱国热忱佩服之情，可以看出，他的爱国之心是深沉的。我又仔细的看了看照片半开玩笑的对他说："你这个人，进了协和会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他带着惋惜的神情叹了一口气，轻声地说："谁不爱自己的国家，谁愿替别人卖命。象陈翰章这样人为民族而献身，死得其所。"

1941年，我从吉林受训返回敦化，在张爽的推荐下，担任了敦化县民众教育馆馆长。1942年我转任敦化县东关小学校校长。当时东关校是县里较有名气的一所小学，但因经费困难，校舍、桌凳都破乱不堪。房子不够用，只好上二部制，我虽多次找教育股，但始终未能解决经费问题。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去找张爽。张爽因受父亲影响，对教育事业一向热心。他听我介绍了东关校的处境，表示同情，并答应帮助想办法。不久，经过一番筹措、成立了一个"学校父兄后援会"，把张子炎、阮务民、张星垣以及东烧锅经理王子贞等有钱有势的人拉进父兄后援会任会长、副会长，把许多学生家长吸收为会员。发动会员家长为学校募捐，很快就筹集了近万元（伪币）经费。买了20间民房改修成教室，不仅把原来的二部制改为全日制。而且，又多收了百余名学生。改善了学校的教学条件，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

面的好评。

张爽先生的许多爱国举动，在敦化县城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心目中深得赞许。我对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胆识，至今回想起来，敬佩之心依旧油然而生。但在日本人心目中，开始是怀疑，最后终于被察觉，于1943年前后被伪吉林省宪兵队逮捕。两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他先后两次离敦，辗转于吉林、长春。日本投降后，于1948年他随国民党从长春撤走。翌年离开大陆去台湾。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多少志同道合的国、共两党人士，长期隔海相望。今天海峡两岸的华夏子孙总算能够互相探亲奔谈了。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同张爽同学相会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之中，更期望相会于他的故乡敦化，以便畅怀往事，同渡余生。

东北抗日军队

在敦化的主要战斗

董占魁

敦化，是吉林东部的战略要地，山多林密，便于隐蔽。东北抗日军队就是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与日本侵略军及其仆从在这里发生过数十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仅有据可查的就有24次之多。

1、黑石岭阻击战。1932年5月，侵占敦化的日军秘密调动兵力，准备攻打额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抛开大道，把部队用火车运往黄泥河，然后再抄山路秘密接近额穆。对此，国民救国军已有察觉，但具体时间和路线不清楚，只好派一个连在来往敦、额两县的必经之路——黑石岭上布防。

5月17日上午，由黄泥河进攻额穆的日本守备队在这里遇到了顽强有力的阻击。狡猾的敌人便采取了正面佯攻、侧翼包抄的战术，迂回到救国军背后。指挥官宋连长发现腹背受敌，便组织突围，但为时已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宋连长率全连官兵英勇应战，奋勇冲杀，虽然消灭了大批的日本侵略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勇士壮烈牺牲。

这一仗，救国军打出了军威，日本侵略军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人这样勇敢，不怕牺牲。日军虽然占领了额穆，并放火烧了额穆镇，但在救国军的打击下，没敢停留，当天就撤回敦化了。

2、救国军三次攻打敦化城。1932年2月21日至9月20日，以王德林为总司令，共产党人李延禄、周保中为总参谋长的国民救国军曾三次攻打敦化城。打击了侵占敦化的日本侵略军。

第一次攻打敦化城，是1932年2月21日。当时敦化商会会长万茂森曾秘密向救国军传递消息，答应在救国军攻城时，他的武装商团恪守中立并协助把“永衡官银钱号”的30余万元存款提出，给救国军做军费。救国军于21日拂晓开始总攻。攻城战斗进展顺利，但日军也来了增援部队。此时，万茂森非常紧张，借故拖延时间，不同意救国军把钱提走，“钱号”的卫队还亮出了匣枪。事已至此，负责提款的李延禄只好空手而走。攻城部队只击毙日军熊谷曹长等3人后撤出战斗。

第二次攻打敦化城，是同年6月18日。这天破晓，救国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姚振山率领攻城主力部队与日军森尻大佐的出击部队相遇，双方在城西发生激战。救国军一部迂回到新兵营，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此时，敦化北山的战斗正趋炽烈，救国军冲上主峰，经过白刃格斗，占领了炮台，把救国军军旗插在炮台上。攻打驼腰山的部队非常顽强，战斗进行了近10个小时，完成了阻击任务，拖住了敌人。中国人勇敢的精神，在日本侵略者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第三次攻打敦化城，是1932年9月20日。此时，驻敦化日军增加了野炮、坦克和装甲车，城防工事更加巩固，防御体系更加完备。这天凌晨，救国军全线出击，吴义成、周保中身先士卒，指战员们奋勇冲杀。但因左路的陈团擅自撤出战斗，右路的单团未达阵地就中途离去。仅剩吴义成孤军难支，只好草草收兵。

3、南天门伏击战。南天门是敦化通往宁安的要道，也是官地与沙河沿来往的必经之路。日军为了确保敦——宁公路畅通无阻，于1932年春在官地建立了兵营，驻扎了部队，每天派出一个班去沙河沿巡逻，早出晚归，从不间断。

国民救国军侦察到日军这一行动规律以后，于5月末的一天早晨派出小部队在黑背岭西端设了埋伏。6名战士带一挺轻机枪埋伏在山上，12名战士隐蔽在路东灌木丛中。8点多钟，12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来了，顿时枪声大作。可惜我军武器陈旧，山上的机枪出了故障。日军隐蔽起来开始还击。伏在山上的6名战士壮烈牺牲。埋伏在路东的战士瞄准敌人，弹无虚发，几十分钟的工夫，就把敌人全部消灭了。从官地和沙河沿出来增援的敌人到达之后，救国军战士已经掩埋完同伴的尸体安全转移了。

4、青沟子战斗。1935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率西征部队活动在青沟子一带。一天，运动中的部队被日军一个小分队发现了，他们带一些自卫团紧紧尾随穷追不舍。

针对这种情况，李荆璞决定，一定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于是，部队开始和敌人兜圈子，以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同时设法做自卫团的工作，使其在战斗打响后脱离战斗，经过100多里路的行军，确实拖垮了敌人，完成了战斗部署。虽然日军小分队紧紧咬住我军不放，自卫团却远远地落在了后边。

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日军在追击中进入了伏击圈。拂晓，战斗打响了。自卫团在后边听到枪声就停止前进，脱离战斗了。日军一个小分队很快被全歼，击毙9人，打伤1人，俘虏翻译1人，还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

5、三打额穆城。 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率队到敦化、额穆开辟新的游击区。在一年的时间里，李师长曾3次率队攻进额穆，获得了重大胜利。

一打额穆，是1935年1月。李师长率队向额穆进发，途中得知敌人有3辆军用汽车从敦化开往额穆。于是他们就在公路两侧设伏。天快黑时汽车开来了。战士们一边喊话，一边猛扑过去，押车的伪兵还没弄明白虚实，就举手投降了。李师长派一部分战士把车上的年“嘟咕儿”送进山里；另一部分战士坐上汽车，由伪军引路连夜攻进额穆城，缴获留守（大部分敌人“讨伐”去了）伪军的40多支大枪和一些服装。天刚拂晓，就撤出了额穆城。

二打额穆，是1935年初冬。由于日军对革命军进行了“篦梳”式的讨伐，使革命军的处境异常困难。为了搞到一些给养，部队决定再进额穆城。部队夜间出发，途中抓到一个特务，他供出现在只有100多人守城，大部分敌人进山讨伐去了。然后由这个特务带路，顺利地进了县城。部队分别把伪军各乡驻地包围起来，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和警察们见大势已去，便纷纷举手投降。部队在街里弄到一些布匹，带着缴获的枪支，迅速撤出了县城。

三打额穆，是1936年1月。革命军部队驻在额穆北大秧一带的深山里，战士们缺吃少穿，冻伤和病号逐渐增多。要解决吃穿、治伤问题，只有到县城去想办法。因此，部队决定三打额穆。但是不能硬拼，要想办法。于是，便派人去找和革命军有联系的青沟子自卫团商量：革命军佯攻自卫团；自卫团向额穆县城求援。待敌兵出援，革命军立即进城。革命军在路上设好埋伏以后，主力向县城进发。途中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派兵增援青沟子。这时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直插

县城。伪军和自卫团一看革命军来势很猛，没敢抵抗就交枪了。日军也弄不清虚实，乱打一阵。革命军一边迎击敌人，一边派人打开敌人仓库，弄到700多双胶鞋，撤出县城，回到深山密营。

6、哈尔巴岭战斗。1935年5月2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一团五连在远征途中，在哈尔巴岭与大石头区间袭击并颠覆了日本侵略者的“国际列车”。五连连长金哲镇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由230人组成了参战部队。他们把200人分成4个战斗队，于5月1日晚间拨掉一条半铁轨的道钉，移开铁轨，之后分别找四处有利地形埋伏好。

5月2日凌晨2点40分左右，从朝鲜清津始发直达新京（今长春）的202次列车驶到移开路轨处，随着一声巨响，机车立即倾倒在路基下面，后边的货物车厢和硬席、硬卧车厢也都倾斜成45度。这时，我军从埋伏地点一齐向后部的警车射击。警护队跳下车来拼命抵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警护队留下3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了。我军上车搜索，又击毙1名，俘虏17名日本官员，并缴获了一批物资。

7、江湾突围战。1935年5月下旬的一天夜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率领700多人，驻在青沟子东南边的一个屯子里。次日凌晨被敌人包围。战斗打响以后，一边组织佯攻，一边寻找突围的时机。部队刚一行动，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集中火力射击。部队冒着枪林弹雨突出去以后，被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江挡住了去路，并且处于三面临水一面受敌的严重形势。李师长指挥部队一边还击敌人，一面向小树林里转移。

在这紧要关头，部队碰上一位打渔老人。老人用小船把重武器运过江。战士们会水的，帮助不会水的，互相拉扯，

互相搀扶着，总算渡过江了。

过江以后，绕到敌人后边，占据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江湾激战。不多时，我们的增援部队到了，两面夹击，敌人招架不住，边打边撤走了。这一仗，共毙伤日伪军600多人，其中1名日本中校毙命。

8、官地战斗。1935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五两军部分主力，集中兵力，统一行动，由李荆璞、陈翰章任指挥，准备夺取官地，打击岗子的日军。12月7日，我军主力一部秘密运动到岗子以北，潜伏在大沙河沿岸。我军另一部分主力则直逼官地街东口和北门防所，用集束手榴弹猛炸防所，并施以火力打击。这两个防所的自卫团除被打死的外，全部投降。不久，西防所也被攻破，一个排伪军交枪投降。在小街中心，日军教官率伪军中队据守顽抗。激战1小时，日军教官被打死，伪军停止抵抗，官地小街被完全占领。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3人，伪警察及自卫团22人，伤15人，俘虏150多人。驻岗子日军小林部200多人，慌忙出来增援，遭到我军伏兵的袭击，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企图退回岗子村边反击，但岗子已被我军占领，敌人陷入包围圈内，激战两个多小时，日军只10余人逃脱，其余全部被歼，共缴获机、步枪220多支（挺），迫击炮4门。岗子自卫团40多人全部投降。

9、巧袭地主院。1935年1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一团，因军部转移，失掉了联系，因此战士们还没穿上冬装。为了解决冬装，由崔参谋等50名指战员化装成日军"讨伐队"，闯进了敦化镇郊窝集子沟的地主董国基的深宅大院。

董国基把"皇军长官"请进了堂屋，恭维款待一番"长

官”问董国基为什么不快开门，莫非你家窝藏共匪？董国基连忙说：“鄙人不敢”。“长官”又问：你有多少团丁？”“20多个”。这时外面一声枪响，“长官”勃然大怒：“皇军在此，团丁胆敢鸣枪示威？赶快把他们集合起来！”

团丁们集合起来，挨了一顿训斥。“长官”一看蠢蛋们乖乖就范，便命令战士们把枪收缴了。临走，把董国基及其两个侄子都带走了。这时，董国基自知上当，但只好忍气吞声。

过两天，董的侄子带回一封信。信上说，限期把钱、粮、衣物送到某处，见物即放人。管家只好把所要之物用爬犁送到指定地点。这一仗，只放一枪，既收缴了20多支步枪，又得到了部分给养和衣物。

10、黑石屯战斗。1936年1月6日我二、五两军主力四个团沿牡丹江两岸强行军。1月7日黎明前进至距黑石屯西街口三里之土岗潜伏，按事先侦察好的敌情部署进攻方案。早晨6点左右，敌西防所发现我军行动，并首先向我射击，战斗自此打响。我进攻部队展开猛烈进攻，西防所伪警察自知无力，便立即交枪投降。我进攻部队直逼日军防所。日军顽强抵抗。我军将敌人截为东西两段，占据屋顶，控制街口，用猛烈火力及手榴弹逐段扫荡前进。交战到上午10点，150多名日军被我全歼，警察大队及自卫团200多人，死伤20多，其余全部投降。

11、额穆战斗。1936年1月9日，即黑石屯战斗的第二天，我二、五两军乘额穆守备伪军动摇，决心攻打额穆。早晨5点钟，我主力部队首先将城西和城南包围，突击部队向城东防所攻击前进。伪军关大队长率200余人顽抗。激战2小时，这位大队长率90余人狼狈逃窜。午前8点战斗结束，

将额穆完全占领。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官兵9名，毙伤伪军官兵50余人，俘虏伪警察、伪军及自卫团共370多人，缴获各种机、步枪390余支（挺），收缴了不少物资。

12、新房子战斗。1936年农历正月15日清晨，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六师师长率领100多人的队伍，来到了官地东新房子屯，准备吃早饭。饭还没吃完，北山上的岗哨急报敌兵追上来了。战士们火速集合，出屯迎敌。

追兵是伪军一个连，从南山向屯内袭击。我军战士们用机枪，、步枪英勇还击。在还击中逐渐完成了对敌兵的包围。经过前后夹击，最后将一连伪军全部消灭了。待驻大甸子的伪军前来增援时，我军已经打扫完战场转移了。

13、寒葱沟伏击战。1936民3月，东满省委会议以后，抗联二军三师奉命在敦化以南地区活动，引诱敦化的敌人。把主力一、四两师秘密控制在寒葱沟附近，准备乘机打击敌人。3月7日我军探明，日军500多人，伪军250余人，从敦化出发向大蒲柴河前进，准备进行短期“讨伐”。

当晚，我一、四两师移兵于寒葱岭顶，设下埋伏，三师封锁寒葱岭口。3月8日上午6点多钟，日军尖兵60多人搜索前进，未发现异常。接近正午，日军在前，伪军在后，完全进入我军埋伏圈内。这时，我军土地雷沿大道同时爆炸，伏兵一齐开枪，尖兵全部被消灭，伪军被打死10多人，其余全部被缴械。日军主力，沿路卧倒抵抗，我军猛烈射击，激战到下午4点左右结束。共击毙日军350多人，伤50多人，生俘70多人，缴获长枪500余支，轻机枪16挺，步兵炮4门，阻击炮6门，无线电通迅机2部。其他弹药、粮食甚多。

14、大蒲柴河战斗。1936年3月10日晚11时，抗联二军从寒葱沟兵分两路，准备乘胜夺取大蒲柴河。一部分绕过大

蒲柴河伪警察大队防所，沿富尔河设伏，截击西退之敌。另一部分于次日拂晓5时向大蒲柴河东口发起攻击，将防所攻下。伪军大队长带队沿富尔河西逃，被我截击部队伏上。除大队长等人逃脱以外，其余全部被俘。此役共毙敌8人，伤3人，生俘伪警察大队和自卫团260多人。

15、石门子战斗。1939年1月14日，抗联一路军三方面军王团指团长率队攻进了石门子森林采伐林场。他们一攻进林场，就兵分两路，一路迎击敌人，一路去动员林业工人打开粮食仓库，支援抗联。

战斗从晚间10点开始，一直打到午夜才结束。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得到了大量粮食，还有20多头牛。林场有70多名工人自愿为抗联背粮食送进深山密营。其中20多名青年工人志愿参加了抗日联军。

16、大蒲柴河战斗。1939年4月7日，抗联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指挥部队袭击了敦化县大蒲柴河镇。在这次战斗中，少年铁血队一马当先，攻进了伪警察署院内，获得了重大胜利。

这天晚上，战士们隐蔽在公路两侧的水沟里。乘3名伪军叫开大门之机，战士们从水沟里一跃而起，边打边冲进了镇内，直奔伪警察署大院。伪警察企图顽抗，被消灭大半。这一仗，共消灭日伪军200多人，还活抓了一部分。战士们烧毁了敌人的野战仓库，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其中有好几百支新枪。

17、牛心顶子战斗。1939年4月，抗联袭击大蒲柴河时抓了一个叫李相武的朝鲜族人。他哥哥李相文是伪敦化县警务科的密探，听说弟弟被抗联三方面军崔团长的队伍给抓去了，就筹备一些胶鞋、子弹，想把弟弟赎回来。伪警务科知道此

事后，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说降陈翰章。这时，日军早已悬偿5000元捉拿陈翰章。李相文为了捞点油水，便接受了任务。以后找到了崔团长，崔团长问明来意以后，真想一枪崩了这个坏蛋。

陈翰章听完崔团长的汇报，非常气愤，决定给他们点厉害，以绝其恶念。他对李相文说：“你回去告诉你的日本主子，如果不怕死，就在6月24日牛心山下见面。

6月24日午后两点钟，吉林警务厅警备课长西濑户秀夫，伪敦化县副县长三开易等、警务科的永田善男和福田素直，加上翻译杨选清，由李相文带路，来到了牛心山下。他们一进山就被抗联战士们绑上了，并把每个人绑在一棵大树上。由陈翰章下令，抗联战士们把锋利的刺刀插进了鬼子的心窝。那个翻译和李相文被教训了一顿，回去向他的主子报丧去了。

18、烧锅屯战斗。敦化至宁安是抗联的老游击区通道，日军为了切断它，把伪军骑兵11团调到官地以东大山、塔拉站一带驻防，充当“拦路虎”，不仅限制了抗联的活动，也直接威胁着团道沟的抗联密营。

面对这一情况，陈翰章一边率队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一边通过上层统战做伪军的工作。不到半年，就把该团3营2连连长江孚凡拉了过来，他经常给抗联提供枪支、弹药、给养和情报。渐渐的，这个骑兵团便处于半瘫痪状态了。不久日军把该团团长关文龙给撤了，换上了铁杆汉奸刘东坡。这个家伙，死皮赖脸地和抗联纠缠。

陈翰章一看时机成熟了，就和侯本先共同安排了一个巧妙的作战计划。

1939年初秋的一天，抗联与骑兵二连在烧锅屯前边的大

喊了里"打"了起来。任孝先分别派人向刘东坡和日本守备队报告。不久，刘东坡带队来到北山脚下，日军也来到了山南边。抗联战士立即向日军开火，并边打边撤。伪军从山北坡往上攻，日军从山南坡往上攻。天全黑下来了，抗联战士一阵猛打之后，撤出了战斗，伪军和日军打了起来。一直打到天亮，刘东坡才发现和日军打上了，深知闯了大祸，便扔下队伍逃跑了。事后，日军把这个骑兵团给遣散了。使敦化到宁安的抗日游击区又连成了一片。

19、寒葱岭伏击战。1939年9月，陈翰章率队在大蒲柴河一带活动。在运动中探知驻敦化的日军松岛"讨伐"队要在25日开往大蒲柴河进行"讨伐"，共有12辆汽车。陈翰章当即决定，截击松岛"讨伐"队。

9月24日晚，陈翰章把500多名战士埋伏在寒葱岭南坡公路两侧的树林中，埋伏线长达四、五里路。次日上午11点多钟，敌12辆汽车，依次进入伏击线。陈翰章一声枪响，霎时间，整个伏击线上，手榴弹、机、步枪一齐开火，除第一辆汽车接近伏击线尾部，枪一响就拚命逃跑以处，其余11辆全部被打毁。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战，消灭敌松岛"讨伐队"队长以下270多人，击毁汽车11辆，缴获轻、重机枪9挺，小炮1门，长短枪200多支，70多箱子弹，还有许多大米、白面和衣物。

20、袭击额穆警察署。1939年11月，天气已冷。抗联第三方面军指战员们的冬装尚无着落。他们得知驻守额穆的日军大部分进山"讨伐"未归，冬装还在库里。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决定，趁其城内空虚，袭击额穆警察署搞冬装。

11月5日午夜，陈翰章带队摸到额穆东门。首先打掉了

岗哨，然后冲进城里，直奔警察署。值班的警察和带班的署长，还没等清醒过来就当了俘虏。在下屋打麻将的自卫团也被活捉了。日本副署长大道重次郎被嘈杂声惊醒，爬起来往外走，被抗联战士开枪打死了。听到枪声从家里赶来的几个伪警察也都当了俘虏。

陈翰章指挥战士们打开仓库，得了一些棉军装、布匹、棉花和饼干等军用物资。临行时，放火烧毁了警察署。

21、小青顶子战斗。额穆警察署被袭击、烧毁以后，吉林省警务厅急派下西指挥官，调集吉林警校 300 多名学生和日军迟宏部队、蛟河满军邱玉部队以及额穆自卫团等几股兵力，于1939年11月 9 日早晨跟踪追击到了小青顶子。几股兵力轮番冲击，日军躲在芦苇塘里向我军阵地打炮。战斗持续到下午 3 点钟了。陈翰章知道，如果再长时间的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心急如焚地瞭望山下，寻思对策。突然，他发现芦苇塘一角被战火烧着了。于是他命战士到芦苇塘西北角去放火。不多时，火借风力，风助火威，越烧越烈，整个芦苇塘变成了浓烟滚滚的火海，日军被烧得焦头烂额，哇哇乱叫，翰章率200多名战士冲下山去，打死30多个日军官兵，俘虏了40多个伪警察，其余纷纷溃逃。

22、六棵松战斗。1939年12月，抗联一路军二方面军活动在马号附近的大森林中。他们探知六棵松伐木场驻有70多名森林警察，监督工人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的木材。二方面军的领导决定攻打六棵松伐木场。12月17日战斗打响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攻下了敌人的据点，70多个警察被全歼，缴获了 4 挺机枪和大批长短枪，弹药及粮食等物资。还有近百名伐木工人加入抗联队伍。

23、杨木桥子战斗。1940年 2 月 8 日，东北抗联一路军

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率领100多名指战员，在官地柳木桥屯群众的帮助下，在悬羊砬子密营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并有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官地警察署，以便引日军讨伐队出动。

2月12日，从敦化开来一支讨伐队，直奔悬羊砬子去了。这时，抗联战士已在悬羊砬子南面的杨木桥子沟里设好埋伏。待日军进埋伏圈，战士们一齐开火。经3个多小时的激战，120多名日本兵，除在后边押运给养的4人以外，其余全部被歼。第二天，日军再次进山讨伐，连抗联的影子也没见到。

24、袭击黄泥河子警察署。1940年3月9日夜，陈翰章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率队来到了黄泥河西南五人班屯。进屯就抓住了正在赌钱的派警尉补，然后押着他直奔黄泥河，由他叫开南门，队伍就冲进了警察署。值班的日本副署长森井，由于抗联突然进院，吓得连衣服都没顾得穿就跑出了警察署，其他伪警察和自卫团员们都当了俘虏。

抗联战士们打开仓库，得到了大批给养，只是没有胶鞋，又到街里买卖家弄了一批胶皮水袜子，叫俘虏们给背着，顺原路返回五人班。天亮后，日军调集大批人马进山搜捕，但抗联已经向牛心山密营转移了。

在二旅宣传队的回忆

王俊章

1946年2月，吉东军区警备第二旅奉命进驻敦化县。二旅为了扫清残匪，镇压日伪敌特，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宣传教育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立即组建了二旅政治部直接领导的宣传队。现将我在宣传队工作期间亲眼目睹的，并记忆犹新的几件事回忆如下：

宣传队的组建情况

我原是二旅五团四连二排排长，1945年末，经组织决定，我调到二旅干部训练队（以下简称干训队）学习。1946年春节，我们正在朝阳镇。在那里，我们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军民一同表演了踩高跷等文艺节目，我扮踩高跷的上装（即女角）。因为我当时只有21岁，对文艺有一定的爱好，那时部队里女同志相当少，况且又没有专业宣传队或文工团组织，所以，在小型的文艺活动中，我经常扮演主角，从而引起了有关组建宣传队领导人的注意。1946年2月份，干训队随旅部进驻敦化县城后的第三天，组织决定调我到宣传队当干事。宣传科的李近科长和政治部主任陈发洪一起找我谈了话，他们传达了组织的决定，并安排让我担任音乐小队长的职务，还鼓励我积极工作，协助队长把宣传队办好。

当时，宣传队队长是姜仁浩同志。宣传队开始组建时只

有几个人，成立不久就扩大到20多人，其中有李俊才、孙志凤、吕素兰3名女同志，其余都是男同志。宣传队组成3个小队，第一小队是音乐小队，由我负责；第二小队是美术队，由冷振英同志负责，第三小队是话剧队，由白凤君同志负责。宣传队人员的来源除少数是组织上有选拔调入的以外，其余大部分是从社会上招收来的，其中还有两名日本人，一个是搞美术的高桥，另一个是搞话剧的松树。由此可见，当时的宣传队员构成是相当复杂的。

宣传队的具体工作

一、张帖标语

当时，我们由县城到农村到处张贴有关《告吉东人民书》和要求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释放张学良和杨虎成将军的大幅标语。此外，绝大部份是用刷子蘸上有粘合剂的白灰粉在墙上刷写简明易懂的口号式的标语。因为这样既经济又灵活，便于更好地为中心服务。标语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以利人民群众提高对我党、我军的正确认识，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反革命伎俩。但最主要的是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和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滔天罪行，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更有力地唤起群众热爱党、热爱军队，积极拥军、拥政、参军参政的革命热情，进而壮大我军力量，有力打击敌人。

二、开展文艺活动

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新建的宣传队没有筹建资金、又没有声乐设备，仅有一把二胡和一个旧手风琴，我们是名符其实白手起家的宣传队。我们的具体活动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搞街头文艺宣传。如在街头演独幕剧《放下你

的鞭子》和歌曲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其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我们还在县评剧院演出小型话剧《抓壮丁》，并演唱了当时的新歌曲《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6年春天，我们宣传队为敦化县临时参议会的成立演出了《兄妹开荒》、《夹饺子》、《黄水谣》等节目，深受群众欢迎。当时的县委书记袁功庭和二旅有关的领导在演出后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鼓励我们好好干。另一方面就是宣传队分散到群众中去，开展教唱革命歌曲活动。当时，我们教的歌曲主要有《五月的鲜花》、《东方红》、《滦河曲》、《七枝花》等。其中《七枝花》是我们教的歌曲中较为流传的新歌，它主要反映了人民热爱拥护共产党，迫切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这首歌共七段，其中第一段是《七枝花》中的第一枝花，至今还经常在我耳边回荡……"什么花开花朝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葵花儿开花朝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

三、配合妇女会，号召群众参军参政

为充分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宣传队李俊才同志和县妇女主任胡玉珍同志共同做发动妇女工作。他们深入街道和近郊农村，向群众宣讲破除迷信，男女平等、妇女如何彻底解放等，从而提高了广大妇女的政治觉悟，使妇女会各级组织迅速扩大，涌现出女同志积极参军参政的革命热潮。

我们部分男同志则跟随政治部主任陈发洪同志深入到五团二营所在地官屯子一带，向群众宣讲当时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我解放区的阴谋，特别是结合人们恨之入骨的张永春、唐玉等匪帮被彻底消灭的事实，进一步阐述了我党的有关政策，重点强调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民是鱼水情。广大群众听了宣讲后，对我党我

军有了进一步认识，几天内就有20多人积极参军、参政。当时在官屯子住着一些日本人，其中有一个叫山本的日本青年也积极报名参了军，并被分配到五团二营机枪连当战士。

严明纪律增强群众信任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数股匪帮的反动宣传和影响，当时敦化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纪律严明程度不甚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通过我们对队伍内部出现的以下两件事情的具体处理，群众消除了疑虑，对我军增强了信任感。

当时，连队住在官屯子一带的一个日本人家里。那时的房屋设计都是对面炕，日本人为我们让出一铺炕，麻文书、卫生员和通信员在那里同住。一天夜里，麻文书（河北唐山人，因脸上有麻子，外号麻文书，名字记不清了）。兽性发作，竟然奸污了那位日本妇女。这件事的发生，不但影响了我军的声誉，而且给我军带来了很坏的政治影响，部队干部和战士个个气愤已极，群众拭目以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隔几日，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敦化当时赌博的很多，而且参加赌博的人员也较复杂。部队进驻敦化后，为加强治安，决定取缔一切非法活动。虽有约法三章，但是有些赌棍竟置若罔闻，偷着在暗地赌博。有一次，旅部保卫科侦察员徐绍忠和另外两名同志去城关区侦察，碰到一伙人正在赌博，当赌徒们发现徐绍忠等人后，其中有一人立即从窗户跳出想逃跑，被徐绍忠发现，徐以鸣枪警告，但由于心急失手，不慎正击中一名赌徒头部，当场死亡。

上述两件事情发生后，旅部领导极为重视。为挽回我军

的政治影响，严明我军纪律，旅部立即成立了由政治部主任陈发洪任庭长的临时军事法厅，在敦化县政府的南边广场召开了部队和部分人民群众参加的军民大会。会上重申了我军的纪律，宣布了麻文书和徐绍忠的罪行及处决他们二人的决定，并当场执行枪决。这两件事的处理，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军纪律的严明，从而提高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威望。

镇压敌特分子群众拍手称快

1946年4月，在敦化东郊召开了公审并处决伪满特务队长田池的大会上，会上有很多人控诉了他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无辜、迫害人民、仗势欺人、霸占奸污妇女数人的罪行，当场对这一恶霸执行了枪决，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四平战役期间，国民党反动派遭到我军的强大进攻。他们除了在战场上继续顽抗外，还用飞机窜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当时，有两架敌机夜间在敦化上空侦察，这时，几名日本人组织起了一个反动组织，趁敌机夜间来敦化侦察时，打信号弹与敌机联系，当场被我军抓获。为了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阴谋，严厉打击敌特分子的气焰，我军在敦化西郊召开了军民公判大会，对其中三名主要分子处以枪决，这次大会对敌特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次严厉的打击。

难忘的岁月

刘　棕　口述

王仁学　整理

"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举国上下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尤其是东北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抗日斗争遍及白山黑水。然而，一些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由于缺乏党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日军的政治分化、军事进攻面前，于1933年前后，纷纷瓦解，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面临严峻的形势。

为巩固、扩大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我党一方面派人深入各旧军中稳定抗日队伍，一方面通过扩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斗争。为此，中共满洲省委与各地党组织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山区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武装斗争根据地。

敦化县的大蒲柴河位于敦化、安图、桦甸三县交界地带。远离县城，山多林密，便于隐蔽，自然成了抗日活动的根据地。我就是这一时期在大蒲柴河参加抗日地下工作的。

加入共青团

我的老家住在敦化县大蒲柴河区西凤凰沟。1933年初，我在大蒲柴河叔伯姐姐家结识了两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一位姓李，另一位姓朴（朝鲜族）他们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其部队在延吉、和龙一带。他们是受部队党组织的派遣，来敦化一带搞抗日宣传和发动工作的。当时，他们对我讲了许多抗日救国道理，介

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特别说明了党的现阶段任务目标是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大地主、大资本家、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所以把镰刀、斧子作为党的标志。他们还寻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后来又动员我参加共青团。当时我才15岁，尽管道理理解不深，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我本来就仇恨日本人，听说入团就是为了打日本，我就爽快地表示愿意加入共青团。于是，他们给我一张油印的表格，并替我填好了表。李对我说："你已经是共青团员了，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志了，互相再见面，就不许提名道姓，要称同志。"并说，"今后组织上的活动，要严守秘密，不准对任何人讲。以后有事不要直接找我，你的直接联系人是朴炳洙同志，你的任务就是动员爱国青年加入共青团，发动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活动，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迎接抗日队伍的到来。"

从我加入共青团到193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大甸子河区东西凤凰沟一带，通过多方了解，先后发展了王洪弓、侯奶子（是外号、名不详）李胜春、尹凤云、崔凤兰等10余名知根知底的爱国青年加入共青团，并在李京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后来，随着大甸子河区党组织的发展，又划分成三片，河北片由我负责，直接与卢炳斗和朴炳洙联系。南片由林杨久负责。这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送路过的部队首长和同志；继续发展团组织，散发传单、张贴漫画，宣传抗日。

卢炳斗叛变引起的事端

1935年2月的一天，我从山上拉柴回来，发现我家门前围了一些警察和便衣队。我想跑，但已经来不及了。两个

警察已向我走来，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模大样地向家走来，迎面来的两个警察，也随我一起进了我家院。这时，我发现卢炳斗正站在我们院里，我不由一楞，心想这下坏了，他可能是叛变了，我刚想向他喊话，试探他一下，可警察上前把我挡住，没让我与他说话。可我清楚的看到卢点了一下头，警察立即把我抓到牛棚里。进了牛棚，我才知道由于卢炳斗的叛变，我的妻子翟凤兰和王洪斗，还有位路过的抗联交通员都已被捕。

带队来抓我们的是一个外号人称“二鬼子”的警务系主任兼队长李道善（朝鲜人），他带着一脸横肉、凶狠狠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漫不经心地答道“叫刘万祺”，他闪动一下狡猾的三角眼，接着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严肃地回他一句“是中国人”。这下可把他惹火了，他不容分说，顺手操起镐把，向我头部就是一下子。当时，我被打晕倒在地上，他们看从我嘴里一时问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便把我家屋里东西翻了个底朝上，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后来，在院子粮仓和草房下面找到了我还没散发完的传单和漫画。李道善气极败坏地冲我喊到：“这就是你的罪证！今天要抓的就是你刘万祺和你老婆翟凤兰，还有河南的林杨久。”当警察去抓林杨久时，林已获息跑了。于是，李道善又带人到青沟子把万老五、万老六等人抓来，一起把我们带到安图。我和王洪斗被押在警察大队的拘留所里、翟凤兰被关押在安图县警察局。

我被捕后，只知道卢炳斗叛变了，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卢炳斗和他的弟弟在部队里犯了错误，组织上决定处分他，他狗急跳墙，跑到安图警察局告了密，供出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结果，大甸柴河地下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

坏，许多人先后被捕。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被关押的五个月里，正赶上安图的日本指导官调入，李道善因逮捕地下抗日人员“有功”，被提升为炮兵中队队长。新上任的日本指导官和一个姓余的警务系主任从没提审过我。有一天，他俩到监房检查工作，看我们几个头发三、四寸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就问警察：“他们都是什么人？”警察回答说：“都是嫌疑犯。”那位日本指导官一听说是嫌疑犯，便说：“统统地放了”，就这样，结束了我五个月的囚徒生活。

在我被关押的五个月里，有的人被提审过一、两次。有的干脆没有提，翟凤兰被提审一次，而且挨过打，但她一口咬定与抗日联军没有任何来往。她怕我被提审时，被敌人诈出什么情况，还偷偷托一位爱国青年警察捎信告诉我说她什么也没承认，并暗示我，敌人可能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要承认。这样，敌人没有抓到一点破绽，这也许是我们被释放的主要缘故吧。

重新找到了组织

1935年9月份，我被释放回家后。日本宪兵和警察特务，经常在我家附近监视。为了避开敌人，我不得不东躲西藏。我妻子也同样漂泊在外。由于组织遭到破坏，联系人断线，加上日军采取集家并屯政策，将分散在深山沟的住房放火烧掉，强迫集中到所谓的“集团部落”内居住。当时，我家的房子也被烧掉，不得不搬到大蒲柴河区镜沟屯租了点地种，暂时维持生活。

不久，日军抓民伕修筑镜岔子至寒葱岭的公路。为了打听抗联消息，我也报名参加了筑路。一天，队长派我回去取粮，

在组长展元山家里遇上了抗联派来的人，听他说他们的部队就住在南山，团长叫李宽，这正是我日夜想找的领导。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跟他上南山到团部见到了李宽。他一见是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你可来了！"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呆了半天，我才想起问候领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询问我被捕和释放后的情况，我如实地汇报了几个月的遭遇。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斗争情况，讲述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与各地游击队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经过。听了介绍，我非常兴奋，便主动向他提出要求随部队一起走。李宽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你暂时还不能随部队走，要留下来继续作地下工作。我希望你安下心来，努力工作，特别要做好青年人的工作，重新建起共青团组织。你的直接联系人仍是朴炳洙同志，到时候他会来找你的。"我愉快地点头答应了。

这期间，日军获悉东北抗日联军组编的消息，便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推行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抗日队伍，割断人民同抗联的联系，企图把抗联困死在深山老林之中。另一方面，集中一切兵力对抗联进行大"讨伐"。事与愿违，敌人越是疯狂围剿和镇压，抗日的烈火燃烧的越旺，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前面提过的李道善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抗联抓获处决的。

为了断绝人民群众同抗日联军的来往，日伪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伪协和会，宣传"日满亲善"、"日满协和"进行分化离间。一方面归并村屯，推行集家并屯政策，严格加以控制，到处成立自卫团，强把青年人编入自卫团，进行武士道训练，让团丁在村口交通要道站岗放哨。为了摆脱敌人的控制，我于1938年3月，利用站岗的机会，偷偷离开了大蒲柴河，逃

到东北岔锑矿去当了苦工。

入党前后

1939年初，我在东北岔锑矿当苦工时，东北抗联一支部队由桦甸来敦化，攻占了大蒲柴河小街及周围的一些村庄。吓得矿上的日本人和把头都吓跑了，我们工友也都各自回家了。我到家一看，还是老样子，村里的青年人，连我哥哥还都被迫在自卫团里。我要想站住脚，留在村里继续作地下工作，就必须利用自卫团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我不得不想法再次加入自卫团。但由于后期对加入自卫团的人，审查严格，特别是对与抗联有关连的人控制更加严格。我就以我哥哥的名义顶替了他在自卫团的差事。

记得是在这年三月份，一天，抗联部队的林杨久副官，托交通员王振清，捎信叫我去一趟。林杨久是在我被捕的那天晚上跑上山，参加了抗日联军。他到部队很快就被提升为副官，但仍负责地下工作。当天夜里王振清带我上山，见到了林副官。我向他汇报了被捕和释放以及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并再次要求参加抗联。他听了很高兴，并耐心地劝我不要老是要求来部队，要安心留在地方，利用自卫团公开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地下活动。接着他小声地对我说："我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回去以后，设法搞一点手枪子弹。"我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首长没有子弹了。这可是件大事。我下山后，立即动手搞到七十发手枪子弹，亲自上山交给了林副官。后来，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杨靖宇将军收到你送去的子弹非常高兴，还特意让我告诉你，以后有机会他想见一见你。我听了以后，心里感到格外激动。一股暖流涌上心口。

1939年7月29日，林副官托人捎信，让我到腰岔子去开

会。当时，我以为又有什么新任务交给我办，我急匆匆地离开家来到了規给了开会的地方。来到这，我一看人不多。除了林副官、邢连春、王振清外，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场。他们都热情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林副官指着那位我不认识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李指导员，刚从关内调来不久，是上级派到我们部队作政治工作的"。李指导员亲切地和我握了手，笑着说："祝贺你。"我听了很纳闷儿，祝贺我什么呢？

议开始后，李指导员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全国抗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抗联部队主动出击，英勇作战，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但今后对敌斗争仍是长期的，艰苦的。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整编，决定以南满、东满和北满三个抗日地区协同作战。"会上还传达一路军各方面负责人会议精神。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杨静宇将军率领的军部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和一方面军主要在桦甸、濛江、通化、集安一带活动。由魏拯民、陈翰章指挥的三方面军坚持在敦化、安图、宁安南部等地活动。二方面军主要在长白、抚松、安图等地开展斗争。各方面军都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还要办学校、出报纸、整军练武、深入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新高潮。最后他严肃、认真地说："我们要积极响应号召，回去要认真作好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李指导员讲完话，林副官便走到我面前，高兴地向我伸出手说，"是要祝贺你，今天开会的另一项内容是要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举行入党仪式"接着李指导员对我说："根据你的表现，经组织上批准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你是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没有候补期，从今天起你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入党宣誓后林副官嘱咐我说："今后，我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人，邢建春、王振清是你的联系人。回去以后，要团结青年，依靠群众，动员一切抗日力量为抗联提供必要的物资，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无论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时刻准备为人民事业献身。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斗争必胜的决心。

大约是在我入党三个月后的一天，听到了林副官牺牲的消息。据说他是与一位同志外出工作，返回营地走到腰岔子东北时，迎面来了两个抗联战士。林副官以为他们也是外出工作的，就主动迎上去打招呼。原来这是从部队偷偷跑出来的两个叛逃者，他们以为林副官是来抓他们的，抢先开了枪，结果，林杨久同志当场就牺牲了，邢连春同志也负了重伤。

林副官牺牲后，他的部下张永春带领的一支游击队，活动在这一带。因为日军频繁地围剿，游击队的给养更加困难。特别是弹药来源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弹药供应困难，我们经常按上级指示，设法把子弹送到游击队去。一次，领导指示，要我们给张永春游击队搞一千发子弹送去。当时，由于敌人控制很严，搞子弹是最困难的任务，但我们看到部队急需，就不顾危险，分头活动，很快就凑齐了一千发子弹分批送上山。

不久，张永春又捎信让我再搞130发子弹，直接交给中医郭文元。郭大夫是大蒲柴河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又是一名爱国心很强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利用外出治病机会，悄悄地溜上山给游击队员看病。有时，顺便也给游击队带去些子弹。这次我搞到的130发子弹，就是事先已经安排好，让

他送上去。他送这130发子弹时，有一个外号叫张麻子的队员在场。后来张麻子叛变了，向敦化警察署告发了郭文元给游击队送子弹事儿，于是特务就开始跟踪郭大夫。

一天，郭大夫家里杀了一头猪，让我利用自卫队员活动机会，把猪肉送给游击队。猪肉是送到了，可郭家杀猪的事已被特务发觉，当天晚上到他家又没查到猪肉，就怀疑他把猪肉送给游击队了，并以此为由，逮捕了郭文元。郭被捕后，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供出了送猪肉，送子弹的事儿，并交待了是我交给他的子弹。事后，他怕抓我，又设法及时捎信，让我赶快跑。我接到信儿，马上跑到镜沟山呆了两宿。当时，山上没有人家，荒山野岭，寒气逼人，又饥又喝，实在难熬。一时又找不到游击队，索性，我就下山跑到黄松甸子给一个姓李的工头，从河里打捞木棒子，以求暂时隐身。

我从家里逃走后，差不多每天都有特务到我家搜查要人。后来他们看实在抓不到我，就放了一把火把我们房舍给烧光了。哥哥回家一看房子烧光了就带着可怜的老母亲，投奔到敦化镇西碗铺屯的亲属家去住。

为了寻找游击队，躲避特务，这年冬天，我又从黄松甸子辗转到沙河掌林场给大把头周范吉干活，后来，不知是怎么走漏了消息，特务把我从这里抓回敦化，关押到敦化第一警察署。后来，在审讯我时得知，谭佩凤、台喜清也与我同一时间被捕。至于是什么原因，谁告的密，始终是个谜。

狱中生活

被捕后，我被押进敦化第一警察署，第一次给我过堂的是一个姓曹的警尉和一个日本宪兵队长。他们问我：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领导人是谁？和谁联系，怎样联系等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一见我嘴硬，便下了毒手，各种酷刑全都用遍了，弄得我死去活来，可我还是说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他们一连过了我三次堂。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们一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名堂。索性也就不再提审我了。

大约过了十几天，一个警察偷偷告诉我说：“明天，可能还要过你的堂。他们从郭文元嘴里得到了关于你托郭把30发子弹送到游击队的事。你就承认了吧！免得再吃皮肉之苦。我一听只有30发。第二天审讯我时，我就承认了30发，别的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一看，没办法，只好把张永春找来和我对质。张永春是在游击队弹尽粮绝、队长又扣押了他一家老小情况下投降的。他被带上来，还没等我来得及说话，宪兵队长抢先问张：“你认识这个人吗？”张看了看我说：“认识，我们在自卫团里一起共过事。”队长接着问：“他叫什么名字”？张答：“叫刘万金”（我第一次被捕释放后改名叫刘万金）日本人又问：“刘万金给你送过几次子弹？我抢着说：“一次30发”宪兵队长气急败坏地给了我一个嘴巴，骂道“巴嘎牙路！问他的，你的不要说。”接着他恶狠狠地问我：“你的说，枪的送多少”我说：“除了30发子弹。别的什么也没送。”敌人看再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我们押下去。

后来，从长春来了一个检察官，又把我们审了一遍。然后，把我、刘发、于长深和郭文元4个人一起押送到长春新京高等法院。后来听说我们4人被押走后，其余与张案有关的五、六十人，包括大蒲柴河区警察署长常振帮都被释放了。

到了新京高等法院后，我们4个都被列入“国事犯”，交给涉外厅管。负责审讯我们的都是日本人，翻译也都不熟悉我们。手头材料也不过是从敦化带来那点材料。所以，一到这里，我们都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并说在敦化的口供都是屈打成招。我不仅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了给游击队送过子弹。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他们还是根据敦化的材料，按政治犯分别给我们定了罪。我和郭文元都判处十年徒刑，于长深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判刑后，我不但没有悲伤，相反，倒松了一口气，心也落了底。我想，敌人虽然判了我刑，可没有搞到一点党组织的情况。我虽然肉体上受尽了折磨，吃了不少苦头，但却用自身的痛苦保护了组织，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为此，我感到欣慰。

就这样，从1939年10月，我开始了“新京模范监狱”里的苦役生涯。开始，我被分配到监狱缝纫机厂干活，早晨六点钟起床，七点就得到工厂干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冬天，顶着星星去，借着月亮归。夏天午间又困又乏，也不让休息。就是这样干，还是因常常完不成定额任务挨打、受骂、体罚。一些黑心的看守，还常常向犯人索要钱、物。犯人生活真苦哇，吃饭也要分等级，在工厂干活的供饭量最多，算是一等，每天早饭2两高粱饭团，加上几条碱菜。中午、晚上各3两高粱米饭团，外加1碗虾米糠冲成的菜汤。周五改善生活也不过是在汤里放几块指头大小的豆腐。

住的更不用提，屋子里挤的满满的，夏天喘不过气，冬天没有棉衣，晚上没有被盖睡不着觉。特别是象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只好挨冻受冻。我的手脚都生了冻疮，腿也作下了毛病。由于吃不饱，穿不暖，加上精神上受折磨，我得了

浮肿病，两只眼睛肿的睁不开，腿肿的和腰一样粗，用指头一按一个坑。因为生病，我离开了工厂，被送进了病号监。在这里每顿只给2两饭团、两条咸菜，勉强维持活命。我依仗年轻，每天晒太阳，尽量少喝水，渐渐地病开始好转了。郭文元几个人因年老体弱，经不起折磨，都先后死在狱中。

1940年5月，我母亲来长春探监，母子相见只是流泪，说不出话来。母亲走前对我说："你媳妇这两年一直住在娘家。"我听了很伤心。我们是结发夫妻，曾患难与共，今日离散，除了归罪日本侵略者，还能怪谁呢？于是，我对母亲说："我什么时候出狱，是死是活还很难说，就让她自便吧！"母亲回去向她转达了我的意思，两个月后她就改嫁了。世事无情人有情。我完全理解我的前妻的苦衷。

1940年5月，我的病情明显好转。7月份，营口监狱从长春监狱要一批10年以下徒刑的年轻犯人，到营口监狱石道具工厂当苦工。我当时被选中，转到那里。在那里我又结识了一些新难友。这些人大都是爱国青年，被列为政治犯判刑后投放在这里做苦工。因为我和他们相处的很好，所以在一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大家互相关照，度过了难熬的监狱生活。直到1945年8月18日营口解放，我才获得自由。回到阔别6年的家乡。

1946年2月，我以党的地下工作者身份参加了敦化县政府举办的短训班。学习结束后，县政府方秘书长找我谈话，进一步了解我过去地下工作及被捕情况。然后，组织上分配我到敦化县城东区任区长，我听从组织上的决定，高兴地赴任，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艰难的历程 可悲的结局

——忆我在“抗联”的战斗生活

于　伦　口述
刘志来　整理

参加抗日联军

我是沙河沿乡东沟村人，我家算是那里的一个老户了。1935年，我们村来了日军守备队的一个班。那年，只有15岁的我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不得已到守备队打杂。后来，我随守备队到敦化学手艺。学完手艺，正赶上旧历年，我就离开县城回家了。半道上，我的脚后跟冻坏了，走的很慢，到了驼腰子走累了，便停下来休息。这时，突然从屯里闯出一伙手持武器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报号为“青年军”的队伍。他们看我身上穿着日军服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抓去了。于是我只得跟着他们到高丽帽子，又经大小榆树川，往南走到了大小荒沟。大小荒沟有个叫“迷魂阵”的地方，他们后来把我带到那儿过了一冬。

第二年春天，日军进山“大讨伐”。这次出动的敌人很多，“青年军”无力对抗，就投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军军长是王德泰，政委是魏拯民。我被编入第一团，团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将军崔贤。不久，我调到第二团，当了政委吕伯歧的传令兵。一天，吕政委和刘副官带领

我们个15人（7个女的，8个男的），到四道沟去接应一支投诚抗日的伪军队伍。四道沟驻着一个连的伪军，伪军连里有一些反满反日的爱国士兵，想参加抗日部队，与第二团取得了联系，我们就是来接他们的。吕政委把我们带到四道沟口先隐蔽下来，然后派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到了约定时间，由一个班长带着7名伪军士兵，悄悄离开了营房。不料，他们刚出来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朝他开枪，我们也向敌人开火，经过一阵激烈的枪战，我们带着这7名伪军士兵，安全转移，经过城南回到了部队营地。

抚松战斗

1936年，王德泰军长率主力活动在长白、抚松等地。为了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分散敌人的注意目标，二军军部决定向西进军。一、二、六师在二军军部指挥下，各部队活跃在长白山西麓的广大地区，到处袭击敌人。或在公路要道设伏，或进攻村镇、据点以至县城，取得了很大战果，为了更有力地配合一军的西征，王德泰军长率领部队到达了抚松县的松树镇。我们刚安定下来，一支日军讨伐队就追到这里。日军的队形一般行军是前面派出尖兵，带军犬，后面隔了一段距离才是大队人马。我们按照王军长的部署，迎头痛击敌人，先把军犬和尖兵都打死，然后集中所有火力，对准日军大队一齐开了火。这一仗，我们打死了日军士兵20多人，趁敌人慌乱之机，部队及时撤离了松树镇。敌人恼羞成怒，进行残无人道的报复，把当地老百姓杀死了不少。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者，扩大我军声威，魏拯民、王德泰等抗联二军的将领，与抚松境内活动的抗日义勇军领

导人礁商，决定集中兵力攻打抚松县城。

接到攻打抚松县城的作战命令后，部队就开始了急行军。敦化到抚松有400多里路，我们在行军路上并不顺利，打了好几仗才到了战前集结地。在一次战斗中，还缴了敌人一挺重机枪。

抚松县城是日寇在长白山西部山区的一个统治中心，也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地。这里驻守日军200余人、伪军一个营和警察队。经过侦察，我军获悉敌人戒备并不严。军部决定，在做好战前准备后，发动突然袭击。8月17日，攻打抚松县城的战斗开始了。以二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六师一部、二师一部为主力，联合抗日义勇军1000余人，分五路发动了进攻。敌人仓促应战，处于惊慌失措的被动地位。六师指战员猛打猛冲，一举攻占了城东南制高点，如乘胜前进，完全可能占领全城。可是由于抗日义勇军士兵作战不够勇敢，派到城里内应的义勇军小分队有些退缩，战斗进程显然缓慢下来了。守城之敌似乎看破了这种情况，凭借工事顽抗，以待援军。部队打了一天一夜，没能攻进抚松县城，但歼敌200多人，缴获了大批弹药。

部队撤出抚松后，又转辗活动两个多月。已经是初冬了，指战员们还穿着夏天的单装，急需换棉衣。于是，我们为了设法解决冬装问题，开到了辉南县三道阳岔子。那里驻着一个加强连（约有一个半连兵力）的伪军，看守一个军需库。摸清情况后，部队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一举消灭了全部伪军，缴获了军需库里所有物品。大部分抗联战士都穿上了伪军的冬装。

小汤河战斗

1936年11月，二军先头部队转移到抚松县小汤河。那时，崔贤已升任第一师师长，军长王德泰率领的主力部队，还没有赶到小汤河。部队在小汤河驻了3天，派出小分队侦察了周围的敌情。经过侦察获悉，离小汤河18里地的松树镇里，驻着伪军骑兵团600多人，他们准备第二天凌晨攻打我们宿营的小汤河。我军在小汤河的兵力只有300多人，部队首长鉴于寡不敌众的形势，决定立即转移。这时恰好王德泰军长率领部队赶到小汤河。王军长听了敌情报告，沉思了一阵，果断决定狠狠打击敌人。

第二天拂晓，伪军骑兵团600多人果然偷袭小汤河。他们虽然是骑兵，但因山沟里骑马不便，都是徒步走来的。敌人依仗兵力多、火力强，抢占阎王鼻子山头，从那个制高点，向我军疯狂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德泰和其余首长都从容不迫，沉着指挥应战。王军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就勇往直前向敌人占领的山头冲了上去。我们连冲在最前面，因为大家的着装全是伪军的棉衣，敌人起初以为是自己人，没有开枪。趁这个机会，我们拚命往上冲，直到离山头10多米，敌人才发觉不对劲，向我们开了枪。我们连遭到敌人的集中火力射击，伤亡很大。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大家毫不畏惧，利用有利地形地物，向敌人还击着，朝山头爬上去。弹药手在协助机枪手向敌人开枪时，不小心手摸在滚烫的枪筒上，顿时烙掉一层皮，但他强忍着剧痛，毅然坚持战斗。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交火，我们终于冲到山头上。但是，敌人没有退下去，他们仗着人多，疯狂反扑过来想把我们压下去，我们连的处境十分危急。这时，后续部队冲上来，占领了山头的这一面，敌人才退到了另一面。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还没有结束。

事情很凑巧，我们开始同敌人交火的时候，首长派一个排10多名战士，负责往沟里送给养，以备部队撤退时充饥。他们把给养送到指定地点赶回来时，正遇上准备抄我们后路的敌人一个连的兵力，便匆忙占领有利地形，仓促间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连的敌人冷不防遭到伏击，被打得朦头转向，退了回去。

下午4点多钟，王德泰指挥部队顶住敌人正面进攻的同时，让崔贤率领一师的部分兵力，从小汤河西面的草爬子迂回到敌人背后痛击敌人。敌人遭到两面夹击，伤亡惨重，终于支持不住，不得不向南败退。部队趁势把敌人撵到一块苞米地追歼，打死了100多人。我们继续追赶残敌，一直追到离松树镇7、8里的地方，才奉命返回来，胜利结束了这次战斗。

打完了仗，我们才想起一天没吃饭，突然觉得又饿又渴，十分疲倦。打扫战场时，我们翻敌人死尸的挎包，找到了一些食物，一个敌人挎包里有四盒压缩饼干，我们就边打扫战场边吃，感到那是世上最好的食品，美味无穷。这次战斗，我军以少胜多，歼敌150多人，缴获2挺轻机枪，50余支步枪。

不幸的是，王德泰军长在打扫战场接近尾声时，中弹牺牲了。事情是这样的。在山上一个倒木里，有7个被打伤的伪军士兵还在顽抗，王德泰带领战士往前冲时，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当即倒了下去。战士们见全军敬爱的王军长倒在血泊中，都怒火万丈，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齐射出复仇的弹雨，把这7个负隅顽抗的伪军士兵，全打死了。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军长王德泰的牺牲，给二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王德泰牺牲后，部队在政委魏拯民的率领下，继

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抗联第一路军的编成

1935年，活动在东满和南满地区的抗日部队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3个师，第二军4个师，共7个师。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一、二、三师师长分别为程斌、曹国安、王仁斋。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先后有李学忠、全光担任，扩编后，第一师师长崔贤、政委周树东，第二师师长陈翰章。政委王润成，第五师师长周旭东、政委朴德范，第六师师长金××、政委吕伯岐。

1937年初，一、二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副总司令魏拯民（明胜），总兵力约15500人。后来，抗联第一路军的一、二军改编成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

1938年5月，魏拯民率领的部队，在集安县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所部胜利会师。这年7月，由杨靖宇和魏拯民主持，在集安老岭召开了东南满党代表及第一路军高级干部第二次会议。会议开始时获悉，第一路军一师师长程斌，于6月间在本溪附近投敌。会议分析和研究对敌斗争形势，一致认为必须加强统一。会议决定第一路军所属各军改编为三个方面军，并设总部和警卫旅。

会后，首先将第一军一师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和警卫旅，曹亚范任第一方面军指挥，伊俊山任政治部主任，尹夏泰任参谋长，宋茂璇任组织科长。全军约250人。同年12月，二军六师改编为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由六师师长金××任指挥，吕伯岐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7月，二军四师和五师李

命到安图县两江口附近的汉窑沟一带集中。8月上旬，魏拯民在这里主持召开一次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代表一路军总部宣布，将二军五师六师合编成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指挥，侯国忠任副指挥。

部队整编后，第三方面军继续在东满活动，第一方面军在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的率领下，留一部分人暂时在集安县坚持斗争，以分散敌人注意力，主力则开始向金川、蒙江山区转移。

少年铁血队的战斗生活

1938年8月，部队转移到桓仁一带。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丹东方面的一支伪军打了一仗。开战时，敌我双方各自占领一个山头，互相正面开火，对峙了短暂的时间。我们占的山头树大林密，宜于隐蔽，射界又好。而敌人占的山包全是矮树，只有一小片高树林。我们靠这个有利地形，猛打猛冲，很快打破了僵局，敌人逼到那一小片高树林里。这时，我们与敌人相距很近，连敌人的说话声都能听得到，一个伪军军官正在一个劲地骂士兵。我没注意到敌人还有一挺轻机枪，站在山岗上对着伪军喊话，叫他们投降，不料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左臂，流血很多。晚上撤退时，部队派两个朝鲜族妇女护理我，继续朝指定地点转移。

部队行军至八宝沟时，发现敌搜索旅骑兵42团和步兵32团一部约300余人，从集安县城追来。司令部决定狠揍这股敌人，1938年8月2日，我军按事先确定的战斗部署，埋伏在长岗公路两侧，动员当地群众巧妙配合，将敌人引入伏击圈。这股敌人突然遭到我军伏击，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前

后逃跑。抗联战士就如猛虎下山冲下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使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我军缴获了敌人一部分外上刺刀的马枪，全是新的。

长岗战斗后，我们随司令部转移到集安县六道岔。部队休整时，一路军首长研究决定，从各团各连抽出一些精明能干的青少年战士，成立一支"少年铁血队"，用缴获的"三·八式"小马枪，装备这支年轻的队伍。少年铁血队设3个班，都是16岁上下的"小抗联"，约50余人。队长高玉信，指导员王传圣。"少年铁血队"的任务主要是跟随司令部活动，而一路军总部组建这个队伍的用意，则是让"少年铁血队"战士，更好地经受战火考验与锻炼，迅速成长，为抗联部队培养后备干部。

我在"少年铁血队"里当一班长，二班长叫张宝盖（朝鲜族），三班长姓李，名字记不清了。"少年铁血队"同时也是杨靖宇的警卫队，宿营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就设在杨司令帐篷的附近。我们给杨司令站岗，经常与他接触，杨靖宇身边有个特卫排，全是匣子枪。行军的时候，杨靖宇常常在少年铁血队中间走，我们就在前后掩护。

1938年冬，日寇大批出动"讨伐"队，追击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程斌叛变以后，给抗联部队的作战行动带来了很大威胁。他熟悉抗联的活动规律，领着敌人到处搜山。所以，这年冬天，我们不能在一处久留，几乎天天行军、打仗，熬过了艰难的几个月。

1939年初，杨靖宇率警卫旅及少年铁血队约300人的一支队伍，向大蒲柴河方向移动。大蒲柴河处于通往桦甸、抚松和安图的要道上，这里有警察署和一个军需仓库，驻有伪军一个营。杨靖宇决定攻打大蒲柴河。按照杨司令出发前提

出的要求，我们在行军路上非常谨慎，专找山间小路走，白天行军则拉开距离，互相隔开米远，以免发生意外。途中，经过一处密林时，突然一只黑熊从队伍中间穿了过去。战士们说："黑瞎子横穿队伍，是不祥之兆。"这迷信说法并没有灵验，因为这次我们打了胜仗。4月7日晚，我军出其不意地攻入大蒲柴河镇内，集中火力攻下警察署，活捉了警察署长常振邦。伪军听到枪声不敢轻易出动，以为我军一定要向他们猛攻，死守着营房。我们攻下警察署，迅速打开军需仓库，运走武器，装备和粮食等物品，放火烧了军需仓库之后，便迅速撤出了大蒲柴河。这次战斗，击毙日本人警尉滕田一夫以下5名日本警官和10余名伪警察，俘虏2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4月下旬，我军又袭击敦化县滚柴河据点，获得了一批武器和粮食。然后，我们来到林中营地，搭起了帐篷，住了下来。部队在那里举行了庆功活动。战士们兴高彩烈地用松树杆搭起了台子，开了庆功会，演出了节目，痛痛快快地休息了3天。敌人虽然知道我们在那里，但没敢来袭扰。我们也增设了岗哨，加强了警戒。接着，部队又转移到桦甸境内，开展了新的作战活动。

粉碎敌人的"篦梳踩踏"战术

1939年秋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联军进行了更为疯狂的"围剿"。敌人对抗联部队活动的地区，实行封锁政策，对深山沟里的散居户则实行"集家并屯"政策，把人们集中起来，每个大的"集团部落"都派兵把守，严加控制粮食和军用物资，然后实行分区定点"讨伐"，采取"篦梳战术"和"踩踏战术"，步步逼近，一块一块地洗劫一空，捣毁抗联密营，企图彻底消灭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各抗联部队一度断绝了粮食来源，陷于极端严重的困境。部队缺少给养，想吃饭就得打仗。有时，我们一连饿几天，打了一个屯子，才背出一些苞米，清水煮着吃，领队里各种日用必需品极缺，生活也极为艰苦。帐篷的白布，是用熬成的桦树皮水染成黄色的，没有锅就用唐瓷盆代替。我们在二道沟弄到一些白面，想吃顿面食，却找不到家什，没办法只好用树茬子当面板，把面和起来弄成一个个疙瘩，再用手拍成薄饼，而后清水一煮就成了水拉面，大家都津津有味吃着，称赞这是世上少有的一顿美餐。抗联的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但指战员们却没叫一声苦，密营里整天充满欢声笑语。

1939年末，部队从四道沟转移到桦甸老金厂，不久又从老金厂转移到那儿轰，那儿轰是个木材集散场，这里驻有伪军高春部队1000余人，而抗联部队仅有150多人。我们在那儿轰附近安营之后，就用电话探听了敌人的活动情况。那种办法是极简单的，先把电话线顶头一段剥掉外层皮，系上一块小石头，人站在电话线杆底下，把线往上一扔，小石头就搭在电话线上，线路通了。我们用这种办法探听到敌人行动情报。当我们获悉敌人准备回桦甸县的消息后，杨靖宇决定打伏击战。于是，部队在公路两旁选好伏击地点埋伏下来，指挥部设在山头一个有利地形上，我们埋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伪军高春部队出现了。敌人很狡猾，兵分两队行军，先头部队已到山顶，后来部队还在山脚下，还有一个约120多人的尖兵连在前头开路，探明虚实。当敌人尖兵连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时，指挥部发现后面有伪军大部队分两批跟着，一眼望不到头，便命令我们不要打了。这时，有的伪军士兵渴了，到河沟里来喝水，我们正好埋伏在河沟旁边，不得已与

伪军尖兵连接了火。指挥部还没有下命令，我们就给敌人来一阵密集的弹雨，冲过去把这一个连的尖兵全部缴械了。我们押着俘虏，迅速离开公路上了山，战斗只进行了5、6分钟，等敌人大部队到时，已经望尘莫及了。

战斗结束了，部队撤到太平沟附近。太平沟有个警察署，那里的伪警察经常带着特务和武装自卫团到山上袭击抗日军民，干了许多坏事。杨靖宇将军同总部首长分析了敌情之后，决定消灭这伙敌人。他想出一条捣毁虎穴之计，派出一支小分队，出其不意地袭击太平沟警察署。杨司令派出的这支小分队，就是我们少年铁血队，我们接受这个打先锋的战斗任务后，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扛锄头，装扮成干完活回家的庄稼人，分三伙进了太平沟。按照战斗部署，我们少年铁血队出发，大部队也紧跟着行动，接应我们战斗。我们20多人腰里都藏着手枪，朝着既定目标，直奔警察署。这时，警察们刚刚执行任务回来，有的洗澡、有的洗脸。我们到了警察署门口，站岗的敌人才发现不对劲，就把子弹推上了膛，把枪端了起来。几乎同时，我们也赶到了敌人岗哨跟前，队长高玉信想拿枪却拿不出来了，我一看情况危急，就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起一脚把哨兵的枪踢了下来。我们一枪不发，拿下了岗哨，完全控制了门口。紧接着大部队冲进警察署院内，敌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完全按照杨司令定下的计谋打得干净利落，一举捣毁了太平沟警察署，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第二天，部队就撤走了。

太平沟战斗后，敌人往这一带出动大批“讨伐”部队，标各种旗号的敌军越来越集中，屯屯都驻着敌人的军队，企图一举歼灭抗日联军。为了避开敌人主力，四处牵制敌人，

杨靖宇命令我部队开往桦甸。那时候，桦甸境内，古木参天的森林多，抗联部队便于隐蔽和活动，是很理想的抗日武装斗争根据地。我们接到命令后，就向桦甸进发，白天敌人的飞机跟踪我们，只好在夜间行军。一路上，敌人的两架飞机轮番飞到我们头顶盘旋，不停地搜索监视，发现目标就俯冲下来扔炸弹。敌人一架飞机只带4颗炸弹，炸弹投完了就用机枪扫射，子弹打完了就飞回去取炸弹和子弹，只需10多分钟又重新飞回来了。我们只好隐蔽在森林里，与敌机捉迷藏。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到达了预定的宿营地。从此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各种部队在异常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了抗日武装斗争。战斗频繁，伤亡惨重，部队又不得不经常转移，人员和给养都得不到及时补充，困难越来越多。

在一次战斗中，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那年他才19岁）双腿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撤退时，我们背着他走。部队断粮已经几天了，剩下的唯一食物就是黄豆，大家都非常珍惜，用树皮水染黄的白花旗布背兜背着，不肯轻易吃。那天，我们一天没吃上什么东西，战士们走着走着，再也迈不动步了，便停下来拢点火用盆炒黄豆吃。不料，一架敌机突然飞来投弹，盆子被炸翻了，我们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走了一段路，王传圣不肯再让人背着他走，一再要求把他留下。他恳切地说："我是累赘，你们背着我影响部队行动，还是让我留在这吧！"我作不了主，就向杨司令汇报了。杨司令脸上显出沉重的表情，久久不说话，过了好一阵他才说："也只好这样了！"随即嘱咐我带两名战士把王传圣放在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藏好，过两天把敌人甩掉以后再来接他回去。我们找到一个石塘子，在一块板正的大石头上铺好毯子，把王传圣放在上面，再用树枝严严实实地遮盖

好。临别，王传圣掏出一只钢笔递给了我说："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我双手接过钢笔，心里说不出有多难过，只是深情地凝望着他，久久没有说上一句话。他又对我说："我有个要求"，我这才马上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他说："你把枪留下来，再多留一些子弹，如果敌人发现了我，我就多打死几个！"我爽快地答应着，给他留了一支枪，又把我们三人的子弹都放在他身边，揩着眼泪，跟他告别了。赶上部队后，我向杨司令汇报了这一情况，他点头说："你做得对！"当我们再走出6、7里地时，突然从后面传来一阵枪响，大家都以为王传圣牺牲了，心里非常难过。一直到十年动乱期间我才知道他那天并没有死。敌人朝他打枪但没有打中，他被俘虏后敌人给他治好了伤。

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少年铁血队伤亡很大，队长高玉信也牺牲了。在一次战斗中少年铁血队就牺牲7个人，班长只剩下我一个，上级任命我当了少年铁血队队长。后来，少年铁血队与特卫排合并在一起。有一天夜行军，趟了三条河，过了最后一条河天就放亮了，我们往山上走，不一会儿，一架敌机飞临，围绕我们正在爬的那个山头盘旋，他们没有扔炸弹，而是撒下不少传单。这时已经到了冬天，我走在前头，为部队趟雪，地上的雪很深，我累了一身汗。给杨靖宇当警卫员的"小牛倌"见我气喘吁吁，就赶紧走几步，赶上来对我说："你累了，歇一会，我在前面趟雪蹚子"。我点着头停了下来，身体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看着"小牛倌"往前趟了10多步。这时，敌人的一架飞机又突然飞到我们上空，随后扔下一颗炸弹，我赶忙叫小牛倌往树跟前跑，还没等他跑到，炸弹就爆炸了。小牛倌一声不吭倒了下去，他身上炸了很多

眼，头也炸坏了。我们把他身上背的钱袋卸了下来，掩埋了遗体，部队继续往辉南县四道河子转移，准备到那里去搞给养，换些冬季穿的衣服。

到了四道河子，我们先把伪村长抓起来，交给少年铁血队看守。晚上，我们把伪村长放在帐篷里，派哨兵轮流看守。我们的帐篷很简陋，先立两根木头，在每根木头后侧，各系两根绳子拽着，中间放一横杆把布一搭，四边用石头压上就行了。我是队长，负责看守俘虏，晚上困得要命，就在帐篷外拢起一堆火，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醒来跑进帐篷一看，那个抓来的村长已经钻出帐篷逃跑了。我急忙跑到司令部向杨司令报告，杨司令听后直拍大腿："这可成了问题！"但他没有责备我，只是命令部队立即行动，攻打四道河子。我们连夜行动。第二天拂晓，我们攻下了四道河子，解决了一些冬衣和粮食。

突破"铜墙铁壁阵"

1940年初，部队转移到蒙江一带，一路上我们到处看到敌人撒下的传单。传单上写着："铜墙铁壁阵"已经给你们摆上了，你们想逃出去万万不可能了。"敌人出动四万人的兵力，密布在蒙江一带，封锁了山林交通，日夜搜索，疯狂追击抗日联军。尤其是抗联第一师师长程斌的叛变，给部队造成更大的威胁。

有一次，程斌率领的警察大队进攻我们，我们不得不打了一场硬仗。我们把前面的敌人打倒了，后面的敌人继续往上攻，。我们在山的半腰上，下面有程斌的队伍，山上还有一部分伪军，进退两难，处境十分险恶。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山上攻，奇怪的是山上的伪军竟没向我们开一枪就撤走了，我们很顺利地占领了山顶。凭借这一有利地形，打退了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激战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太阳落山了。天黑往四下一看，方圆几十里内，数不清的火堆一个挨一个，象一座城。敌军已经形成了一层又一层包围圈。在这紧急情况下，杨靖宇司令召开了党员会议，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今天是决战的时候了，敌人虽然兵力多，但他们是分散的，我们的兵力虽然少，但是集中的，突围一定不成问题。"他命令党员在前面突围。我们每个党员都发了双份枪弹。我原来只有匣子枪，这次又给我发了一个马枪。布置完毕，部队开始行动，组织夜间突围。

我们先往最近的火堆摸，队伍排成一条线。我们正往前走，迎面碰上一伙敌人巡逻队，大约30多人。敌人见一伙人正向他们走来，黑乎乎的看不清楚，就问是哪部分的，还没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走在我们部队前面的朝鲜族副官就抢先开枪打倒了好几个伪军士兵。几乎同一时间大伙也向敌人开了火，眨眼功夫，就把这伙伪军消灭了。然而枪声一响，却暴露了目标，我们索性硬打硬拚了。善于夜战的抗联战士英勇奋战，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还抓了30多个俘虏，缴获30多支马枪。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后，跑出一里地，我实在走不动了，身上背着两条枪，还有背兜。我想坐在地上歇口气，谁知一坐下就躺在背兜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部队已经走很远了。我赶紧起来追，追了很长时间才赶上部队。到了队里我才发现身上背的枪没有了，我心想，一定是扔在睡觉的地方了，抗联战士没有枪怎么打仗？于是我就又跑回睡觉的地方把枪找了回来，再次拚命赶上部队。天亮以后，杨靖宇给全体抗联战士讲了话。他说："这次由于大家敢打敢拚英勇奋战，咱们胜利地突围出来了，敌人号称的"铜墙铁壁阵"在我们眼里变成豆腐阵了"。接着杨司令

又问我说："你昨晚又跑回去一趟干什么？"原来，他早就注意到了我那点反常的举动。我说："我枪丢了，回去找枪！"杨司令又说："你怎么胆这么大，我们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多危险！现在武器不重要，人重要。"杨司令虽然把我好顿批评，但体现了杨司令对战士的关怀，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部队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见敌人没有追击，便松了一口气。部队休整了几天，然后转移到牡丹江一带。

我们虽然平安地突围出来，但伤亡很大。杨靖宇司令指示部队，为避免暴露目标，必须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敌人的兵力，吸引敌人两头追击。杨靖宇把部队仅有的200余名战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金××率领，一部分由杨靖宇率领。金××率领的部队向长白山一带转移，杨靖宇率领的部队向桦甸一带转移。部队分头行动后，狡猾的敌人很快弄到这一情报，他们并不下力气对付金××部队，却集中优势兵力追击杨靖宇部。杨靖宇率领的我们这支队伍，几乎天天打仗，我们一直打到桦甸，部队只剩30多人了。为了解决给养，杨靖宇决定攻打新开河林场。新开河林场是那儿数林场的一个分场，那里驻着一个伪军分遣队和森林警察。我们摸清敌情后，用两挺机枪封锁警察分遣队的大门，趁敌人慌乱之机冲进了警察分遣队大院，一举攻下了这个据点。我们找了几个民伕，把给养背出来。杨靖宇司令又把我们这30名战士分出15人护送给养，准备把给养藏到山上一个秘密的地方。

1940年1月，杨靖宇将军率领的小分队从新开河转移后，敌人已经布满各沟各岔，我们如果想出去必须从敌人的中间

穿过去。白天容易暴露目标，只有晚上行军。这时，我们又与送给养的15名战士失去了联系，这样，部队只剩15人了。这15人都是少年铁血队和特卫排的。1月的天气非常寒冷，雪下得很深，部队行军十分困难，后来杨司令从我们15名战士中经过研究抽出 7 个人掩护司令部的 8 个人。这 7 个人由我负责，掩护司令部的 8 个人。他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掩护。敌人紧追不舍，我们边打边退。我们有 8 支匣子枪，2 挺轻机枪，还有 3 支马枪，每个人身上背的东西不多。吃的用挎包装些苞米面大饼，还有点用火烤熟了的小咸青鱼。敌人上来，我们就打一顿枪，把敌人打退了我们再追赶司令部。他们走的慢，我们很快就会赶上。饿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人找一棵树作掩护，嚼点大饼子充饥，敌人上来再打。后来，杨靖宇派传令兵小黄告诉我，找一个好地势，多掩护一会，前面的雪太深走不动。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山包，便带着 7 名战士散开，一个人挨一棵树，等待敌人到来。过了一会，敌人便冲了上来，等敌人离我们只有10几步远的时候才开枪射击。我看到敌人有一个机枪手正往一棵大树边跑，企图架起机枪还击，还没等他跑到那儿，我们的机枪子弹就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脑浆喷到树上。我们掩护了两个小时，敌人从两边围攻上来。正在这时，有一挺机枪出了故障，情况非常危急，我立即命令战士们往后撤，我们边打边退，最后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出众围后我们想寻找杨司令沿着队伍走的方向，继续追赶司令部，但是雪地的脚印全乱了，我们已经找不到杨靖宇司令走上哪个方向了。从此，我们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我们剩下 6 个人，走深雪路走不动，就选定一条路继续前进。

被迫当山林警察

抗联部队行军打仗时，都事先确定联络地点以便失掉联系时找到。这次我们的联络地点是辉南县四道含子。我们走了一天，大约已经走出80多里地了，离辉南四道河子还有180多里地。这么远的路程又都要在山林里行军，而我们6个人当中没有一个熟悉道的，向导也无处去找，走了一天就迷了路。这时吃的没有了，为了轻装行军，我们把出故障的机枪埋在一个山坡上，然后拢起一堆火，6个人围着火堆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商定回新开河，准备弄一些粮食，然后再与司令部取得联系。我们到了新开河以后，没有弄到粮食，只从采伐工那里得到一些他们带的食物。我们在这里活动了三天，暴露了目标，敌人又把我们包围了，后来我们又突围了出去。在一次战斗中，又牺牲了一名战士，只剩我们5个人了。

打那以后，采伐工人上山不敢带干粮了，我们也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充饥的食品了。我们5个人饥肠辘辘，实在难忍，就商定打新开河公房子弄点粮食，然后再去辉南县四道河子。那天晚上，我领着4个人下了山。公房子周围都是铁丝网，北面是森林警察署，这里几步远就设一个哨兵。我们转了一圈也没敢攻进去，顿攻力量太小，我们4名战士陷入这种困境，完全失望了，最后被逼无奈，我投了新开河森林警察署，有3名战士投了天河星森林警察署，另1个人投了那儿袭森林警察署。

后来，我听说杨靖宇司令在向导的带领下到了四道河子。这时，快要过旧历年了，我因为被严加监视不准随意走动。一直在警察署呆着，1940年2月的一天，我听到离警察署不远处的山岗上，传来一阵枪响，我觉得很奇怪，心想

我们的部队已经走了，还会有谁打仗呢？第二天，我就悄悄打听别人，听他们说，杨靖宇又回来了，他们在马家甸一个小沟里住下了，后来被敌人包围了。这次又牺牲了几个战士，杨靖宇的狐狸大衣也被敌人拣到了。以后听说杨靖宇领着部队又撤走了，过了不久，传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

1940年3月，大地回春，积一冬的冰雪开始融化了。马家甸有一条河，森林警察准备到那儿修水坝。我也要求跟着去，小队长同意了，我就跟着他们出发了。这时，雪还没有化尽，我们走到一个小沟时，听到老鸦在附近呱呱叫，我就打听伐木工人，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那是杨靖宇那次打仗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地到那儿看了看，见两具抗联战士的尸骨尚无人掩埋，尸体已经让野兽吃光了，只剩下发白的骨头架子，令人惨不忍睹。以后，我没有再去寻找抗联部队，留在新开河警察署当森林警察了。

深切怀念朴钟秀营长

李云亮

朴钟秀，敦化县人，朝鲜族，是吉东警备二旅六团二营营长。

我认识朴钟秀，是在1946年5月，原警二旅五团从公主岭撤退到敦化官地整编后，五团番号取消，被编入六团。我是团部的侦察员，由于工作关系，对各营、连首长接触的机会较多，故对朴钟秀的印象尤深。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朴钟秀的年龄，看上去约30来岁，一副英俊的面孔，标准的军人姿态，他举止严肃。但他对下级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因为这个缘故，每逢我到二营执行任务，总是想法跟他扯上几句或者学上几句朝鲜语。朴钟秀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直到发音准确了，他才爽朗地大笑起来。朴钟秀汉语讲得十分流利，听起来使人不能相信他是朝鲜族，我们交谈起来也就十分方便和融洽。

朴钟秀对战士要求非常严格，对战士的关怀更是体贴入微。在行军途中很少看到他骑在马上，他总是把马留给伤病员或掉队的战士骑。而他身先士卒地走在队伍前头，还时常转过身来，帮助战士扛枪，揹背包和粮袋等。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动，和甘当排头兵的精神感染了全营干部战士，所以，他带领的二营是我团士气高、战斗力强的一个营。

拆除敌堡，初露锋芒

1946年5月中旬，新站、拉法战斗后，我军的顽强防御态势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妄想把我军撵到长白山区，撵过鸭绿江的迷梦。同年党军被迫龟缩到老爷岭以西，并在老爷岭构筑工事与我军对峙。

新站战斗后，我团（二旅六团）奉命进驻新站，二营驻地在老爷岭东侧山脚下一个村庄(村名记不清了)距敌很近。

1947年2月，为了拔除敌人在老爷岭修筑的几百个碉堡，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二营担任扫除敌军地保群的战斗任务。朴钟秀营长精心制定作战方案，让五连担任了主攻任务。战斗打响后，五连指战员猛虎般地冲上了山头，接近敌堡，首先破坏了第一道鹿寨和蛇形掩体。死守明堡暗堡里面的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构筑的永久性工事，以各种火力交叉封锁，负隅顽抗，妄图阻止二营的攻势。

朴钟秀营长见此情形，果断调整了战斗部署，以一个连的兵力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迷惑敌人。以另一个连的兵力迂迴敌侧，出其不意地逼近敌堡。二营五连全体指战员迅猛异常，动作敏捷，在短短的五六个小时战斗中，催毁敌堡40多座，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使部队得到了一次锻炼，这次战斗也显示了年轻指挥员朴钟秀的指挥才干，战后他受到了表场。

攻打龙潭山，不幸壮烈牺牲

龙潭山位于吉林近郊，在它的附近有一座铁架山。它是吉林守敌六十军的前哨，驻有敌人一个加强连（相当一个营的兵力。敌人在这里构筑了10几个碉堡、鹿寨、武器和装备精良，配有重迫击炮数门，固守在那里。

1947年10月25日夜晚，我团担任了攻打龙潭山的战斗出

务。二营是主攻营，五连是尖刀连。战斗打响后，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又加各种火力交叉配合，组成了一个火力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个小时，五连进展受阻，就在这时，朴钟秀营长来到前沿，亲自察看敌情和地形，重新组织兵力，选择进攻路线，指挥部队再次发起了冲锋。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五连战士冲上去了，敌人的鹿寨被破坏，碉堡被攻占了。敌人疯狂反扑，激烈的白刃战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五连战士个个英勇杀敌，死守阵地，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反攻。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又一次疯狂地组织了反扑。各种轻重武器的火力一齐压了过来，阵地顿时成为一片火海，硝烟弥漫了整个山头。这是一场敌我双方火力和胆量的较量。敌炮不断在我阵地爆炸，随着爆炸的气浪夹着一股灰柱冲上了天空。有的战士倒下去了，活着的战士更怒火填胸，阵地上，为烈士报仇的口号声与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战士们的双眼里早已经没有眼泪，只有复仇的怒火。

当反击敌人的冲锋号声响起来的时候，五连战士如潮水般的向敌人冲去。朴钟秀营长也随着冲锋队伍冲了上去，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炮弹，落在朴钟秀的身旁爆炸了。我们敬爱的营长，敦化人民的好儿子朴钟秀倒在了血泊之中，他英勇地献出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二营指战员听说营长牺牲时，无不失声痛哭。在朴钟秀营长遗体前，全营指战员脱下军帽，举枪朝空齐射，以表示对烈士的沉痛哀悼。

朴钟秀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平易近人、任劳任怨的精神在二营发扬光大。1948年2月，我们独立六师于吉林西五家子与敌六十军（四个团）

遭遇。我团（十七团），二营五连在这次遭遇战中表现最为突出，与数倍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两军相遇勇者胜，终于，打退了敌人。这次战斗十分艰苦，全师闻名的模范连长牺牲了，全连伤亡惨重。但是，这次战斗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金天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负重伤不下火线，当战斗失利时装死躺在雪地里，当部队反击时，他不顾伤痛，一跃而起，奋不顾身一连刺死两个敌人，炸死十几个敌人，使敌人丧胆而逃。战后，金天德被师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象朴钟秀和金天德这样的英雄还有许许多多，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回忆海南岛战斗

唐汝恩

我是敦化县人，随军南下参加过海南岛战斗。现将战斗情况回忆如下：

1948年12月末，祖国大陆基本解放，国民党白崇禧兵团手下部分残兵败将在广西战场上被我军击败后，逃到海南岛，企图把这个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防守基地。国民党认为解放军不可能渡海作战，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军舰，不可能攻克这个堡垒。然而，我四十三军几个师和兄弟部队接到命令，到达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康县后，经过休整，立即进入了紧张的海练。这次海练首要任务是使部队全体官兵，在当地政府委派的船夫指导下，学会在海上以木帆船利用海上的风力，划船、掌舵及渡海的本领。经过四个多月的苦练，全体干部战士都掌握了划船渡海的要领，只等上级下达作战的命令。

1950年4月20日，几百只木帆船停留在岸边。下午5点多钟，晚霞映红了辽阔的海面，战士们各个情绪饱满，都很快地登上了事先分配好的船只，整装待命。这时三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前进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起锚的起锚，拉帆的拉帆，我们的船开始向对岸前进了。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利用北斗星指引航向，全速前进。

深夜12点左右，我们的船正在行驶，突然从远方传来一阵军舰的马达声，因天黑看不见目标，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前

进。当马达声离我们很近时，我们辨别出这是国民党的军舰，这时，敌人也发现了我们，顿时，敌人的炮弹向我们的船只射来，炮声和枪声响成一片。我们拚命往前划船，我们一面划船，一面集中火力向敌舰开枪，射击，打得敌舰只顾逃跑，不顾还击。这时敌人的飞机出动了，敌机在空中分不清军舰和木船，但为了完成任务毫无目标地投下几颗炸弹，便飞走了。把敌军舰打跑后，我们照样前进。上级不断下达加快速度的命令，我们必须在黎明前登上海岸。经过战士们一夜的顽强拚搏，在东方发白的时候，我们终于靠近了敌人占领的海岸。我们的目标一出现，敌人的炮火便集中向我们射来。我军在赵团长的率领下，在领航机帆船上第一个跳上岸，带领三名警卫员首先向敌人地堡群发起了冲锋。紧接着，我们的几百只木帆船先后靠岸，国民党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突破。第二道防线也没费劲就被拿了下来，敌人有的投降了，有的被打死，也有的到处乱窜，敌人的阵地乱成一团。

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战士们没合一次眼。饿了吃把炒米，渴了喝点稻田里的水。这时正是阳历四月，海南岛已是烈日炎炎，战士们顶着烈日，顽强地与敌人奋战。我们把国民党三十八军部分兵力打退到梅享市和黄竹岭一带，国民党摆出决战的架式，拚命阻拦我军前进。敌人集中了六个团一个保安队，而我军只有三个团的兵力。国民党还利用空军在海口市机场动用了B29轰炸机和战斗机100架，三五成群来来往往，轮番向我地面部队投弹扫射。前沿阵地炮声隆隆，浓烟四起，战斗越打越激烈。国民党占据了无名高地，组织大量兵力和火力一次又一次向我阵地反扑，但都被我军打退。双方你攻我守，你退我追，互相拉锯，使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由于不停的战斗，我们的子弹眼看就要打光了。敌人还在不

断地进攻，战情十分危机。赵团长命令大家不要浪费一枪一弹，看准目标再打。正在这时，国民党运输队的三辆卡车满载枪弹准备运送国民党前沿阵地，被我军发现后，立即埋伏在公路两侧，等卡车到了伏击地点，战士们一跃而上，敌军卡车司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都变成战士们的枪下鬼。这下可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一边卸子弹一边说，这回敌人来多少就消灭多少，决不放过一个。战斗仍然激烈地进行着，国民党的每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因此，他们的官兵势气非常低落，只好扔下梅享市和黄竹岭，溃不成军地往榆林港逃，准备上军舰逃往台湾，但国民党的船只被我追击部队全部击沉了。海南岛战斗持续了一周，共消灭敌军25万，取得了木船胜过军舰的辉煌胜利。

敦化高海楼店事件

陆建洲　供稿

刘志来　整理

1939年8月的一天，上午9点钟左右，伪吉林省警察讨伐本部的两台汽车（桦尔办事处一台，日满自动车一台），准备赴大蒲柴河警察署运送物资，中途停留在伪马号警察署休息。

这时，从后面开来7辆日本军车，车上全部是运往大蒲柴河的武器装备及军需物资。押车的是日军驻敦化县的中岛部队一个中队约140余人，长岭县警队日本警尉15人及敦化伪警务科3名警员。当他们的车行驶到马号时，停了下来，停在警察讨伐本部两台车的后面。停车后，一个少佐军衔的日军军官下来围着先来的那两台车看了一圈，问明情况后，就命令伪警察本部的两辆车做先导出发。汽车行驶到寒葱岭休息吃饭，一个小时后，汽车准备向大蒲柴河进发。出发前，日本少佐命令伪警察本部的车在前面开，距日本军用车200米，日军的汽车互相拉开距离50米，与伪本部后面（桦尔办事处）车距100米。同时，命令全部日军作好战斗准备，以免遭到抗日联军的袭击。

12点30分，车队正式出发，当先导车行进到高海楼店南侧时，抗日联军金××将军和崔贤团长率领的部队早已得到消息，埋伏在那里。下午13点左右，敌人进入了伏击圈，金××下令开枪射击。战斗进行了4个小时，敌人除先导和后

卫两辆车逃窜外，日军的7台车及官兵全部被抗日联军消灭，并缴获了全部武器和军需物资。

当驻大蒲柴河野符战斗司令部指挥日、伪军增援部队到达时，抗日联军已清理完战场，烧毁了日军车后，胜利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敦化黑瞎子圈事件

陆建洲　供稿

刘志来　整理

1938年11月，敦化县伪警务科为了治安肃正，大规模围剿抗日联军，组成了永田（日本人永田善男）警察讨伐队，在沙河沿地区活动。讨伐大队由180人组成，分两个中队，一、二中队分别由三个小分队组成。大队长永田善男，一中队长日警尉丸一恒雄，中队副警佐姜大祥，二中队长日警尉宫玉清，警长渡边勘市。

讨伐队组成后，永田大队长将讨伐队的两个中队分别以包围形式，向石场沟及二龙山一带搜索前进。当第一中队行至石场沟处时，与抗日联军陈翰章部队相遇，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第一中队丸一恒雄及队员齐振祥（原沙河沿自卫团员），当场被陈翰章所部打死，并打伤一名队员。抗日联军缴获"七九式"步枪4支，手枪1支，橹子枪1支。抗日联军见其他人都是中国人就撤走了。第一中队也返回驻地重整装备，企图再次追剿抗日联军。

与此同时，日军大队长永田善男率第二中队向二龙山方向搜索时，发现一木房，以为抗日联军在里面，便布置二中队包围小木房。然后向里面射击，打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于是停止了射击。进屋一看无人，便将木房烧毁，又继续在该地搜查。傍晚时分，第一中队派张治清通知永田善男：第一中队与抗联相遇，丸一恒雄等人被打死。听到此消息后，第

二中队立即返回驻地沙河沿村。三天后，第二中队又到石场沟搜索抗日联军，但毫无收获。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讨伐大队对抗日联军进行[illegible]的搜查，一、二两个中队采取包围形式分别向窟贵村北山的黑瞎子圈处搜索。中途，发现一个木房子在冒烟，经侦察得知里面住的是抗联的几个战士，讨伐大队立即将房子包围起来，四面射击。抗联战士在没有防备地势又不利的情况下，吃了大亏。抗日联军团长朴太化及顾炮头被捕获，4名抗联战士被打死。战斗结束后，由讨伐队第一小队长施汝撑及队员[illegible]学礼，杜中[illegible]等人将抗联战士牺牲的4人首级割下来，拿到沙河沿街挂在树上示众，同时将抗联战士的尸体在小东沟[illegible]。

1938年12月，日军讨伐队大队长永田辞男命令[illegible]、张吉祥、姜万长、宋玉[illegible]、宫恒春等15人到沙河沿东[illegible]屯，将孙殿甲、李全二人以私通抗日联军的嫌疑予以逮捕，经刑讯后，被日本警察押往沙河沿东山枪决。

敦化东江沿杀人解剖事件

陆建洲　供稿

刘志来　整理

1940年8月，日本东京医科大学10几名医生到敦化作大骨节化验。伪警务科特务股为了随应其化验需要，将在押的6名嫌疑犯（抗日嫌疑犯，中国人），于8月的一天上午，从伪敦化县警察署留置场（监狱）内，提出押往敦化城东江沿。然后命令这6个中国人面向江边跪下，日本特务股九岛重治掏出手枪，将这6个人全部击毙。而后，由日本特务股长稻生长松，把6个尸体交给东京大学医生作化验。

稻生特务股长和其它日本人把尸体抬到桌子上，由东京医科大学医生把尸体割成小块装在玻璃瓶子里，用秤称完封好盖，并拴上签子，把有用的留起来，其余尸体扔到江里。这是日本侵略者，在敦化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吉林省伪警务厅特务警佐
傅明海阴谋杀人事件

陆建洲　供稿

刘志来　整理

1936年11月，伪吉林省特务厅特务科警佐傅明海窜到敦化县，与特务股长田平佐吉（在田平家中）秘密合谋，用苦肉计由傅明海假充抗日救国军人员，以狱侦打入留置场（监狱），刺探所谓抗日嫌疑犯的情况。

傅明海化装后在敦化城内活动，随即特务股长田平佐吉召集特务股人员张国忱以及敦化警察署的特务邢振修、张兴奎等分别到城内搜查，在敦化城内东门天宝堂妓馆内将傅明海搜出，缴得手枪1支，将傅明海立即逮捕，送交警务科留置场拘押。因事先田平佐吉密谋串通，所以傅明海在留置场（监狱）内每天换一个号。三天后，傅明海被田平佐吉接出，换上警佐制服。根据傅明海探明的情况，伪警务科特务股开始审讯嫌疑犯，大约审讯了5名犯人。

193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伪敦化警务科特务股在留置场提出4名抗日救国军嫌疑犯，由张国忱、张彦祥、毛玉书、孙德源、戴克选等人押送到日本宪兵分遣队。到达日本宪兵队后只留孙德源1人在车上看押，其他人在车下四周警戒，约半小时由日本宪兵队内又提出4名嫌疑犯（中国人）押上汽车，同时，又增加日宪兵4人上车押送。这8名所谓的抗日嫌疑犯，全部被拉到敦化城东门外铁路东江沿处杀害了。

常振邦被捕事件

陆建洲　供稿

刘志来　整理

1940年1月4日，伪敦化地区大蒲柴河特搜班警尉补曹景海，为了向日本主子表示忠诚，投降并充当了走狗，以所谓“私通抗日联军”罪名，将伪大蒲柴河警察署警士于长深逮捕。经曹景海多次亲自刑讯逼供，于长深受刑不过，最后供出伪大蒲柴河警察署长常振邦、保长王桂成等70名爱国抗日居民，并将其逮捕。这70余名居民中有村公所雇员和大蒲柴河各门店店员及大蒲柴河伪警察署管辖的各屯屯长。他们被捕后，被押送到伪敦化县警务科。常振邦、王桂成等多人被关押在伪警务科留置场（监狱）。

同年2月，又将于长深等6名爱国志士押送到伪吉林省地方法院分别判处徒刑。其余被捕人员也都受尽折磨，但因事实无据，最后伪警务科不得不先后取保释放。以后据日军走狗曹景海自己述说，他探知案情的实情是，曹景海曾伪装成家理教徒，潜入抗日救国同盟会任主要负责人，而后予以逮捕的。

由于日本人的忠实走狗曹景海出卖中国人民，效忠日寇有功，深得伪满吉林省警务厅长村井矢之助所赏识。因此，提升曹景海为警尉，并亲自为他佩带警尉肩章，授予战刀，另有奖金伪币30元，以资鼓励其继续效忠日寇，破坏抗日。

张永山事件

陆建洲　供稿

刘志来　整理

1940年8月的一天晚上，伪敦化地区特搜班警尉补孙长忠，根据叛徒密侦苏连科报告："张永山（系抗日联军陈翰章部队的班长）仍在敦化街活动"。

孙长忠当即同苏连科两人到敦化街内进行搜查。在搜查中发现张永山正乘马车回家，孙长忠和苏连科从马车后尾随。当张永山行至"巴尔普（现3305厂曙光街）"家中时，孙长忠和苏连科两人闯进张家将张永山逮捕，送到伪敦化县警察署留置场（监狱）看押，经孙长忠刑罚拷打刑讯逼供，张永山誓死不招认。最后由伪警察署押送至伪敦化县法院，又经敦化县法院将张永山押解到伪吉林省法院，判处张永山8年徒刑，直到1945年光复后才被释放。后来，张永山在一次围剿日本残军的战斗中，牺牲于大蒲柴河屯。

中共敦化市委大事记

王笑言　王维学

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敦化是根据吉林省政府吉民秘字133号通令将敦化县政府改为敦化县人民政府。

10年，成立中共敦化县委训练班。

10月，李延田任敦化县人民政府县长。

12月2日，召开了敦化县首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会议正式代表114人，列席代表6人，会上县委书记张庆余同志做了会议总结报告。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三项决议。

1950年

4月14日，敦化县人民政府县长兼敦化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延田调离，由赵中生任敦化县人民政府县长，裴克夫任敦化县人民法院院长。

6月5日，敦化县召开了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54人，大会任务是总结1949年工作，布置1950年任务，贯彻婚姻法。会上选举产生了敦化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迟淑杰当选为县妇联主任。

8月30日，成立敦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宗林兼。

10月，成立敦化县委机关总支、林务局总支。

12月3日，召开了敦化县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列会代表227人，会上县委书记张庆余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当前党员思想、组织情况的总结报告。"会议主要解决党员对目前形势的认识，统一思想、巩固认识。

12月，召开了敦化县第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基层工会，发展会员。大会通过了将敦化县职工总会改为敦化县总工会的决定，大会选举了王言亨为总工会主席。

1951年

1月8日，召开了敦化县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敦化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张桂兰当选为妇联主任。

2月，敦化县直机关，企业开展"三反"运动。

3月，设敦化县委秘书处，处长张凤桐。

4月28日，召开了敦化县第三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50人，县委书记张庆余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中心是增加生产，励行节约，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和讨论整建党问题。

5月1日，敦化县有22，914名妇女参加了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有41,149名妇女在要求五大缔结和平公约宣言上签了名，有41,124名妇女投票反对美帝发动侵略战争，要求世界持久和平。

7月，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事部的命令，将敦化人民政府武装科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敦化县人民武装部，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周其任部长，张庆

余兼任政委。

12月8日，召开了敦化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58人。大会选举产生了敦化县第一届工商业联合主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杨荣先为会长，杨兆珍为副会长。

12月22日，全县21,212名妇女为抗美援朝捐献了20,2153元人民币买飞机大炮，成记号村妇女拿出11石（每石200公斤），粮食救济朝鲜灾区。

12月，全县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侵蚀、反剥削"为内容进行整顿。这次整党到1953年3月结束。

稿　　约

鉴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简则》，改变了原来“上限”“下限”的提法，规定文史资料工作对象为“近代、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回忆资料”，结合我市文史资料工作实际情况，对我市文史资料征稿事项作如下调整：

一、征集范围，凡与我市有关的近、现代史料，特别是“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回忆资料”，包括曾在我市工作或生活过的各界人士，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工商、民族、宗教、风俗和社会生活以及有关历史人物的图片、函电、手稿、书信、日记等实物均在征集之列。

二、征集重点：以1966年文革前的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史料为主。

三、来稿不拘观点，不求完备，但务求资料真实。凡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对国家、对民族作过重要贡献或者在祖国建设事业上有过重要建树的人士片断事例，只要实事求是，均受欢迎。

四、来稿采用与否，均不退还，请自留底稿。稿件采用后，本刊编辑有权删节、整理，如不同意变动请说明。

五、来稿凡有资料价值者，均酌付资料费。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送本辑资料一册。